炎黄春秋

第 6 期

2016年

郭道晖：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秦城内外的陈伯达

茨威格等三人的莫斯科行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访谈录

1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 何　方 采访　宋以敏 整理
11 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郭道晖 口述　邢小群 鲁利玲 采访
18 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 …………… 束美新 口述　许水涛 采访

特　稿

24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选摘

求实篇

28 “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 ……………………徐庆全
36 对错误进行反思是政党履行自己的义务 …………林蕴晖
40 1965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 ……………………白　磊
46 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 …………………………陈铁健

沉思录

50 “左”倾思潮与政治标签化 ……………………董宝训

怀人篇

54 张一弓和《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阎　纲
56 永远的顾先生 ……………………………………贺捷生
59 傅璇琮给我的一封信 ……………………………刘再复
61 李可染与《万山红遍》 …………………………李兆忠

人物志

64 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 …………………………邢小利
67 秦城内外的陈伯达 ………………………………袁　凌

往事录

73 吴晗一家的命运 …………………………………吴　翠
77 我与许家屯二三事 ………………………………董　健

品书斋

80 “书生作吏”：文坛“掌门人”的反思 …………刘　伟

海外事

84 茨威格、罗曼·罗兰和纪德的莫斯科行 …………雷　颐

编读窗

91 周扬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袁　鹰
93 关于AB团的一点资料 …………………………杨　甦
92 日本负罪感一议 …………………………………张树亭

顾　问（参加社委会）
李　锐　何　方　郭道晖　江　平
陶斯亮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王海光　方　宁　卢跃刚
冯其庸　曲润海　苏双碧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　吴　伟　吴　象　吴明瑜
沈志华　张文彬　张北英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陆　德　陈　敏
邵燕祥　金冲及　周瑞金　赵德润
胡冀燕　钟沛璋　保育钧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徐庆全（副召集人）
贾磊磊　钱理群　徐小岩　凌　云
高　放　高尚全　资中筠　展　江
萧蔚彬　章诒和　董　健　韩　钢
鲁　谆　雷　颐　蔡　霞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胡德华
徐庆全（副主任）　李　晨
胡竞成　王彦君

社　长　杜导正
副社长　胡德华　李　晨
秘书长　杜明明

总编辑　徐庆全
副总编辑　王彦君
执行主编　冯立三　丁　东　杜明明
网络主编　王海印
编辑部主任　赵凡响

总经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行部主任　孔　屏
办公室主任　王海印

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l@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终审　徐庆全　　执行主编　冯立三　　校对　柏　间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 何方 采访 宋以敏 整理

“文革”中受批斗

文革中近代史所开始斗刘大年，李新、黎澍叫我参加，我就坐得远远的。要我写大字报表态，我就写了。他们说我写得不痛不痒。斗我时批我过去讲长征情况，把长征说得很惨，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分子。他们有时不让我回家，还来抄过家。文革时收走了我们的存折、富春的信、主席给我们的信。这时还没有斗闻天。斗闻天之后，接着就是我被抓去陪斗，又叫我到学部写大字报。

文革开始，学部召开大会，我参加了。陶铸以文革小组顾问的身份讲了话。他说，经济所批孙冶方，要知道孙冶方背后还有后台。关锋在旁边插话说，是张闻天。我回家后，没敢告诉闻天。第二天，就是1966年8月9日，经济所就通知闻天开会，闻天还挺高兴，拿了一个包就去了。这是学部和经济所造反派第一次联合揪斗闻天和孙冶方。闻天没有精神准备，到了之后有人喊：把张闻天揪出来。批斗中他昏了过去，被人架下去的。他醒过来就听到有个很远的女人声音，骂他：你装什么？闻天回来就说，是一个女的，好厉害！孙世平（张闻天的生活管理员）说，她就是周志昂。从此以后，学部联队就经常批斗他，批的理由就是说他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闻天起先还想辩论，一说话就被人讲态度顽固，后来就应付应付：“是，是！”批斗时他总是把眼镜拿下来放在口袋里。

闻天在挨斗和谈话时还沉着。他说还是要尊重群众。我说，什么群众！

他挨了斗也不告诉我。文革时晚上被抓走，都不惊动我。是小倩叫了我，才知道他被抓走。回来他就用冷水洗脸洗头。问他怎么样，他说没有什么。接着就伏在桌子上写。他还被弄去拍过电影，身体就搞垮了。

闻天有一次被斗后，身无分文，吃完饭连两毛钱的饭费也交不出。当时李昌同志（也被斗）给付了。分手时，他轻声跟闻天说：“注意保重！”闻天很感动。

那时候好多地方来外调，排着队来。有一天又通知说有人外调，非去不可。他从车上摔了下来，是孙世平再把他推上车去的。人家斗他，他总是那几句话：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讲的那些，我不知道。他统计来外调的大概有300多次。闻天总是自己写证明，由孙世平和老黄（关祥，炊事员）抄清，一式三份。对于造反派要他写材料，不管哪一派，他都是根据自己知道的，实事求是地写，决不乱写。造反派看了总是不满意，说他“顽固”。闻天觉得这样搞法不对头：为什么要他写材料总是得按照一个调子来说呢？别人要闻天揭发，他从不讲别人。闻天不揭发人的，自己承担。

外交学院斗闻天那次，是跳墙进来把他抓走的。外交学院斗了他两天，我都不知道。他利用空隙打打电话，还问小倩脚烫伤好了没有。我叫孙世平把毛衣送去，造反派都不让进。外交部斗得很厉害。在姚登山当权的时候，闻天和我也被外交部造反派弄去批斗，牌子被挂在门上。“大喊大叫队”几个女的把我们藏在档案室的小房子里，关起来。第二天，一人交两角钱，吃一点稀饭。闻天劝我一定要吃一点，说里面还有点辣椒。上午拉我陪斗，我也坐了喷气式，他们还说我东张西望，想干什么。下午开斗争大会。回到家后，他摸了摸我的手，说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也不敢看他，我说我还顶得住。他总是不希望我去陪斗。他把房门锁上，叫我在造反派来时不要起床。

北航揪斗彭老总，是在1967年7月26日，闻

张闻天、刘英1972年在肇庆和家人在一起

天那次也是陪斗的。周总理叫不许武斗，不许侮辱。但是大会之后，在会场的出口站着两排红卫兵，个个都是彪形大汉。在彭老总和闻天通过这行夹道时，几乎每一步都遭到这些人的毒打。闻天当场就被打昏了过去，幸亏被警卫人员拉了出来，否则将不堪设想。等到醒来之后，解放军又把他拖上汽车游斗。在卡车上彭德怀被打得惨叫。后来造反派把闻天送回来。回来一进家门，我看他简直就不成个人样子了。一问情况，他却首先说彭老总怎样挨斗，说彭老总那样硬的汉子都大声惨叫，对他们喊：你们究竟要把我怎么样？他不谈自己。我一边听着，一边朝他仔细一瞧，他被打得满头都是包。我心里十分难受，可他却心里惦记着彭老总。他这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时候也都是想着别人的。当天晚上，我给他头上擦了些酒精，按摩了一下。他满头是伤，睡觉时无法挨枕头，我就找了个游泳圈，给他做枕头，他才勉强躺了下来休息。

张闻天承担“61人案”责任

1967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搞起抓叛徒来了，抓出了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就是1936年薄一波等61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南开大学两派一次一次地找闻天。抓闻天有时晚上来，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要出来就叫孙世平开锁进门。有一次还把他和杨述一起抓到天津去了。当时我以为他不能活着回来了，是周总理通知经济所把他弄回来的，他凌晨1时才回到家里。我说你是怎么回来的？他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组”来追查。他们说康生指示，你们可以立一个功：刘少奇交代，这件事是经张闻天批准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说，是中央书记处有电报叫放人的。闻天记得，确有一年刘少奇写信来，说这些同志可以履行手续争取出狱；信大概是交通员王林送来的。但据说王林后来交代，说他没有当过交通员，没有替刘少奇带过信。其实交通员不只是王林，还有一个鲁本，但他已经牺牲。闻天只好说，他收到刘少奇信这件事，是直接向毛主席说的还是在中央的会议上说的，已记不清，刘少奇是带信来的还是有电报来的，他也已经记不清，要请示组织。其实当时这类事情都是要向毛主席说的。他就给康生写信，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嘛！第一封信写得很短，只说刘少奇那里来的东西是有文件还是电报，希望查一下档案，以便答复学生。我认为康生是不会回答的。过了两天不见康生回音，红卫兵又逼得很紧，闻天就给康生写了第二封信，说：刘少奇为了救这批同志有请示来，要中央批准他们履行手续，此事是否经过中央批准我已记不很清，但是我应负责。他在括号里说明：我是在中央负责的。当时闻天跟我讲，这件事是毛主席批准的，但是不能让毛主席或中央承担责任，那就由我自己来承担吧。

然后就在那儿等。闻天还是每天“上班”。有一天闻天从经济所受审回来后很紧张，对我说，今天来了两个穿军服的干部，很凶，一来就叫我站起来念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我交代问题。说：他们是康老那儿派来的；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说是你代表中央批准他们出狱，这是把水搅混，包庇刘少奇；你要对你的子孙后代负责；你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他们威吓闻天，但他还是老样子。

他这天的情绪不好，说：这两个人是有来头的，要做好准备，可能要抓起来。我以为会是吓唬一顿。但是不久经济所就来电话了，叫我们不要出去，下午3时在家里等着。我们两个人都很不安。

到了5点钟，他正在写东西，来了几个军人。我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从卫戍区来的。一个营级干部宣布三条，一是你们被监护，不准出房门；二是一切听从战士指挥；三是不准同工作人员和家里的任何人联系。闻天后来跟我说：我还以为你没事，想不到你也被看管起来了。1968年5月16日开始把我和他分开看管，一直到1969年10月20日我们才又见到面。

受到隔离监护

他们派了一个排来监护，日夜派人站岗。他们把我叫到老孙的房子里，一个军官跑来宣布：由卫戍区来的两个战士对我实行监护，叫我不要动，由他们把我用的东西搬过来。房子小，又不见阳光。他们搬走房子里的东西，换成木凳、木床。他们到处检查，钱收走，牙签收走，笔也收走。写东西的时候发一支钢笔，写完交回。闻天那里也是一样。他的牙齿不好，吃完饭后，总要用牙签剔牙。但是他放在脸盆架上的牙签给收走了。怎么办呢？他利用放风的时间，偷偷地捡一根小树枝，把皮剥掉弄尖。他就用这种土牙签剔牙。为了不再丢失，他把牙签放在《毛选》里，这总可以保险了吧？可是，土牙签还是不见了。闻天后来非常气愤地对我说，他们是什么都翻遍，什么东西都搜光呀！说：“我是个文化人，我又不是江洋大盗！”

他们在门上挖一个洞，吃饭就在洞口放上饭菜，都是凉的。我在长征时胃就不行了，这种饭我吃不进，胃痛。我想我还要活下去，想起当年，就勉强吃下去。

被监护后，我和闻天见不了面。两个人合用门口外面的一个厕所。后来听到他的咳嗽声，我就高兴。战士就骂他为什么老咳嗽。有一回去厕所，我看见了他，他没有看见我。这下子他们看得更紧了。放风也把我们两个错开，先放他，再放我，生怕我们见面。放风的地方是一条很窄的小道，还见不到太阳。有时审得时间长了，放风也就取消。而且闻天在放风时，总是低着头，哪儿也不看。他没有力气，拖着地走。他就是沉默地表示反抗。多年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孙(世平)，一家人都很想念我们。他的小女儿小红，在我们放风时，故意从院子里跑过来看我们一眼，但也要被他们赶跑。

我们从来是轮流拖地板、扫厕所的。后来我发现他不扫厕所了。这使我很担心。因此我在打扫厕所时，也特别留心一点。有一次，我发现藏在地板下面比较深的地方有个痰盂，拖出来一看，竟是一痰盂血。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知道他的病很重了。后来知道，闻天那时心脏病很严重，有一次鼻子大出血，流了约1000CC，严重影响心脏。他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去看病。他血压高，流血不止，不能出院。闻天要住院，他们如临大敌一样，窗户马上糊上纸，密不通风，房门口还派人站岗。闻天开始时不省人事，当他苏醒之后，就跟护士、医生说话，但是她们都不做声，护士还老换人。闻天知道，这是上边不准她们和他说话。于是他也就不讲话了。住院大约一个月，我都不知道。后来，门响了，我心里想，他又活着回来了。闻天回来时，他们也紧张得很，赶紧关好门，还喊着：快，快，快！他回家后就提出要见我，他们不理。第二次又要求见一见刘英，经请示后，回答说：“时候没有到，不能见。”闻天这时身体那么弱，但是他们还要他天天写交代材料。

是周总理提出监护我们，实际是保护起来，同时进行审查。审问的房子里贴满了标语，今天审他，明天审我。审问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委，是沈阳军区的，还有一个姓孙的秘书。每次审问前，他们总要我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要我念什么“花岗岩脑袋”这些语录。我真是念烦了，说字小看不见，他们就要我拿眼镜；我念的声音很轻，有时还乱念一通。他们就批我。你批我，我不做声。你批你的，我就是一声不吭。他们首先交代政策，说我不是主犯，交代好就有出路，还可以出去，可以分配工作。他们要我揭发闻天，说什么“反戈一击有功”。但我讲来讲去还是那一套：不知道！他们也没得办法。他们要我老实“交代”。我说，我是老干部，不能编造事实，最后还是要落实政策的，我乱讲

了对不起党，60多岁了，革命九死一生，现在也差不多了。他们说，谁叫你编？你这么顽固！说我是沉默抵抗。他们说，五次以后还是老样子，就不让我交代了。

审查闻天的重点还是“里通外国”。和郭肇唐究竟是什么关系，又成为一个重点。他们说，郭肇唐是赫鲁晓夫派到中国来搞情报的。闻天和郭肇唐是中山大学同学。郭肇唐当时也和康生在一起，但是他们不让闻天讲这个。斯大林肃反有问题，整过郭肇唐，使他坐了12年的牢，我们同情他是有的。他们问，拿给郭肇唐什么文件看过没有，我说不知道。郭肇唐这个人是“左”的。1958年来中国，对“三面红旗”是赞成的；但是他认为小家庭生活受到破坏是不好的。那时闻天给他看过一般的报纸杂志。闻天1959年4月出席华沙条约组织外长会议路经莫斯科时，见过他一面。情况大体上就是如此。

他们还追问在东北和苏联人接触的事和带电台这些具体问题。我们自1945年11月从延安动身，经过沈阳到哈尔滨，陈云把我们分配到合江省委。陈云考虑闻天的俄文好，让他同驻哈尔滨的苏军打交道，要物资。为了方便来往，陈云给闻天弄了一份证件——通行证。闻天带着一个电台和一个机要员，他们就问电台是否能同苏军联系，还问苏军的名字。我说这个电台是苏联人从日本人那里缴获后转送给我们的，陈云交给我们，专门用来和他联系，根本没有密码，不能同苏联联系。苏军同我们联系，一是送我们一些枪，是在暗中送的；二是提供一些物资。在合江、哈尔滨，苏联方面把仓库移交给我们，是叶季壮去接收的。他叫苏联人把放东西的地方告诉我们就行了。他们不相信，还说我们搞小额贸易，出卖过黑瞎子岛。当时东北和苏联有贸易往来，是因为我们还有支援前方衣物等任务，需要从苏联那里买这些东西。李范五、李延禄他们同苏联搞点易货贸易。他们通过留在佳木斯的老关系，和老毛子做生意。审问的人说，这就是“里通外国”。李延禄是民主人士，他可能瞎讲了一气，说什么把土地出卖给苏联，黑瞎子岛划给苏联，等等。实际上没有这些事。（李延禄是“九一八事件”后在佳木斯的东北义勇军领导人。1939年日本人扫荡后方，李延禄在东北待不住了，跑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我当时看到写着“欢迎抗日英雄李延禄！”的标语。）在东北，同苏联人交往，是哈尔滨的中苏友协管的。

他们还叫我交代：说罗申见过我100次，罗申反映，洛甫不好活动，总理要我告诉闻天。我说，闻天的活动不多也不少。他们说我包庇闻天。

他们说我谈的没有内容。我说我是一个老战士，就只能实事求是。接着叫我写历史，我说我问心无愧，没有脱过一天党。他们又说我只入了团，没有入党。我说，我1925年入党，是湖南省委候补委员，我还是少共中央宣传部长。我入党是李维汉批准的，朱端绶可以证明。我那时叫郑杰，曾和朱端绶在同一个支部，她比我稍晚一点入党。还有一个黄宇也可以证明，是他介绍我入党的。

他们要我们写材料。我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材料，秘书要我修改，后来他们删掉了一些。闻天写的东西比我多得多。

他们“审问”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所谓“刘（少奇）张（闻天）勾结阴谋篡党”的问题。他们要他作检讨，他就检讨庐山会议问题。他定下这个框框，我没有框框。

流放肇庆和无锡

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讲话，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第二次王明路线时，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王稼祥、张闻天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九大以后，就宽松了一点，缓和了一点，我们的情况就有点变化了。闻天后来对我说，上午还讲我写的检讨通不过，下午就要我缩短，可能是要拿给主席看，我们可能快出来了。他当时就是这样分析的。

1969年10月20日那天，中央办公厅的王良恩来了，宣布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放出去，但是林彪一号令说因为备战的关系，不能留在北京，要到中小城市。我们给安排到广东肇庆。

我们这才从被关的小屋子里放了出来。王良恩把我们叫到审讯室。先找闻天，后找我。我见到闻天，已经病得不像样子，浮肿、苍白、胡子很长，一点精神也没有，是犯心脏病造成的。他

不知道我也在屋里，低着头没看我。王良恩从头到尾谈了一通《毛选》，当着我们的面宣布：中央决定解放你们，现在战争紧急，要备战，把你们送到中小城市，到肇庆去，有人护送；张闻天不能叫原来的名字，不准与外人联系，通讯只能用刘英的名字，否则出了事由你们自己负责；张闻天错误严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毛主席宽大；你们三天之内就走。闻天听后一句话也没讲，就离开了。我单独留下来跟王良恩说话，我喊毛主席万岁，说战争也不是马上能打起来，我不愿意去肇庆。王良恩说，这是中央决定；你要去，政治上、生活上要帮助他；医生讲他的病很重。我说，服从组织决定。问我们是乘火车还是坐飞机去。医生检查闻天身体，说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第四天，我们就走了。

王良恩派车让人把我们送到广东省军区，交给保卫部副部长王奎显，由他管。住了几天，王奎显派人送我们到肇庆的牛岗，也叫龙顶岗。这是军分区的驻地。军分区管理实际上是实行软禁。给了四间土房子，交给分区的政治部保卫科。我们来到之前，他们召集附近住的家属开会，说有个张老头有病，来这里休养，谁也不能到他家去，去了要受处分。这是一位家属跟我熟了以后告诉我的。我们的身份还是后来军分区的政治部副主任的老婆给捅出去的。她嫌老黄钉木头家具时弄出声音，就骂他，还大叫大喊：他们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老黄养的鸡叫了，她也干涉。还有一次，闻天起得早，起来之后就扫院子。他把树叶一堆一堆地放好。这位副主任的老婆又嫌扫树叶的声音太大太吵，也骂我们。我就去跟她讲理。她大吼起来："毛主席都不要你们了，你们都迁到这里来了，还这样'神气'！"这时，洛甫走过来，拉着我的衣服叫我走，又对副主任说，你有意见就向领导提。他对我说，倒了霉就倒了霉吧，和这种人争什么呀！

开始到肇庆时还叫搞点什么轻微劳动，事实上闻天的身体根本不行。后来又说是可以作一点调研。这样他就去工厂调查，还做一点笔记。

工资解冻前的六年，生活费他是120元，我是60元，小倩25元，就是这每个月205元，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油票、肉票，得到自由市场上去买高价的，所以生活比较苦。后来同意派老黄来，有时闻天想吃肉，老黄就到食堂买些肥肉。

1975年张闻天离开肇庆前

到肇庆之后，闻天常对我说，中国经济是个大问题。这是他文革之前就一直注重探索的一个问题。在肇庆调查工厂时，他总是仔细地问人家这方面的问题，边问边做笔记。可惜这些笔记本后来都给弄丢了。他看《资本论》，还做笔记，再就是听外国广播。那里政治部的陈主任，是个很坏的家伙。我后来又去过肇庆，警卫员告诉我，他们天天都要去汇报，看我们在做什么。一个贾政委，14级，比我低一半，懂什么呀？他很严厉地对我们说，我要警告你，你们在听敌台，部队里不准听敌台。闻天沉得住气，说我《参考消息》都看不到，我要知道国际消息。这个人讲，以后不准听了。闻天还是听，我放哨，见卫兵来就喊，太阳出来了，散散步啊。闻天是个书呆子，不会应付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的组织生活没有恢复，他每个月去交党费都没有人收。1974年恢复了我们的党籍，我们归市委管了，这才对我们客气了点。闻天多少年没有党籍了。恢复党员组织生活，他很满意，每个月亲自去交党费。工资发回后，闻天都拿去交党费。他说，工资应该交党费，这些年

都没有做工作了。我说，是不让你工作嘛！这有什么内疚啊。闻天说，还有积欠的党费，也要补交。他自己算了算，两个人这些年一共欠党费4000元，他也交出了。这个人一直到死，心都想着党，没有想着个人。

林彪叛逃事件传达之前，有一天闻天对我说，林彪为什么老不在报纸上出现，这里面可能有问题。我当时还说，可能是病了吧。他却说不会，可能有问题。后来开展批林，他很高兴。这时他就不停地写文章了。他身体不好，可是我劝他不住。除非犯病，他总是不休息的。即使犯病，只要精神一好就写起来。批林后不久，他就对我说，反"左"恐怕还会转到反右，因为再把"左"反下去，就要弄到上面了。后来果然就从批"左"很快转到批林彪的所谓极右了。林彪倒台之后保卫部长来找闻天。闻天写了一份材料，他们不满意。其实闻天是实事求是的。

在肇庆时，闻天因为心脏病两次住院抢救。那是部队医院，叫广东陆军总医院。这个医院一位姓梅的副院长是心外科专家，他亲自负责给闻天治疗。这位梅大夫人很好，常和闻天聊天。闻天病养好之后，他还到肇庆来看闻天。据说他后来听到闻天在无锡逝世的消息很惋惜，说就闻天的病而言是不该死的，因为他认为闻天的心脏病在肇庆时已经有所好转。

我们在肇庆那里一待就是6年。这中间闻天给毛主席写了几次信，都让汪东兴和"四人帮"给压下来了。他的信里面有些话，譬如我想看看可爱的祖国，过几年我就成了废品这些话，我建议他删掉。

1974年，邓小平批示给刘彬开追悼会，给他平反，冶金部通知我参加。我利用这个机会回到北京，住在冶金部白楼招待所。追悼会后，我去看王震，对他讲闻天的情况：他心脏病很厉害，没有办法医疗，氧气都没有，只能吃硝酸甘油。老的医生都搞掉了，年轻的对他倒很好，但是没有技术，拿不出办法，也没有抢救的条件。王震说："到北京来！去写信给毛主席。记着，要像王稼祥那样，写对过去的错误绝不翻案。毛主席怕他翻案。"我回去告诉闻天，他说："那不行！"我说："你写了怕什么？回去治病，不好吗？"他说："我的事怎么能不翻案？那是错的。"我说："你真是个书呆子，策略一点嘛，骗骗人家不行吗？"他还是讲，怎么能不翻案？我再三做他的工作，说你不写就走不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只要人在，将来有机会还可以申诉，他最后才同意写了。信里还给王震写了几句：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这封信是起了作用的。这个周转的过程，是后来汪东兴写了个材料说出来的。

我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人说过，闻天同志过去向中央写过那么多信都没有回音。汪东兴后来说明，信送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是张玉凤同志批的：张闻天的信毛主席看过了，批的是：来北京不合适，可到其他的地方去住。汪东兴这个人很坏。他在三中全会后还有个声明，把责任一一推掉了。闻天本来想到上海，没有回复，说只能到中小城市，于是就到无锡。

到无锡之后，我们是比在肇庆时期自由了一些，因为到无锡就脱离部队管理了，也没有专案人员跟着我们了。但是医疗条件比肇庆差了。

医生和市委同志根据他的病情都主张把闻天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去治疗，但是汪东兴说不行。老市委的几个人：组织部长、书记和市长，都是原来在苏北，同刘彬、项南、韩培信在一起的。这些人都靠边站，没有被打倒，但也不能起多大作用。跑上海，他们不能去，只有管闻天的常委周锡麟能去。他跟上海王洪文有联系，经常到上海去请示王洪文。王洪文管周锡麟，周锡麟管张闻天。张闻天要去上海治病、周锡麟不批。周锡麟是个造反派，工人出身，人还比较厚道，没怎么整闻天。毛主席死后，周锡麟被赶走了。

在无锡的时候，邓小平出来了，他"抓革命，促生产"。闻天说：有希望了，要搞经济呀！经济搞成这样，国家都垮台了。政治是口号，主要得搞生产。不久又搞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闻天很反感的。周锡麟来看闻天，闻天就当面问他，邓小平怎么错了。周锡麟说，他没有强调阶级斗争。闻天就说，我看"三项指示为纲"没有什么错，并且说，"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

那时闻天已经病重，他对当时逆转的形势，心情十分沉重。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常常发表意见，劝他少说几句都不行。他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说法很有意见，他说这样岂不是把共

产党给否定了。他看到胡耀邦同志1975年关于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认为很对,说“讲得好”。对于当时批判这个提纲是非常反感的,说:“现在不要真理了。”又从报上看到批判《论总纲》,他也很不以为然。他说:“《论总纲》写得很好,切中时弊,很符合形势的需要。”特别是当他听到一点“天安门事件”和全国其他地方类似事件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振奋,亲口对我说:“人心不死,中国是有希望的。”他病重后还是听广播,听后说社论没有新的东西,又很失望了。

晚年他就怕我生病。对他自己,在病中就是关心在组织上没有结论。

他的病一天天加重,有一天对我说,恐怕没治了,工资解冻后,我们有些存款,把存款交了吧!使馆买公债他带头,叫我也带头。我们存的钱多,就是因为买的公债多。我说不能都交,是否买点冰箱、电视什么的。他说,那就把我的4万元交掉。他说,长期没有工作,拿工资于心不安。最后写了个字据,他要我签名。我说,你还不信任我?就按他的意见写了。这4万元都交到中央特别会计室了。

上海不让去,得不到好的治疗。这是他过早去世的一个直接原因。闻天平时身体是好的,比我大5岁。发病时找南京医生来会诊,路上就要3个小时,而且还得预先通知。他们来了,看看有什么情况,会诊完就走了,没有做什么医疗。无锡没有治疗条件,根本没有解决治疗问题。既不能出去治,又不能拿东西来这儿,药又没有。实际上是要把他整死。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这样的。最后,闻天是1976年7月1日早上5点逝世的,南京医生晚上11点才到。

得到平反

闻天去世后,毛主席不久也不在了!我给汪东兴写了好多信,要求回北京,汪东兴一直不批。我得到批准回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住到了陈琮英家里。她对我好,是老战友嘛!她说:你住在这儿没问题,我不怕。在她家里知道把“四人帮”抓了起来,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一直到胡耀邦批了,我到1978年才住进南沙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去看陈云,说会开得好。陈说,到时候了,再下去我们都老了。陈云自下台后一直不说话。谁去看他,他都不谈政治,只谈病。后来要陈云出来,汪东兴反对,拿出主席录音,说陈云一贯右倾,不可信任。

张闻天、刘英1976年在无锡

耀邦一当组织部长,我就给他写了封信:耀邦同志,你现在担任组织部长了,现在我们干部有了家,我非常高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家了;你给郭玉峰打电话,郭玉峰是组织部军代表嘛,他不理,不敢找他,他手底下的也没人理;后来我去找叶帅,他批了,要宋任穷、我,还有几个人一起去找郭玉峰,这样他才见的;组织部要注意清查,清查那些整我们的造反派;组织部非常重要,要挑一些正直的人来组织部工作;因为要做大量的平反工作,我推荐了几个人。

耀邦看到我的信,知道我住在南沙沟,就来我家了。他的秘书跑到二楼,说胡部长来了。我说什么胡部长?一看他就穿着一件黑大衣,站在门口。他说:大姐,我来看你了!我说:你这个部长怎么跑来了?以前见都见不到你。他说:大姐,我回来第一个就看你!你有什么问题提出

来，我给你解决！我说：那好哇。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把张闻天的骨灰迁到北京八宝山；现在骨灰盒在无锡，锁在一个破箱子里，放在一个破房子里边，很潮湿；我想还应该纪念他一下。我不敢提开追悼会，只说骨灰寄存放在八宝山好一点。他说：那没问题，你写个信。我后来就写了封信。

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和他谈了我自己的处分问题。我对胡耀邦说，张闻天是张闻天，我是我，我不反党，但是到现在外交部还说我态度不好。住到南沙沟后，林中、杨清华、朱霖来谈我的结论，说取消处分，又说我态度不好。我不同意。胡耀邦说，我也态度不好，如果乱说，那才是真的态度不好呢。他叫我写个报告，我说已经给外交部写了。胡耀邦说，那他就去催一下。

我又对胡耀邦说，我现在岁数也大了，70多岁，不能做什么工作了，只准备把张闻天的东西搞一下。他说：那好，你就不要搞什么工作了，你就是休息，健康最重要。我说：闻天写的文章我想争取出版。他说：那以后都是可以的。

其他问题我就都不讲了。那时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只是个组织部长，没有多大权。胡耀邦催了外交部之后，张海峰（外交部副部长）马上跑到我家来了，给我看结论，还是留了"态度不好"这个尾巴。我说，我的态度是对的。张海峰说，不留尾巴不好结案。我不签，他没有办法，只好把结论又拿回去了。后来我被选为中纪委委员，住到京西宾馆，这时他们才派人来叫我在结论上签字，当然是不留尾巴了。

胡耀邦走后，我就给组织部写信，组织部批了我的信，后来又通知我，说胡部长叫我等一等，因为汪东兴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他讲骨灰"不必迁动了"，他们把汪东兴这封信拿给我看了。"四人帮"已经垮台了，这个人不识相呢！

三中全会以后，我就提了几条意见：把闻天的骨灰移回来，给他做结论，他写的文章要出版。王震、陈云都批：应该。通过了以后，耀邦又通知我：还要开追悼会。

骨灰这才迁了回来。耀邦派了老干局副局长陪我去无锡。我们是坐火车去的，虹生也去了。回来时是邓力群来车站接的，当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我把小倩也接回来了。她在无锡学无线电，学完了。

老干部局郑伯克来通知我，要给闻天开追悼会。没想到能开追悼会，我很高兴。他告诉我：本来中央决定，要给几个人合在一起开追悼会，由耀邦同志负责，让组织部安排；陈云表示，由他主持、要他致悼词，都行，但要给闻天单独开。这样一来，追悼会推迟了三个月，本来是5月开，结果到8月才开。写悼词的是胡乔木、邓力群。闻天当过总书记，还有个规格的问题，商量来商量去。写不写总书记？关键的地方是乔木把关的，历史决议也是他参加起草的嘛。

彭德怀、陶铸是放在在一起开的，张闻天、刘少奇是单独开的。开始的时候我说：会由邓小平主持，陈云致悼词。后来陈云说：还是邓小平致悼词，规格更高一些。邓小平也同意。我说：那就好。结果那天那么多人都来了。那时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见到了李先念、谭震林。有人说，刘英在追悼会上怎么还笑了。那是在同李先念握手的时候。他们两个和闻天有共同的思想，意见是一致的，在庐山会议以后来过我们家。这事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不说他们当时

张闻天、刘英和内侄女刘海燕1973年在肇庆

都和闻天谈了什么。他们非常怀念闻天的。见到邓小平，他说：好多年不见啰！我们1928年就认识，中央苏区时在一起，长征时又在一起，1959年以后就再没见过。

安子文和刘竞雄夫妇通过女儿和女婿，他们是父母被打成黑帮时结婚的，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一家人都感激您，是张伯伯救了我们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安子文同志的儿子也打电话来，他说："我爸爸病了，不能来看您了，他要我告诉您，他感激您。张伯伯伟大。张伯伯敢承担责任，不然我们都完了。"我说，不要你们讲，闻天同志不过是实事求是地讲出真实情况嘛！

后来薄一波看见我的时候老是感谢："要不是闻天，我就是叛徒了。"薄一波对大跃进是有意见的。他说，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但是这一个指头也不简单，问题严重。贾拓夫讲真话，就给整死了。讲真话不是时候，不够策略。我多亏没有去庐山。后来人们来查，我说我没在庐山，而张闻天又没跟我说，我有我的主张，他有他的主张，两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

张闻天文稿的编辑整理

在"四人帮"还没有倒台的时候，形势墨黑。1974年我回北京把闻天写的稿子带回来，也是提心吊胆的。我去见王震，他说：张闻天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者，他写的东西最珍贵了，不能烧掉。我说：烧是不能烧掉，可是写的东西放在外头，有危险哪。他说：放在我这里！于是就把稿子放在他那里了。后来胡乔木当了社科院院长，邓力群当了副院长，王震就把稿子交给他们两个人，对我说：我现在把那些文件都交给他们两个人了，叫他们给你出版。后来胡耀邦批：成立（张闻天）文集组，很顺利。如果现在再搞，会好难的。现在博古，还有好些人要再搞文集，都弄不成了。

王震对洛甫很好。1952年洛甫去新疆，王震陪他参观。他认为王震有成绩，给中央打了报告。总理为这件事找我谈，说王震反对习仲勋，洛甫支持王震，不好，要我告诉洛甫。我回家后告诉了洛甫。洛甫说，我在新疆看到，王震是有成绩的嘛。

1974年回北京在医院见到胡乔木。他问起洛甫，他关心呐！我说：他的病很严重，没有办法医疗，请求没用，不批。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回来，又在医院见到乔木，乔木悄悄问我："洛甫同志怎么样啦？"我告诉他已经不在了。他一惊，说他自己现在也神经衰弱得很厉害，简直不能睡觉。那时正在反右倾，批三项指示为纲。乔木正在挨整，灰溜溜的。乔木对闻天的印象很好，曾对我说，闻天同志那些文章（指在肇庆写的文稿），他是写不了的。后来他在北戴河找我谈过两次，专门谈闻天。

胡乔木有时有些偏。一个人矫枉过正，就有些偏。邓力群有一次跟我讲，他去看邓小平。邓小平问，乔木呢？邓力群讲，他现在没事了，也挨整了，想来看你又不敢来。小平讲，为什么不敢来？邓力群讲，三项指示为纲，揭发了，也批判了，他对不起你。邓小平讲，那没关系，那时的事管不着，叫他来。邓小平还要用他哩。邓小平有气魄。邓力群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他写的，是他的思想，邓小平不知道。所以，邓小平一个时候是很重视邓力群的。邓小平很客观的，说自己还不是一样，庐山会议也批了，不批不行，是立场问题，不但批彭张他们了，还要自己作检讨。周恩来也是左一次右一次检讨。

真正组织搞《张闻天文集》的是邓力群，他出了好大的力。邓力群讲，要把徐达深、何方搞回来。乔木也很支持。成立文集组，曾彦修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他是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身体也好。先出了些小册子。他很积极，说：先出版再说，在报纸上登登。胡华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到我家来对我说：要给张闻天写传记。我说，没有人搞。他说：在人大（人民大学）搞，我负责，我有研究生。施松寒、张培森都是他找来的。可惜不久施松寒就得癌症死了。

张闻天这个人

一个人的出身是很有关系的。闻天是搞学问的，是搞文学的。革命后还是搞学问。他是个真正正直的人，是个学者，不是政客。闻天是知识分子出身，一个人搞文化工作，是单干户。他就是读书，研究问题，写东西，别的事情不管。

闻天是个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他这个人是非常清高的，和别人没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从不和人开玩笑。别人和他开玩笑，他总是很被动。他处理事情也太讲原则，太机械了，没有灵活性。别人来找他，他就是谈工作，谈学习。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关向应来找他谈工作，他正在写东西，说等一等。关向应等了半个钟头，不等了，走了。我提醒他，他才抬头，可是人已经走远了。别人来聊天，他从不搭白，常常是别人还说着话自己就走开了，去搞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他的时间宝贵啊。他不可能同人聊天，只好由我接着张罗。闻天不请客。我是太了解他了，但是没有办法影响他。

南京有人来向我了解张闻天搞新文化运动的情况。闻天早期搞新文化运动，是从这起家的。茅盾、鲁迅都很尊重他的。他同茅盾和茅盾的弟弟沈泽民这些文化人搞到了一起，所以后来不在河海学习那些东西，而是到美国去，到日本去。沈泽民介绍他入党，他从此不搞文学，不写文学作品之类的东西，去搞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哲学这些东西去了。他到了苏联，就搞起了哲学，新文化运动不管了。他连高等数学也懂啊。茅盾讲：如果张闻天不搞社会主义而搞新文化运动，是可以坐一把交椅的。他写《旅途》这篇长篇小说时，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写过长篇小说。闻天一直保存着这部小说。后来在延安，乔木要把他过去的文学作品登出来，找了一篇《飘零的黄叶》。闻天说这是年青时写的。乔木说青年时写的有青年时的风格，对青年是有影响的。

闻天的文学作品从反封建、反旧式婚姻开始。要搞自由恋爱，所以他和家庭从此就脱离关系了，直到解放了，他家里的人才找来。他跟我讲过，他问他母亲：你要儿子还是要媳妇？他母亲说，儿子媳妇我都要。他说：只能要一个，你就要媳妇吧，媳妇照顾你。这样闻天就走了，再也不回去了，连地址也不告诉母亲。要是告诉了地址，她就会把媳妇送去，让她再生个儿子。媳妇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先是维英，后来是引娣。母亲是个农村妇女，种地的。他的媳妇也是农村妇女，也在家种地。闻天从苏联回来做秘密工作，地址就更不告诉家里了。后来闻天母亲去世，他父亲找了个后母，年龄比闻天还小，也比我小，生了个女儿秀琴，年龄同闻天的孙女差不多。闻天把他的弟弟妹妹都带出来了，秀琴一直跟着他读书，后来和我的堂弟结婚了，生了两个儿子。

他是历来反对个人迷信的，说学毛主席主要是学他的思想。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不挂像。他说：我连马克思的像都不挂。王震很好，他了解闻天。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说他不敢来我家，怕来后交代不清楚。他让我带给闻天一句话，对毛主席要迷信，这样事情就好解决了。我把王震的话告诉了闻天。闻天说，不能迷信。文革开始，还是孙世平给买了张毛主席画像挂在门口的。

他是很节俭的，不晓得为什么那么节约。我买床单，他就说用钱多啦。衬衣坏了不肯买，领子坏了要国泰（陈国泰，生活秘书）换个领子，袖子坏了换个袖子。老黄笑话他：领子袖子不是一个颜色，时髦啊！到使馆上班先关电灯，到仓库时见灯亮着也去关掉，到处关灯。我笑他“农民意识”，他说我“地主意识”。

他讲留了钱给子女亲戚没有好处。子女一个人给3000元，说给多了会腐败，乱用，他们有本事自己去挣。妹妹来看他，他给个三百、五百的。我说，太少了。但他说，给多了有什么好处？我就用我自己的钱，给她补2000元，说：她家孩子多啊，过去我们都是常常接济她们的。闻天说：孩子大了不能挣钱吶？老补助她，她就老去生孩子！■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2期　要目

鲁迅和瞿秋白的交往　　朱　正

郭沫若与“孤军派”
——兼论其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周　文

徐志摩家世考辨　　王从仁　邵华强

左联是怎样解散的？
——兼论鲁迅与左联　　王锡荣

陈涌小辑　　王增如　等

张恨水小辑　　解玺璋　等

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　郭道晖　口述　　邢小群　鲁利玲　采访

1979年4月，全国人大新成立法制委员会，那时彭真刚恢复工作，任法委会主任，王汉斌任办公室主任，手下缺干部，就把我调去。我是50岁才调到法工委开始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谓晚年改行。从1979年到1987年，我在法工委工作8年，先后任理论组组长、民法国家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秋，我想专搞学问，离开了全国人大到中国法学会，当了研究部主任，那年59岁了。干了一年就到60岁，一刀切让我离休。不过，1989年初，法学会会长王仲方把我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离而不休,一干又是九年，到1998年我70岁才卸任。

我改行搞立法工作，是希望做些有益于国家法治建设的事，补回被夺去20年的青春。我在解放后受折腾历经坎坷，对中国无法治、不讲人权的恶果，有切身体验，所以一直为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法治、人权而鼓呼。立论行文，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以"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兴法治、为社会求正义"为主旨。

80年代初期政治改革与法制建设的动力

我认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是思想解放、民主法制搞得比较好的时候。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被解放了的"走资派"，对文革有痛切的反思，对民主法制有积极的追求。因为他们深受其苦，彭真就是个代表。

有一次，彭真跟我们办公室的干部谈到这个问题说："我在解放前坐了6年国民党的牢，但是在文革期间又坐了9年半，坐的是我们党自己的牢。这就很荒谬，想不通啊！我在监狱里就老想这个问题。后来，才恍然大悟，这是我们过去轻视法制、否认法制所受的惩罚。"所以，他一出来，就狠抓法制。他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应当说比其他领导干部强，也比他自己在文革前的思想和行事要强。整个那一代"走资派"，受够了苦，对没有法制，没有党内民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有切肤之痛。所以，当时法制、民主搞得热热闹闹。应该说，这也是政治改革。有人总结经验，说中国的"优点"不是先搞政治改革，而是先搞经济改革。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粉碎"四人帮"，就是最大的政治；没有这个政治改革，怎么能有经济改革？另外，恢复人大制度，建立法制，都属于政治改革。虽则这只是一个起点。

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对法制建设的作用很大。这一批老干部出来以后，站在领导位置上抓法制，是当时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的主要动力和主导力量所在。没有这些人，不可能在那种局面下推动改革。包括邓小平，刚开始，他对西单民主墙是很赞赏、很支持的。因为文革时他们自己受打压，有切身体验，就产生了迫切的民主要求和法制要求，形成改革动力。他们一旦重新掌握权力，就利用权力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79年6、7月份，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那次大会上，在彭真主持下，一口气通过了7个基本法律。《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外资企业法》，都是基本法律。一次人大全体会议通过7个基本法律，这不仅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了。

其中，《刑法》的制定，是彭真亲自主持的。他特别强调，要专设一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中规定"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刑讯逼供"，"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还特别规定对以大字报、小字报侮辱、

彭真在人大法律法制委员会联合座谈会上讲话

诽谤他人的罪名和刑罚。在今天看来，这些条文用的不是法律语言。当时，彭真为什么一定要写上去，就是直接来自文革的教训。后来的《宪法》特别有一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句话背后是有具体东西的，就是文革中对走资派“坐喷气式”，“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留下的深刻烙印，那是在侮辱人格！还有一个是反对诬告，把“诬告者反坐”的古代的法律原则略加改装也借用过来了。我提出反坐不好，而且要分清是错告，还是有意的诬告，错告不能处罚。我这个意见被接受，纳入了法条。

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彭真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说，在此后的法制建设上，彭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1982年宪法的制定

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建议，决定修改宪法，并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实际上，这项工作主要是彭真在主持，一直持续到1982年2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我参加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的讨论会的秘书工作，做记录，整理简报，亲历、见证了修改宪法的法定过程。

此前，在彭真、王汉斌主持下，把胡绳、龚育之，还有宪法学界的“四大名旦”——张友渔、萧蔚云、王叔文、许崇德等专家都请去了，负责研究和草拟宪法草稿。草稿经党中央审议后，形成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宪法修改委员会，进行讨论修改，最后由全国人大全体大会通过。

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过程中，胡乔木做过修改宪法的报告。据内部信息，胡乔木曾建议，人大可考虑改为两院制，把政协变成上院，人大变成下院。这个意见被邓小平否定了。在权力结构体制上，邓的思想是权力要集中，认为搞两个院，互相牵扯，效率太低。

对此，我的看法是，具体决定某一件事情，一院制比两院制效率高；但是权力没有互相制约的话，出了问题，那个效率就是负效率了。

在这期间，中宣部还主持召开过全国性的理论讨论会，规模很大，一共300多人，似乎要继承理论务虚会的传统。法工委派我参加了，编在中直机关的第一组，成员主要是党中央政策研究室和文献研究室等机关的干部。我作了一个“关于非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问题”的长篇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石仲泉还特地将我的发言专出一期会议简报。后来胡乔木质疑我提出的“非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的命题有何理论根据？我摘引了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诠释，他默认了。

理论务虚会和这次理论讨论会之后，保守思想有所回潮。在自己受压制、争夺权力的时候，一些人会极力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支持新闻出版自由。但一旦当权后，如果这种自由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地位时，就不干了。我记得列宁讲过一句话，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害怕人民愚蠢；一旦掌握政权以后，他就害怕人民聪明了——不当权时要争取民主自由，唤起民众，开发民智；当权后，人民有了民主自由，聪明了，对他的地位就会有威胁。列宁这句话是对资产阶级讲的，其实也是有一定普适性的客观规律。权力先天就有

侵犯性，像脱缰的马不受约束、没有监督，必然专横腐败，这是公理。布什讲："我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总统，只能在笼子里面讲话，不能超越这个笼子。"权力是要关在笼子里的。陈云也讲过"鸟笼"，不过他的笼子只是要限制市场经济。其实政治权力更要有一个"鸟笼"，而且应当是比"鸟笼"更大更结实的"兽笼"。

提到《新闻法》，我记得彭真1983年就曾让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草拟。但是，后来一位元老说："国民党的时候搞《新闻法》，我们共产党就利用《新闻法》的一些空隙跟他做斗争。现在我们掌权了，再出《新闻法》，人家不也会利用这个跟我们做斗争吗?"这件事就这样被搁置下来。

至于《出版法》，其实也早有一个草稿，但中宣部要求《出版法》一定不能使私人有权利出版刊物，搞出版社。他们要求规定，办刊物，办出版社，公民本人无权申请，而要由你所在的单位的主管部门申请。譬如清华要办一个期刊,有资格的申请人不能是师生或校方，因为学校是由教育部主管，学校对外发行的出版物，要由教育部提出申请。这种规定连王汉斌也觉得不妥，又不好直接去顶，他就找宪法学和法理学的一些教授来讨论。我也被邀参加。大家一看，说这样的《出版法》拿出去的话，在国际上的形象太丢丑了。作为公民，连申请的权利都没有，这叫什么出版自由？这样的法，我们宁可不立，也不要让我们国家的形象受损害。王汉斌就借重专家的意见，以这个理由上报，主张暂时搁置立法，所以直到现在《出版法》也没有出来。

几番风雨话办刊

我主编《中国法学》时，那场政治风波刚过，一时理论界万马齐喑。该刊出现前所未有的稿荒。更为难的是法学界也刮起一阵以"左"批"右"之风(我在审稿和撰文时特意把"右"字都打上引号,王仲方会长敏锐地发现了我这个"小动作",打电话给我表示赞许)。司法界有的领导人大讲"法学界自由化思想严重泛滥"，要求大加"清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理论刊物发表4万言的长文，历举法学界几十个"反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化"观点，甚至把认为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有"法"的学术观点也列为"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另一位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光博还写了5万字的《法学错误思潮评论提纲》，把法学界一些学术探索，上纲为"为动乱暴乱的口号提供学术论证"，他甚至号召法学界"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外地一位副教授居然跑到编辑部，质问为什么不登他批判两位年轻学者的所谓"自由化"的文章，指责主编是在"包庇"这些年轻人。

紧跟还是抵制？摆在我面前，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但我还是秉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态度。在《中国法学》上我连续撰写、发表了几篇评论。在《正本清源，繁荣法学》(1989年8月)中指出，不能把学术探索过程中的一些观点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正本清源不是要重新回到'左'的僵化的老路上去。"在《学习马克思著作，繁荣马克思主义法学》(1990年6月)中，强调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法学思想，区别哪些至今有效；哪些已经过时；哪些具体结论原本有片面性或失误；以坚持必须坚持的，和扬弃过时的。在一片反"自由化"的浪潮中，我还撰发了《继续贯彻"双百"方针》(1990年10月)的评论，强调"学术无禁区"，要"区别对待政治是非与学术是非问题"。1992年初，我在《中国法学》上又撰写了《法学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评论。

连续发表的这几篇评论，法学界反映"有如一阵清风吹来"，"顶住了压力，维护了学术殿堂的尊严"，"安定了浮动的人心。"特别是《中国法学》作为代表中国法学会的全国性权威刊物，如果不能把握正确的导向，而随波逐流，后果不堪设想。

1990年10月，在中国法学会举行的全国研讨会上，当有的学者强调对法学界的"自由化泛滥"的严重形势"决不能低估"时，我当即针锋相对地说："更不能高估！"后来我在武汉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法学院院长李龙教授作为主持人就以此为例，特别向听众介绍和赞扬了这种力排众议、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气概。

也就在这次会上，我宣讲了提交本次大会的论文《关于稳定的辩证思考》，当时在"稳定压倒

一切”的情势下，我却着重论述稳定与民主、法制的辩证关系，认为“不能以为稳定必然要牺牲民主，相反，只有发展民主，才会有真正的社会稳定；维护稳定要加强法制，但这种法制也必须是立足于民主与改革的法制。”还特别有针对性的指出，不能因为害怕动乱而产生消极的“防民”思想。这篇论文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纷纷索要该文。一些报刊也加以摘载。

此后，我又在《中国法学》上开展了关于“权利本位”、人权法制、“晓南风波”的讨论或评论。后者是针对《求是》杂志1996年发表的一篇化名“晓南”的文章《当前我国法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该文把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界许多属于拨乱反正和探索创新的观点，上纲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加以政治性批判。由于该刊的特殊地位，一时引起法学界的惶惑和惊悸，纷纷打听该文的政治背景，猜测是否一场大批判“山雨欲来”？

在这篇类似声讨法学界的“檄文”发表之后数日，我立即在《中国法学》编委会上提请编委讨论。编委会都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沈崇灵、江平、陈光中、高铭暄、应松年等等，都是名家，一致严词批评该文错误倾向，尖锐指出这篇“奇文”完全歪曲了法学界的现状，要求该刊主编“应当亲自来听听法学界真正的声音”。我随即整理编委会的意见向该刊总编辑邢贲思反映。在法学界舆论的敦促下，邢在编辑部大会上批评了有关责任编辑“为什么不事先征询法学家的意见”，并责成另一位编者以个人名义，撰写了另一篇《关于法学理论的几个问题》，把“晓南”所批判的几个主要观点一概归属于“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从而否定了“晓南”的政治批判，使一场风波得以平息。

当时有人对法学界张文显等青年学者所主张的“法应以权利为本位”的学术论点，上纲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加以批判，引起了这些学者的不安和恐慌，很紧张，我对张文显说：“你把文章拿过来，我给你登。”我把他的文章放在“法学争鸣”栏，表示这是学术问题，并且连续发表各种不同观点的讨论。文章一登，这些年轻学者说《中国法学》吹来一阵清风，感到“松了一口气”。后来张文显当了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校党委书记、吉林省高等法院院长。

在89风波前，我还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吉林大学两位青年学者的文章，主张正在制定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应以保护公民此项宪法自由权利为主（适度限制也是为了保护）。“六四”后，作者因此受到吉林大学党委的审查。我就亲自致信该校党委，证明这两位青年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无政治问题，并援引我国老一辈法学泰斗和“老革命”张友渔同志在本刊发表的相同观点的文章，使他们得到解脱。平日我也常注意扶持青年，使他们在刊物和会议上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刚发表时，正值法理学研究会举行年会之际。作为该会副会长，我立即建议结合法理学研究的问题，学习这个重要谈话。起初有的教授对这个讲话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主要是对“左”是“主要危险”、要着重防“左”不理解不赞同；个别人甚至点名指责我是否要借邓小平谈话否定马克思主义？我当即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反驳道：“现在就是要高举邓小平关于防“左”谈话的旗帜，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言既出，满座感奋。一位青年教授为此赋诗，称我是“曾携后辈战风雨，法学世界砥中流。”

这期间，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党的权威、权利与国家权力——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主要是指出党权不能高于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文末还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世袭的天赋权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文章发表时一片赞扬声。但不久台湾《联合报》在某版头条报道了这篇文章，大字标题是“大陆法学界挑战以党领政”（其实我只是说不要“以党代政”）副题是“学者郭道晖认为人大高于一切政党”（这原是我借用列宁的话：“苏维埃高于一切政党”）。这一来，一些人习惯地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起来批判。中国法学会的一位副会长佘某当即在常委扩大会上针对此文向与会学者提出警戒：“发表文章不要授人以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一位党委书记也见风紧跟，撰文批判，但受到《法学研究》编辑部的集体抵制。也有的人则在《求是》的《内部文稿》和《真理的追求》杂志

上大加挞伐，说我这篇文章是“制造混乱，否定党的领导”。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我文章中那句关于党的执政地位的话，后来却几乎雷同地写在2004年党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里边：“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中央领导人阐释这个决定的文章中还特地援引了这句话，说它“精辟概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教训”。这句话也被任仲夷谈话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等多处引用。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也说：“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共产党不是天然的、当然的（法定的）执政党（宪法序言里只以总结历史经验的语言提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作用，而没有说它是当然的法定的执政党，执政党或党的领导人成为国家领导人执政，是要经过人大选举的）。我们共产党如果不立新功、还继续搞腐败的话，很危险，有亡党的危险。苏共不是从执政党地位下台，成了在野党了吗？国民党不是也一度落选被刷下来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1994年我的论文中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早说了10年。被引入中央的文件后，批判者不作声了，有意健忘。

人权禁区的突破

这期间我还发表过一篇《人权禁区是怎样突破的》，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法学》上面，最后收进我主编的一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早在1979年，曾有人在《北京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通栏大标题说“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那个时候人权还是敏感的禁区。

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宣部理论局连续开了两次专家会，讨论人权问题，我都应邀参加了。

第一次开会是1989年11月10日，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靳辉明找了十几个专家开会，传达了当时国务院总理的一个批示：国外有人说人权是超国界的，这是错误的，一定要批判。坦率地说，会上来自政法实际部门的同志在发言中是较谨慎

龚育之

的，来自学术理论界的学者因为也是初次试探，还不大摸底，有点欲言又止，但总的倾向却是表达了要认真开展人权研究的强烈要求，并没有完全按领导指示去批判“人权超国界”的观点。

我在会上按我事先准备的提纲，讲了两个方面。一是人权问题要把握的几个理论原则；二是当前人权实际活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认为，就人权本身而言，是人皆有之（普遍性）和人该有之（应然性）的权利，所以是超阶级的；在人权的理论和法制上，则既要讲阶级性，又要讲历史性。人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各阶级与各个历史时代，人权概念的内涵不同。要从历史发展上研究人权，把人权观的阶级性放在一定历史范畴来评价，不能仅仅说资产阶级人权都是欺骗的。

在人权的法律地位上，既要讲人权的国内性，又要讲人权的国际性，人权既有属于本国的内政问题，也有超国界的一面，应该分开。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是超国界的，人权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只要是人，都有这个权利，这是超国界的。要把承认人权有国际性同反对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加以区别对待。即使对人权的国际干涉，也要具体分析国际法所允许的合法制裁、人

郭道晖

道主义干涉同非法干涉的区别。

在对待人权的态度上，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高举马克思主义人权旗帜，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我国人权保障制度还有缺陷，有待改善。我国人权立法不足，执法上有侵犯人权现象，党政官员和普通公民的权利意识、人权意识也很薄弱。在人权的实现上，既要讲理想，又要讲现实。人权是人人应当享有的应有权利，具理想色彩，又受现实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条件所制约。再则国内对人权的理论研究要同国际上有关人权的外交活动既相适应，又相区别。应贯彻“双百”方针，打破禁区，鼓励对人权理论的学术探讨。

会议主持者本来是奉命行事，是想听取一些专家意见，对上面布置要批判“人权无国界”观点作出妥当的回答。但在听到专家学者的意见后，主持者认为有启发，表示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开展人权研究的问题。

1991年3月2日，中宣部理论局再次召开人权问题小型座谈会。这次除前次一些学者外，还有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参加。他传达了江泽民有关人权问题的一个重要批示，大意是说，美国肯尼迪人权中心在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一封信中，根据一些道听途说，对我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攻击，说我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受到非人道的对待，也由于我国一些丧失国格的外逃者的渲染，连达赖也成为人权斗士，我们倒成了专制魔王。其实，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他们自己也有许多违反人权的现象，必要时应当加以揭露。从理论上讲，人权有它的阶级属性。当然这样讲，西方人士不易接受。总之，这个问题联系到民主问题，要认真对付一下，建议对人权作一番研究，回避不了。

看来上面的意思是为了对付外国的攻击，而关注和要求研究人权问题，想把人权的讨论局限在批判国外的攻击方面。不过专家们认为，国外的诬蔑我们可以批驳；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我们自己的确存在问题。因为我们搞法律的都知道，一些司法人员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不都是人权问题吗？

这次不只是一般地议论议论，而是落实了措施，由中宣部理论局拟就了8个研究课题，当场确定了负责主持研究的单位，立即着手收集资料，编写一套“人权研究资料丛书”，这套丛书后来于199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参加这个会10天后，3月12日，我以《中国法学》编辑部和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名义联合召开了“如何开展人权与法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座谈会。到会的20多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研究人权问题首先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不同学术观点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会上还提出了一系列人权理论选题供研究参考。随后其他单位也开了一系列人权讨论会。我在《中国法学》1991年第3期上撰发本刊评论员文章《深入开展人权与法制的理论研究》。我当时说：“讨论人权问题是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此后法学界研究人权理论和呼吁推进人权法制的劲头日益强大，终于促成人权入宪，通过宪法修正案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宪法最高原则。

从法制到法治

在人权入宪以前，另一个重大的政治举措是法治入宪。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以第三个宪法修正案形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党的基本治国方略与目标，纳入宪法总纲第5条，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宪法准则，这方面法学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单是用词上，由“法制”改为“法治”，就经过20年的徘徊。这就是所谓“刀制”和“水治”的争论，这个提法是我的“首创”，得到法学界的认同而流行起来。

起因是这两个同音异义词，讲起话来不好区别，我就用“刀制”和“水治”的比较形象说法。因为“制”是立刀旁，“治”是水旁。重要的在于其内涵不同。“法制”在英语是legal system，即专指法律制度；而“法治”（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治国的原则，它要求一切人和组织（包括执政党）都要受法的支配、约束。表面看来这只是名词之争，实际上有观念上的差别，我指出这种差别体现在“工具论”的法律观和“价值论”的法律观的分歧上。“法制”是个中性词，专制的封建社会也有完备的法制，但与民主无缘。工具论者虽也接受“加强法制”的方针，但往往把法律只是作为统制国家与控制社会的手段或所谓“阶级斗争工具”，即Ruled by law，用法来统治；而不是受法的统治。就会把法制只当作治人的“刀把子”，难以同封建时代的法制划清界限，搞成“人治底下的法制”（这是我创拟的一个命题）。而这正是当今人治的一种表现形态。

法治的价值论者则强调法律的民主性、正义性，我认为不仅民主要法制化，法制也要民主化，法制关注的焦点是秩序，法治关注的焦点是人民的权力与权利至上，是法律的至上权威。称之为“水治”，也取“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水象征人民。一切公权力由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授予，并受宪法与法律的监督与制约，从而体现了法的正义价值，而与人治相对立。

1996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撰写讲稿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家福、李步云几位学者，原题用的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事先拿到司法部和中政委审查，却将它硬改成“法制”国家，理由是中央文件从未用过“法治”一词，这也是因为过去一直认为“法治”是西方的民主，我们要跟它划清界线。记得80年代初期我在法工委工作时，有一次彭真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谈话，他强调法制的重要性，但后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写成“法治”。彭真要他改正。80年代上海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漫之曾说过：“不能把法制当成刀把子”，后来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9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发展的规划，也是用“法制国家”词语。

后来我和《法学研究》的主编李步云教授相约，在我们各自主编的期刊上发表他们这个讲座稿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论文时，坚持用“法治”和“法治国家”的提法。

到1997年，龚育之参加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起草。他原也是清华化学系的学生，湖南人，我在清华当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他是化学系的支部宣传委员，我们工作上有联系，比较熟。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们法学界争论‘刀制’和‘水治’，到底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我就讲了一遍。他听了以后，说：“你讲得有道理。”他是党中央的笔杆子，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他如果同意改，事情就好办了。当时法学所也向中央提供了有关材料。终于中央十五大报告就改“刀制”为“水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党的决议文件一改，此后所有的文件和宪法就都改用“水治”了。

当时，我还特别对龚育之说：“你立了一功。”为什么呢？他参加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其中收入了邓小平在解放前写的一篇文章《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该文指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他批评一些同志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的法令，甚至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党员高于一切”。他尖锐地指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它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这篇文章是我们今天要求“党政分开”、反对“以党代政”和“党权高于一切”的理论根据和巨大思想武器。我在撰写有关这一问题的系列论文中都反复援引和推介小平同志这篇文章的观点，视为至理名言。我对龚育之说，我特别感谢你将这篇文章收入邓选，使之得以流传，成为宣传和实践法治的权威根据。

可是他却说，是否收入，在起初编辑组内部还有过一场争议。有人以“过时”为由，反对收入；有人以观点太过尖锐直白，可能被人利用来否定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搞自由化。但是育之却冒着风险，力排众议，一再坚持，终使此文入选。■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

○ 束美新 口述 许水涛 采访

束星北的家人

父亲束星北和母亲葛楚华先后生了七个孩子，依次是儿子束越新、女儿束沪新、儿子束孝新、束庆星、束义新、束润新，最后是我。自从1931年父亲回国结婚，母亲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父亲的身旁，在父亲最艰难困苦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撑。我母亲慈悲为怀，厚道、大度。无论别人说父亲什么右派啊、反革命啊，她都坚决地与父亲站在一起，精心操持家务，认真抚养孩子，与邻里的关系也一直很好，遇事处之泰然，从来没抱怨过。

母亲9岁时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在湖南湘乡，母亲从此在教会学校上学，学会了爱，学会了宽容大度。母亲常常对我讲，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嬷嬷们的奉献精神，但学校却说教会是特务机构，这和从母亲口里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母亲总是对我们讲，后退一步，天地宽。做人不要光考虑自己争面子，更要学会给别人搬梯子。

肃反运动期间，父亲受不了，曾想到自杀。1955年5月的一天早上，母亲悄悄地指着脚盆里父亲那套湿透了的衣服告诉束庆星，你父亲昨天晚上去过海边了，你不要只顾着看书，上去看看，和他谈谈话。哥哥就告诉父亲可不要想不开，既然从来没做什么亏心事，就不需要害怕，事情总归会查清楚的。父亲说：如果我死了，你敢不敢去北京为我告状？哥哥坚决地回答，如果你死了，我就不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去也活不过来了。如果你不死，我敢，现在就陪你去。不久，哥哥陪父亲去了青岛市检察院。听完父亲的陈述，检察长问：“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父亲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那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那就让人家说去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的多少来定。”他接着说：“你是教授，过去用笔杆子、嘴皮子工作，现在是参加实际斗争。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我们要接受党的考验，要挺直腰杆，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检察长将他们送到门口，并再三叮嘱父亲要记住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度包容”和“忍耐”。此后没听说他要离婚、自杀。当时，四个孩子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两个在小学，父亲不能不有顾忌。

我从来没看见父母互相指责和争吵，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有时候，他们可能闹别扭，父亲跟母亲赔个笑脸，什么问题都过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肃反期间，我七八岁，半夜睡觉醒来，听外面的房子里父母谈话，声音很小，母亲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离婚，我没有别的条件，我只要带着妹妹。”我听后很害怕，担心了好一阵子，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离婚的情形。

束庆星1956年从青岛二中毕业，高考成绩很好，父亲当时已经挨整，受到牵连，清华北大录取时，他的档案被甩到一边，亏得还没录取完，父亲获得短暂的平反，他才得以上复旦大学。我大姐束沪新只考上了石家庄俄语专科学校。二哥束孝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成都机车车辆厂，后被送去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还有一个哥哥下乡到莱西。母亲原在山东大学校产科工作，“反右”受牵连，站在凳子上被批斗。1959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时，她被迫辞职。直到1983年底，经山东省政协主席赵芳洲过问，山东大学才为她补办了退休手续。

大哥束越新1950年18岁当兵，做到飞行教官，父亲划为右派，又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就

1975年春节的全家福：前排是父母亲的孙子辈，第二排中间是父母，左1为四儿媳王惠玲，右1为长女束沪新（排行老二），中间左1为小女束美新，最后一排从右往左分别是长子束越新、二子束孝新、四子束義新、三子束庆星、五子束润新。

不让他飞了，1959年复员回青岛。回来后强迫父亲写检查，家里气氛才有点沉重。当时我真的从心里恨他，我的两个哥哥也恨他。后来大哥对我说，父亲犟，不这样，说不定早就被打死了，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父亲不想写检讨，检讨确实是他的亲笔，但据我所知，很多检讨是大哥让他写的，甚至是我大哥写完让他抄的，但是大哥不承认。大哥坦率地认为改造的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认为父亲基本上没变，还是老样子。我只能说他学会了保护自己，变得更低调更成熟了，但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和大哥的看法一致。

文革初期，山东海洋学院、青岛二中等好几帮学生抄家，要带走我父亲，大哥就和他们争吵，说，你们找青岛医学院去，没有青岛医学院的同意，你们不能把人带走。学生们只好带走母亲和大哥，后来看我大哥穿军大衣，有所顾忌，抓我母亲也没什么用，才将我母亲和大哥放出来了。后来我们逐渐理解大哥了。他等于从天堂到地狱，人生落差太大了。我和大哥开玩笑，我们弟妹都没进过天堂，都没有你那样的感受。

1960年，父亲看到大哥从一个飞行教官沦落到街道上拉地排车，就全力指导他研究颜色光学。颜色光学是一门边缘物理学科。父亲教大哥物理、英语和德语，大哥也很刻苦，两个人全神贯注地研究学问，写出了《颜色光学》一书，就不大在乎外面世界的事了。父亲的精神完全转移到帮助大儿子重新站起来的信念中。改革开放后，大哥创立了颜色光学研究所，并担任颜色光学学会会长。

父亲在月子口水库劳动期间，每月20元生活费，大哥复员回家，没有工作，母亲也没有收入，我们几个未成年，生活异常艰难。1960年他到青岛医学院，拿到85块钱，日子过得依然紧张。当时运动不断，好在他人缘好，帮助别人修半导体什么的。打饭的时候，伙房师傅特意给他多加饭菜。

我家从各方面都是优先考虑父亲的。灾荒年代，母亲在阳台上养两只鸡，鸡下蛋以后首先考虑给父亲增加营养，然后考虑我大哥。我1964年上高一，被传染上了结核病，为了治病，家里只好变卖东西，包括樟木箱子等。父亲非常坦诚，邻居小孩找我玩，他就说，妹妹得结核病了，小心不要传染上，别和她玩。

1971年底，父亲跟随青岛医学院到北镇，就是今天的滨州。当时连卧底的手段都用上了，动员他的一个学生监视，定期向公安部门反映他的情况，我也看了档案中的很多揭发材料。我不怪这个学生，他卧底的事泄露，遭人白眼，被迫离开山东大学，他感觉窝囊，想找我解释，我说没有必要了。那个年代向党汇报，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只有在民主意识健全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

父亲一心想摘帽子，但一直没摘成，刚有一点希望，就破灭了。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觉得他的状态还是比较自然的。他跟我说，当反革命和右派要当大的。他是大右派，青岛人都知道束星北，都说怎么有本事，还说他贪财。我问父亲，怎么人人都说你贪财？父亲说我不爱做的事情，就会要钱，他不会捡好听的话说，很坦诚，但是往往坦诚大了，就真诚地跟人提意见了，就说人不爱听的话。

父亲在意的是自己的感觉。有一次他身上挂了一块“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的大牌子回家，我看了很心酸，眼泪马上掉下来了。谁知，他却安慰我说：“哭什么，认识我的人反正知道我是束星北，不认识我的人，反正不知道束星北是谁。”

1974年春节，父母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时，因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电图、脑电图等进口仪器全坏了，无人会修，便将父亲从分院调回青岛。得知父母回青岛，我写信给上海、南京、成都、莱西的哥哥姐姐，相约春节回青岛。就在这次除夕的聚餐中，父亲向全家人郑重提出，他死后要将遗体捐赠给青岛医学院。原来，他在打扫卫生时，看到医学院的尸体标本奇缺，尸源基本上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人，造成医学院的学生到毕业都没有碰过尸体。随即与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约定，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作医学研究。他患有哮喘病，常年喷吸一种叫肾上腺素的药物，医学上讲此药会损坏心脏，而他用了多年，心脏却没有发现问题，因此希望死后解剖遗体，验证肾上腺素对心脏是否有害，也算不枉在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

五嫂王惠玲告诉我：“我和束义新开始确立恋爱关系时，他在青岛玛钢厂工作，我在纺织厂。玛钢厂的军代表跟我说，家庭问题不可以选择，新型的社会关系是可以选择的，你找这么一个人，你想干什么？我说，他父亲是右派，他不是，贼的儿子不是贼。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就成了反动的？党的政策是即使有错误，也要挽救啊！军代表又问我，你不怕受到牵连？不怕被遣返到农村去？我的态度很坚决，回答，全国七亿人口，五亿农民，那五亿人就不是人啊？当农民又怎么了？你们能把我遣送到月球上去？不能吧。军代表就不说话了。1966年，束义新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和软禁，直到1968年才放出来，我那时没法与他联系，想起来真是不容易。记得有一段时间，政策有转暖的迹象。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就写好字条，用包味精的塑料袋包好，用橡皮筋缠好，包在用开水烫好的饺子里，与其它煮熟的饺子混在一起送给他，帮助他树立信心。他在里面得不到任何消息啊！我们就这样传递信息，多不容易啊！他当时的处境很险恶，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在学习班上被活活打死了。”在那个年代，王惠玲有勇气走进我们的家庭，很不容易，她一直精心照顾我父母的生活，我很佩服。束庆星回青岛结婚，女方家里不同意，因为他是残疾，父亲又是右派，他俩等于是私奔到青岛的。父亲觉得这样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就叫五嫂王惠玲把他们送回上海，请严中简当媒人到女方家求婚。在那样的形势下，父亲这样做没掉价。此后，女方家对我们的态度才好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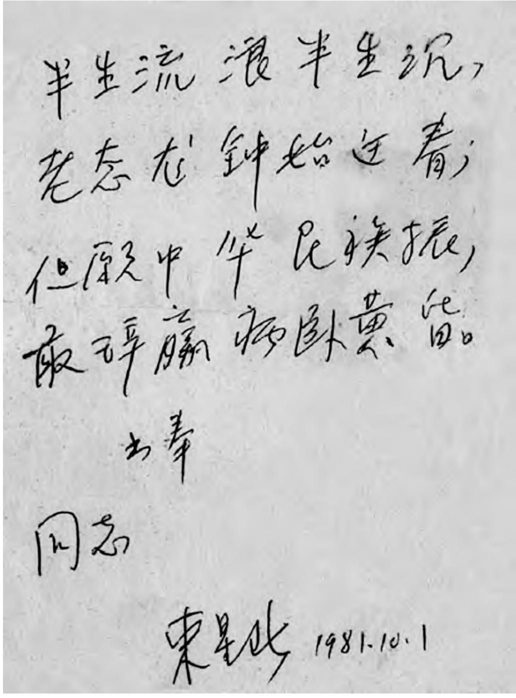
父亲对我的教育

我上学时，父亲不提倡我按部就班地做作业，说你懂了的题目，可以不做作业，要做不懂的和似懂非懂的，上课时听懂了，就不要做重复性的工作。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不要求我们考多少分，不要求那些表面的东西，而是希望我多动脑子想，增强理解能力，做一道题，得从几种方式得到同一个答案，非常严谨。他基本上不大管我们的学习，我问学习题，他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更多地让我们自己独立思考，所以我在学校学了更多的东西。这和现在的教育思想是不一样的。父亲不给我们留任何财产，他说他的父亲太有钱了，所以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很少有出息。

我1960年考上青岛二中，学校叫我划清界限，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划不清啊！1964年，班主任建议我住校，说我在家里会养成娇骄二气，容易受父母的影响，达不到划清界限的目的。在学校里，大部分老师对我非常好，个别老师比较差劲，有几个同学认为我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歧视我，确实让我觉得寒心。那时候一个人七尺布票，父亲一米八五的个子，我哥哥也都是大个子，所以我和母亲的布票就给他们了。母亲将她的衣服改一改让我穿。母亲的衣服都是好料子，我在学校里就显得穿得很好。老师和同学就以资产阶级小姐讲究吃穿批判我，给我压力不小。但我这个人不自卑，就和你们比学习。

我在中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不用父亲操心。1966年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文革，不能继续上学，又担心上山下乡，因小哥哥下乡到莱西，非

常穷困，爸爸不表态，大哥坚决阻止我下乡，要我在家好好学外语。我因为对大哥一直有看法，就没有听他的。1967年，在南京的姐姐叫我去南京工作，我姐夫的姐夫是南京军区的领导，我在那里待了近一年。后来姐夫说，有一封青岛人民来信，说父亲破坏上山下乡，把我弄到南京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回到青岛，到那儿看见大字报写的是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滚出合江路一号。家被搬到登州路33号了。我到33号一看，只有17平方米，乱七八糟，关于电磁学的书泡在水里。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家里两层楼变成一层。搬到合江路一号，家具又少了一些。这次到33号，就只剩下一个写字台和一个圆桌，写字台是父亲看书用的，圆桌是吃饭用的，白天吃饭，晚上拼成大哥的床。父亲又买了个单人钢丝床，母亲用两个小板凳在钢丝床的床帮上睡觉。家里没有我住的地方，只好借住在邻居家。父亲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有时几乎喘不上气。我什么话都没说，把家里整理干净。买煤等比较重的家务活都是我干。有一年国庆节，我到北镇，看见夏天的短袖衣服还挂在那儿没人洗，心里很难过。



束星北复出后的随笔小诗

学校说我逃避下乡，其实他们知道我父亲是右派，因为二中很多老师是山东大学家属，对我家的情况很熟悉。我这个姓一提，都知道我父亲是谁，当时的报纸报道束星北是大右派。遇到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随遇而安。后到聊城的三线厂当了工人。我每年回家一到两次，照顾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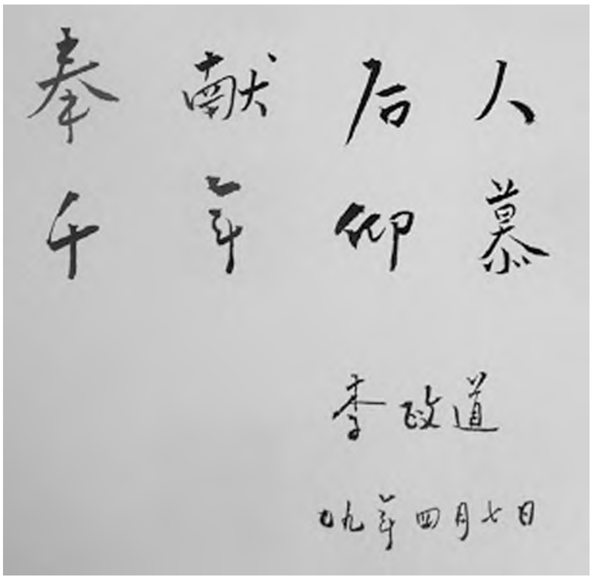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父亲不太愿意我报考大学，担心会影响我的婚姻，大哥和五哥让我考，说你学习那么好，不考要后悔。结果我报考了。考试前，父亲在济南开会，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记住会做的题先做，不会做的最后做，就这么两句话。他还建议我不要考山东大学，认为他们的基础和底子差，希望我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我说，太不务实了，我想考北大浙大，能考上吗？能有个学上就不错了。

通过努力，我考上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数学系。毕业时，父亲认为我做学问已经来不及了，希望我做具体工作，也可以搞点技术，但一定要学好英语，许多技术资料是英文的，仪器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英语是工具，把英语学好后，看懂第一手资料，就能比别人领先一步，工作上就能得心应手，我就这样做了。

父亲对我非常宽松、民主，这种教育方式是中国不多见的。他是慈父，对我的关心比母亲都多，我非常感恩。他那刚直的品格、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概和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让我难以忘怀。他教育子女绝不说违心的话、谎话，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熏陶。

但长期的改造在父亲的心理上还是留下了厚重的阴影。198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远远地看见父亲在楼梯口徘徊，以为是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门，便赶紧跑过去，这才发现父亲的神色不对，满脸疑云和不安，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不说话，只是嘴向楼上的家努了一努。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赶紧上楼，发现有两个民警在家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几天前我在中山公园丢了一辆自行车，报了案。人家是来通知我去公园派出所取车的。我下楼向父亲说明缘由，可父亲仍然疑惑，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上楼，直到警察走后才跟我回家。

真正了解我父亲，是在1992年以后，对我来说的确晚了。开始研究父亲，得感谢李寿枬与许良英关于我父亲是不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争论。1979年3月，《光明日报》曾发表父亲口述、宫苏艺整理的《我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我从此开始关注父亲的历史。我先后



应青岛红十字会邀请，李政道先生为，为父亲和沈福彭教授当年"奉献的约定"雕塑群所题题

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大量走访父亲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可以说走进了父亲的人生，增加了对父亲的理性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王淦昌等人的鼓励，他们推着我做这项工作。2007年，我参与编辑《胡杨之魂》，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父亲的朋友和学生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王淦昌、严中简、张立文、王彬华等都帮助过我们。

王淦昌曾多次来信询问，安慰我父亲，表示要给我家寄钱，要出我大哥结婚的所有费用，父亲生怕连累挚友，婉言谢绝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严仲简每月资助我家30块钱，连续9年，直至1966年他自己也被批斗为止。

张立文作为青岛医学院院长，安排父亲从事仪器修理和教学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文革中张立文遭到批斗，说是我父亲的保护伞。父亲和张立文一起挨斗，幽默地说，你今天和我平起平坐了。

1980年夏天，王淦昌到青岛参加全国高能物理会议。报到的当天上午，便到了我家。这是1956年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20多年了，经历了多少风雨，我原以为会有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没有想到却是非常平静，只是相互握了一下手，拍了一下肩膀，就坐到了沙发上。为了不打扰他们的谈话，我们家人退出了房间。我在门外的走廊上做饭，不时听到房间内他们提高嗓门的争论，一会儿又变成了开怀大笑。傍晚，我们全家人一起陪王淦昌游玩了青岛。他俩一同住在父亲的卧室里。我和母亲住在隔壁房间，不知道他们到底睡没睡觉。总之，我睡着前，听见他们的谈话声，早上醒来还是他们的谈话声。第二天上午，他们两人一起携手出现在全国高能物理会议上。这是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露面。

父亲去世后，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联系。19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闲谈中我感慨道："王伯伯，我父亲要有你一半会做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摔这么一大跤！"谁知他的脸当场就板了下来，严肃地说："不对，你父亲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就是举举手，鼓鼓掌，吃两顿好饭而已。

1978年到1983年，父亲有幸遇到了曾荣。曾荣顶着政治压力请父亲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从工作和生活上尽力照顾父亲。父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71岁，靠个人拼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无济于事，所以，他就给自己定位为"作人梯"，把追赶的希望寄托于后人。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他提出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学术队伍。在领导支持下，他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进修班"，亲自授课、答疑、辅导、批改作业，先后讲授《张量分析》、《数理方程》、《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等课程以及动力海洋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他常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你们趁我身体好时，多学点东西，不要分心，不要以后后悔。"

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组织上调我到海洋一所工作，父亲对我说，他很满足了。父亲说，你搞学问不行，把我照顾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我不服气，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沾了你的光，我是有工作能力的。我觉得，要学好外语，能够看懂说明书，就能做出工作成绩。

1979年8月，山东大学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复查，12月，经山东省委批准，20多年的冤案得

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父亲写诗言志，“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遇春，愿得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我们全家都希望他整理和出版于1965年写成的《狭义相对论》，但他不干，说没有空，先将《狭义相对论》放一放，我现在教教学生、搞搞研究，等我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来弄，但最后还是没有完成。

1982年，王淦昌、苏步青等都入党了。许多人也动员我父亲申请入党，曾荣还希望我父亲当所长，他当党委书记。父亲对曾荣说，我不能以身作则，我在党外，你清闲我也清闲。我领导不了人，一个人都领导不了。山东省物理协会聘请他当理事长，他不当。他很怕开会，和人家谈条件，说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开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教学和研究。最后达成协议，说可以用他的名义，但是不要叫他开会。

1979年春，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长陈炳鑫在曾荣所长带领下，向父亲求教关于数据舱安全回收时限的问题。陈介绍：当导弹弹头在预定海域溅落时，将会激起100多米高的水柱，数据资料舱在弹头溅落时被弹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舱会离开溅落点向外漂移，打捞船在警戒圈边缘等待。我们必须在警戒圈内打捞，时间超过4小时资料舱将会自爆，在此时限内越出警戒圈，就可能落入别国之手。问题是弹头溅落后隔多长时间才可以安全打捞？当时父亲感冒了，在床上躺着，有人给他拿来钢笔、计算器和纸张，他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计算，说：资料舱溅落半小时后出发打捞就没什么危险了，1小时后，肯定安全。因为其时冲击水波的能量向四周基本扩散完了，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做什么模拟试验了。就这样，本来打算花上百万元经费研究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后来找过陈炳鑫，问洲际导弹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公开报道？他说，国家把这个项目交给海军，海军请海洋一所支持。海军参谋长拿了我父亲计算出来的结果交给钱学森。钱学森说，是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问题，不用做实验了。

父亲的学生里最有名的是李政道。母亲曾说，父亲对学生的感情要胜过对子女的感情。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期间，父亲看他提出的问题与众不同，认定他是天才，对他格外关照。一年后，父亲被借调到军令部研制雷达，怕耽误李的学业，建议他投师吴大猷。1957年听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父亲非常兴奋。1972年10月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国内人才断层问题做一些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只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他表示非常想见老师。此时，父亲正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打扫卫生，住两间很差的平房，青岛市革委会研究了多种见面的方案，被否决后，有人提议让父亲到北京去见李政道。父亲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学生拜见老师，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最终没能见成。但这件事对改善父亲的处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父亲收到了吴健雄和李政道寄来的一本英文原版书，扉页上题词：“敬请束先生指正。吴健雄李政道”，父亲看后，感慨地说：“啊呀，指正不了了！”

1978年，李政道准备到北京，父亲正好在北京开会。在北京等一等肯定能见到李政道，但父亲还是很快回青岛了。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也是我的学生，现在是你们更需要我，我们的时间很紧，我怎么能放弃你们去见他呢？李政道和父亲最终没能再次相见，十分遗憾。

父亲去世后，李政道和我多次联系，请我到北京，请我吃饭。他过80岁生日，还给我发邀请函，邀请我去参加。■

（许水涛为全国政协文史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选摘

编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凝聚全党在当时条件下的共识，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了总结，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指出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了评价。“决议”也因此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2016年6月，是“决议”通过35周年。重温这份历史文献，对深刻揭示文革浩劫的本质，防止灾难重演，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特选摘“决议”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以飨读者。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

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

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

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

“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

○ 徐庆全

当年的宣传画，选自《美术》1976年第5期 （作者：张汝为）

对于经历过粉碎“四人帮”那段历史的人来说，“你办事，我放心”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因为那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1976年10月下旬，在全国各地庆祝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各种集会报道中，“你办事，我放心”家喻户晓。

那一年我14岁，记事，也稍懂事，而且在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指示下，也很“关心国家大事”。

那时，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是天大的“国家大事”。《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都在大肆宣传“你办事，我放心”这个“最高指示”。当我们家从街头敲锣打鼓的队伍里恭恭敬敬把“华爷爷”像请到家里，和“毛爷爷”的并排挂在墙上时，支部书记还带领我们举行挂像仪式，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起朗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稍后，时间不长，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油画在全国发行。我们家仍然是从街头敲锣打鼓的队伍中把这幅画恭恭敬敬地请到家里来的，只不过免去了仪式。画面上，毛泽东和华国锋相对而坐，两个发型都一样的“大背头”，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在我这个年龄的人眼里，“你办事，我放心”就是毛泽东主席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这种固有的观念，一直持续到1999年听到章含之对这个“指示”的另一种解释为止。

章含之的否定说法站不住

1999年，我还在《百年潮》杂志任职（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社长郑惠先生与章含之女士熟悉。我记得有一次陪郑去章含之家，郑希望章能写点回忆乔冠华的文章。章说，她正在全力编辑《章士钊全集》，目前抽不出时间来，不过，谈到

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选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08—819页。

乔冠华，章兴致很高。她谈得最多是她和乔的委屈，以及与这些委屈相关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之间的事。

随后，话题转到了华国锋。她说：是华国锋把乔冠华给打下去了，原因就在于乔了解毛泽东给华国锋所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根本不是毛为指定接班人而写的。听到此话，我心里一惊，很想听个究竟。但郑惠对这个话题却并不在意，我不好贸然发问，话题也就错过去了。

2000年夏，《章士钊全集》出版发行，我陪已经辞去社长职务的郑惠参加发行仪式。章含之对郑惠说，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写回忆乔冠华的文章了。郑惠因为已经辞职，只是让章和我联系。章大概没把我放在眼里，彼此客气地点个头，这事也就放下了。

《你办事 我放心》选自《美术》1978年第2期 （作者：彭彬 靳尚谊）

2002年，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我特意查找是否有关于乔冠华与“你办事，我放心”相关联的回忆，还真有。书中写道：

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事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5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

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01-304页)

关于乔冠华为什么被解职，1976年12月2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宣布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部长职务的决定时解释说：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

李先念讲话中罗列了乔冠华夫妇数项"罪状"，涉及"你办事，我放心"这一项，是指责乔冠华刁难华国锋的工作——毛要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而非章所言乔知道毛给华写这个条子的底细，"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在那个年代——这是必须强调的，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是"阶级斗争"意念下的你死我活，不是无产阶级的人，必定是资产阶级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义性，这种意念被强化和渲染，夸大"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罪行就成为必须。乔冠华夫妇也就在这种渲染的过程中，被定为敌我矛盾了。

在外交部，第一次揭批乔冠华夫妇，大约在11月初。据当时在外交部系统对外文委所属对外友协任职的宋天仪记载，11月2日下午，"参加外交部第一次揭发'四人帮'大会"，开始"批判乔冠华夫妇的"。他写道："历史又重写了，外交部重点又在攻乔夫妇，批邓时期的重点对象王海容、唐闻生的'小团团'翻身了，目前是歌颂的对象。"

第二天下午，"全友协传达外交部核心组简报：乔冠华、王某(干部司司长)、杨某(政治部主任)的检查交待，以及部核心组的发言情况。乔等承认他们上了江青的当，在批邓运动中整王、唐的材料，想打倒王、唐，结果为'四人帮'抬了轿，在外交部引起了两派内战。但从中看出，外交部确实矛盾复杂：乔夫妇与王、唐不和，毛主席找他们四人和解无效；毛主席指示华总理等五人小组处理外交部问题；毛主席不要唐当他的翻译，而是华主席圈定了冀朝铸(周总理翻译)等等，王、唐也承认它们(她们)发展一帆风顺，骄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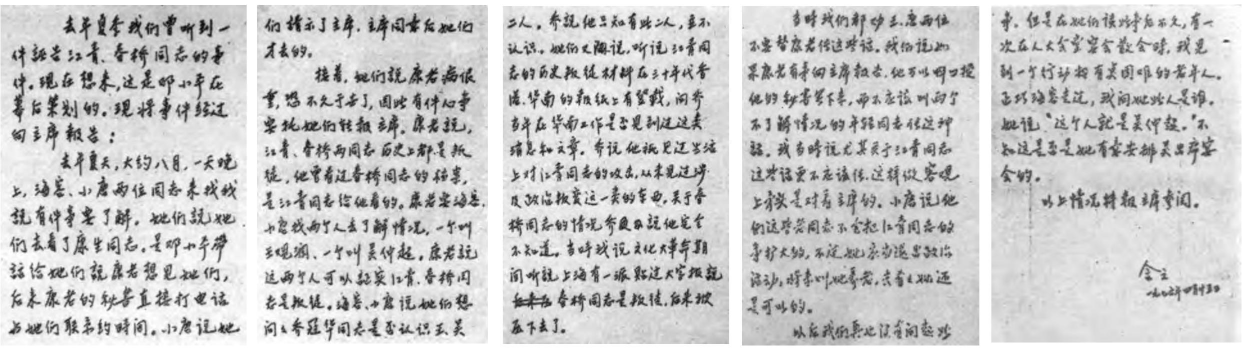
11月12日，"全友协传达外交部核心组第2期简报，内容是乔冠华的检查；外交部政工简报，传达了毛主席在乔写的上告王海容、唐闻生材料上的批示：'乔冠华借刀杀人，是借中央之刀杀王、唐'。"(见宋天仪：《文革日记》，207－208页)

其实，这份告王海容、唐闻生的报告是章含之署名的。12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发[1976]24号)发出，其中第三部分"五、'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所列举的材料中，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



章含之写给毛泽东的信

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不足为怪。而且，在那个年代，这封信被加上这样的按语，实际上是向全国昭示乔冠华和章含之是“四人帮”的人。乔冠华的政治生命也随之终结。

12月24日下午，“外交部系统五千人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乔冠华罪行大会’”。乔冠华等被定罪。（宋天仪：《文革日记》，211页）

这与乔冠华知道“你办事，我放心”底细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如李先念所说，乔冠华是怎样“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华国锋的？1979年9月4日在外交部传达的一份有关乔冠华的材料中说：

华主席给乔看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乔却对人说，对华还要看一看。江青曾对乔说“对华主席还要看一看”，乔对人说，江说的有些道理，华长期在地方工作，一下子管这么多事拿不下来。华一次让乔留下，乔说这是“陪太子读书”，是“乡下绅士”。76年，乔到朝鲜进行秘密访问，金日成多次提到华主席，乔回来后不转达金对华的问候。（杨荣甲：《外交部文革——我的经历与思考》，290页）

其中说到乔冠华的问题是两条：第一，追随江青；第二，他轻慢华国锋。与前文“刁难”一致。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去世后，我曾经写

1972年秋，乔冠华与章含之第一次合影，摄于美国新泽西州野生动物园（应代表团成员之邀，游园时每人与乔冠华留影一张）

过一篇文章悼念她。我写道：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之后，章含之解释说，在北京好的房子都是大红门，大红门非常凝重、厚实，具有历史的沉重感。推开一扇大红门，我们就能看到一段历史。的确，在她的书中我们也的确读到了历史，但是终觉意犹未尽的，那两扇大红门只开了一半，令史家有思之枉然之感。

章含之不遮挡的是她在外交工作中的具体作为。赶上了70年代中国外交凯歌行进的大好时机，她作为一分子，也为此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活动中，她尽心尽职；在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身为翻译的她展现了非凡的才华……这些对历史补充的细节，为史家所看重。

而她遮挡的是，身处“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指王海容、唐闻生）掌握”的外交部，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她和乔冠华的作为。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当年嫁给乔冠华之后，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甚至是高层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尤其是在1975至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毛泽东在“四人帮”集团与邓小平的平衡过程中，乔冠华与“四人帮”、与毛泽东、与华国锋、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被毛“借刀杀人”批评的行为，是属于自身的选择还是无奈的自保？还有，在这一过程中，章含之与唐闻生、王海容如何由友谊演变到竞争并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竞争？有论者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含之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这一切，都成为谜团，令史家一头雾水。

这一段议论，也适合于她对待华国锋和“你办事，我放心”字条的态度的评价。

《毛泽东传》借张玉凤之口说出否定意见，有些蹊跷

张玉凤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也是毛泽东晚年最倚重的人，对毛泽东晚年的历史的说法被认为具有权威性。因此，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撰写的《毛泽东传》中，她的回忆常常作为重要史料根据。书中关于“你办事，我放心”的来历，就引用了张玉凤的回忆：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惟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1778-1779页]

而据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记载，张玉凤对此事并不知情。书中写道：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华国锋准备公布毛泽东的字条时，作为华国锋坚决的支持者——汪东兴当时曾为这张字条专门找过她，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

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者是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但是张玉凤当时就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

不过，张玉凤回忆，自1976年初起，由于毛泽东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字条作为重点之意，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字条。

由于毛泽东与华国锋的那次谈话，张玉凤并不在场，所以张玉凤会说"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但是，从字条上的字迹来看，那确实是毛泽东手迹。（87页）

这样一来，同一个人对于同一件事的回忆，就出现了矛盾："毛传"中张玉凤是关键的在场人物——她要复述毛的话，并且在毛写这个字条的时候"扶着"毛。而在叶书中，张不在场，"对这张字条"，居然既"没听到"，"也没有记忆"。

"毛传"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权威著作，从一般学术规范来说，该书的材料和观点，都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哪怕你不同意，也应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说明。但是，叶永烈对该书中张玉凤的回忆既不采信也不加注，反而公布了与该书相矛盾的张玉凤的另一种回忆。显然，叶永烈认为，自己的材料来源比"毛传"的来源更可靠！

于是，两种观点打架，当事人张玉凤也不出面澄清，读者难免如坠云雾。一般说来，像"毛传"这样权威的著作，对当事人的回忆是否采信，是非常谨慎的，而且，该书运用当事人的回忆，或是为了陈述事实，或是作为例证阐明观点，很少藉当事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处理张玉凤的回忆有些例外。

首先，把张玉凤的回忆插在毛"少量的外事活动"中讲述，显得有些突兀，或者不郑重。其次，张玉凤陈述的是包括"你办事，我放心"在内的三张字条是怎么来的。讲完事实后特意强调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给人的感觉是，该书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就是为了藉张之口说出这一结论。

依我的理解，"毛传"这样处理史料，显然有自己的考虑：

第一，该书在藉张玉凤之口说出"'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后，并不跟进自己的观点，显然是留有余地。

第二，在张玉凤说出"'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时，华国锋已经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开始掌管国家大事了。人们知道，"符合事实的"说，这当然是毛指定的。这样说来，让张玉凤特意从"你办事，我放心"字条上强调这一点"不符合事实"，"毛传"是有意而为。

第三，以"毛传"编者所拥有的档案材料的优势来说，要否认"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指定接班人的根据，不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毛传"编者不用档案材料来否认，而借助张玉凤的回忆来说事，那么，或者档案材料中确无记载；或者档案材料中的记载无法支持这个结论，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被当事人和"毛传"忽略的两个史实

因为章含之和张玉凤，以及"毛传"编者，都是相同的指向——否定"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根据，所以，在陈述这个字条的来历时，忽略了两个史实：第一个史实是，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就对华国锋说出"你办事，我放心"的话；第二个史实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拿出这个字条后，中央高层和全国人民，谁都没有认为这不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根据。

概括地说，前一个事实，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生前安排"；后一个事实，可以说是华国锋的"尚方宝剑"。

1976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 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97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正式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决议”中有这样一句话:“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何谓“生前的安排”? 理解为华国锋是毛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应该没有什么错。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

1976年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同他的联络员毛远新谈话中,谈到了华国锋。

毛远新说: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毛泽东回答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明确提议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发[1976]1号)宣布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直截了当把“你办事,我放心”作为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据邓力群回忆,在毛泽东酝酿批准中央这两个决议时,对华国锋就说出了“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当时我的心态是,华国锋当了总理,邓小平撤销了职务,对邓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的希望破灭了。但是,毛主席还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感到还是宽大。感到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样,对老干部还有所谅解。因此,对主席没有什么埋怨。觉得毛主席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帮”搞的不完全一样。对华国锋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反感。这时已传出“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愿把国家交给“四人帮”,对华国锋感到放心。交给华国锋以后怎么样? 看看吧。(《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56页)

这就是说,在中央传达华国锋担任总理的决议时,“你办事,我放心”就已经作为毛泽东的指示——那时可还是“最高指示”的——向下传达了。而且,在邓力群看来,“你办事,我放心”就是毛泽东把“国家”“交给华国锋”的根据。再进一步说,以邓力群这样仍在赋闲的干部都能听到传达的事实看,“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已经传得很广了,党内很多人都已知道。

邓力群的回忆不是孤证。参与了这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吴德回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217页)

毛远新在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后,“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吴德想表达的意思是,“你办事,我放心”就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不仅吴德如此看,鉴于毛泽东当时的威望,中央高层基本上都认为,这是毛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

4月7日毛泽东对华国锋说出“你办事,我放心”的话,4月30日,毛又把“你办事,我放心”写给华国锋,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看,事情就很明显了:即使4月30日毛泽东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写,但因为有4月7日的“你办事,我放心”指示的铺垫,那么在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拿出这张字条,又怎么能怀疑这是毛指定华为接班人的根据呢?

在抓捕“四人帮”的当天晚上,耿飚按照华国锋的部署,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据耿飚叙述,他拿着两样东西去的,一是“你办事,我放心”字条的复印件,一是华国锋的手令。(沈容:《红色

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89页）

而在10月7日受命去接管新华社的沈容的丈夫李普，也有同类的记忆。他给我讲述过当年受命时的情况：

10月7日，新华社成立"五人接管小组"，我是成员之一。我们到紫光阁开会，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先让大家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件，向我们透露了对"四人帮"已隔离审查的情况，交待了接管新华社的任务。

华国锋向耿飚下达任务，给他一份"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纪登奎给李普"五人小组"布置任务，先让他们看"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当时的中央高层，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人，都把"你办事，我放心"当作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尚方宝剑，说这是毛指定华为接班人的根据。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你办事，我放心"公之于众，是通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之口。1976年10月24日，吴德在首都举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

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说：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与此同时，包括"你办事，我放心"在内的字条，也在中央部委级传达。譬如，10月29日，"友协干部"集中"传阅外交部送来的毛主席三份亲笔字条：1. 毛主席送华国锋的三句话，其中有'你办事，我放心'；2.'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会议'；3.'国内问题要注意'"。（宋天仪：《文革日记》，207页）

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报眼的位置上——这里通常刊登"毛主席语录"，摘录了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

11月7日，《人民日报》在报眼位置刊登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此后，《人民日报》报眼上经常出现这段话，持续时间大约有一年。与此同时，报纸也在连篇累牍地宣传这一指示——既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也有一般基层干部表忠心。

试问，在那个年代那段时间内，章含之觉得这样的宣传有什么不妥吗？张玉凤觉得有什么不妥吗？"毛传"的主持者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4月7日，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按惯例肯定有会议记录留档；稍后，邓力群这一级别的干部听传达，也应该有传达记录稿留档。而且，如果4月7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张玉凤在场的话，她也应该知道毛"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

可是，"毛传"中涉及此事，只采信张玉凤的回忆而无视档案的存在；而张玉凤在讲述"你办事，我放心"由来时，则略过4月7日毛泽东首次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不谈，直接说4月30日的事情，并直截了当地说出否定的结论。诸如此类，都给我前文分析的"毛传"是在"留有余地"、"有意而为"提供了例证。

若再往前追溯的话，否定"你办事，我放心"这个字条不始于章含之、张玉凤和"毛传"，在1980年就开始了。

1980年，随着对华国锋批评的不断升温，一些人就对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对华国锋批评过程中要否定"你办事，我放心"这个字条？这是另外一篇值得做的文章，且按下不表。■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对错误进行反思是政党履行自己的义务

○ 林蕴晖

实践、认识、再实践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研讨当代中国史的人们都会记得。但它蕴含的深意可能已被一些"学者"淡忘了,这就是人们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注1

可见,人们的认识总是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逐步深化而接近真理的,与之相应,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总是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前进和发展的。

成功和错误都是财富

但是,在历史研究中,往往有人动辄给严肃的、实事求是地研讨历史上错误(那种否定一切、歪曲事实、故意夸大、恶意攻击不在此例)的书刊和文章扣上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这就提出一个怎样认识错误的问题。1988年,邓小平在一篇《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谈话中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注2 错误也是财富,这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摸索,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给了我们清晰而理性的回答。

大家知道,改革最先是从农村起步,这就是包产到户,而首先开这个口子的是安徽。对此,万里有过一段心酸的回忆,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注3 这就是万里对我们搞了20多年社会主义的最初反思,是安徽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原始动因。

再看陈云是怎么说的,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

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注4

正是有了领导人对此前历史的反思，在这以后，包产到户才逐步为党内多数所认同。

对于十年文革造成的伤害，更有刻骨铭心的反思。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邓小平还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注5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注6

历史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正是对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经验教训的反思、检讨结出的硕果。

对斯大林模式说“不”

如果说，以上列举的还是从政策层面的反思和检讨。那么，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开始，就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战略层面开始反思了。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道：“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7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还远远没有解决。从1980年代初开始，对改革开放搞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走向了资本主义，一直是党内外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是怎么理解的呢？1953年，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注8概括成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

对1953年之后近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1982年6月，邓小平作了如下回顾，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注9进而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10“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还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11

这就触及到了更深的层次，即按照此前30年搞的社会主义路子，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邓小平明确而坚定地回答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注12他反复向人们说明：“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注13“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14

按批“历史虚无主义”先生们的逻辑，邓小平上述一系列评说，不是把建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全否定了吗？请看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作者写道：“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注15

这就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向人们说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1950年代初确有它难以超越的认识根源。实践证明：“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这确实是一个严酷而不可无视的现实。

正是有了这样一步一步的深刻反思和检讨，才有从承认包产到户合法、允许个体经营、允许雇工不受数量的限制、确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到认同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中国才最终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陷阱中跳了出来。

正确对待错误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简单举以上几例，为的是说明，如果不对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我们怎么能走上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老祖宗早有教导：

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注16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讲党的三大作风一节中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注17

正是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取得已有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回避错误，《决议》明确指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郑重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强调：“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注18

对只热衷于歌功颂德，不懂得反思和检讨错误的历史教训。从1956年到1989年担任了30多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日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也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弄不清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注19

这就是日夫科夫总结的执政的共产党最终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研究的正确指导思想

如何通过历史研究，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著名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指出：

“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在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注20]

对此，又有人用邓小平说过“宜粗不宜细”的话来辩解。诚如前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是错误的一样。把1980年在起草《决议》的时候，邓小平针对决议起草小组拟出的提纲内容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注21]这就是邓小平“宜粗不宜细”一语的原意所指，《决议》不是要叙述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重要的是对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论断。根本不是泛指历史研究而言。现在拿邓小平这句话来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完全是对原意的曲解。

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就必须对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作过细的研究。龚育之在《读张泽石的两本自述》一文中列举了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发生的志愿军归俘人员受到有不公正对待、扬帆事件、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广州的布鲁、陈坤事件以后指出：

“总之，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在深入了解和总结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如果对这类历史事件人们都没有具体了解，都淡忘了，淡化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历史的悲惨有什么把握能够避免重演呢？”[注22]

2015年8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去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可以认为，这既阐明了历史工作者的使命和重任，也是历史研究所应遵循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注释：

注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注2、注6、注7、注9、注10、注11、注12、注13、注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第272页、第2-3页、第11页、第63-64页、第139页、第227页、第148页、第225页。

注3　《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张广友韩钢记录整理。《百年潮》1998年第3期。

注4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注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注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注1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268页

注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注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1095页。

注1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8、29、60页。

注19　《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7页。

注20　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注2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4页。

注22　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第233页。

（作者为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　冯立三）

1965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

○ 白 磊

1965年2月6日，正月初五，时任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着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白瑞生、省公安厅警卫处长艾蕴药、省委办公厅速记员郭步越分乘两辆吉普车赴陕南进行调查研究。这次下去调研，胡耀邦主要的任务是参加各地、县多级干部会议，宣讲落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从2月5日至12日，胡耀邦八天走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县，即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这一路他一边观察陕南的山川地形，一面思考到各县了解什么讲些什么，当前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应该主要抓什么问题。经过一路上的调查研究抵达安康时，胡耀邦已形成改变现有局面的系统意见，他在安康地区干部会议上讲话，对这些意见进行阐述，这就是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更灵活一些，而不要太死。

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解释的时候，胡耀邦讲，什么是“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呢，归纳起来就是这么几条，一是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于现实表现；二是已经“洗手洗澡”的干部，不要纠结已交代的问题，而是要看今后的工作表现，三是要着重于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他讲到：“去年以来处理的一些人，都应该根据以上精神加以清理，没什么可犹豫的。”

什么叫“掌握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他指出五点。一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要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二是要搞活集贸市场，集市贸易不是投机倒把，而是为卖而买，产生利润，这叫资本流通，是合理合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集市贸易搞好了可以一举三得，既可以增长生产，也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从中发现真正的投机倒把分子，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乱没收；三要组织好短途运输，互通有无，促进生产，发展副业；四是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城市就业问题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和加工农副产品，手工业所需原料，要好好解决；五是三级财政问题，要会省钱，也要学会花钱，该花的钱没花，不该花的钱花了，都是违背总路线精神的。要使人们看到，不论城市或农村每年都要有些变化。

2月13日晚，在安康地委的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有必要将一路调研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系统的方针政策性的文件，向省委通气，以指导全省下一步的工作，并纠正已经出现的“左”的路线的偏差。他亲自执笔起草了《电话通讯》。

《电话通讯》针对当时社教运动中“左”倾给陕西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了“四个一律”，即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关于胡耀邦在安康酝酿并发出《电话通讯》的详细过程，可参阅2016年第1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拙文《1965年胡耀邦“电话通讯”产生前后》。

2月18日凌晨，正在汉中调研的胡耀邦突然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的电话，告知“《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当天上午，胡耀邦打电话给安康地委，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注意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

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胡耀邦又找来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打招呼，张军的意见也同韦明海的意见一致。但胡耀邦在后来所去的几个地县不再讲“四个一律”，而是遵循西北局的意见，打招呼要防止翻案风。2月23日，风尘仆仆的胡耀邦回到西安，随即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基平、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省长李启明等交谈，征询他们对《电话通讯》的意见，又先后找了一些干部谈话，他总的感觉仍是只要注意掌握分寸，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然而此时由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发起的对他的指责已风雨渐浓，各方面传来消息，说他的《电话通讯》“问题多”，并且指责他独断专行，凌驾于组织之上。

胡耀邦在上世纪60年代作报告

胡耀邦返回西安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写信给他，批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2月27日，这位领导人再次给他写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后果已经由“可能”变成了“肯定”，问题逐渐升级。28日下午，胡耀邦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为了顾全大局，他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会上同时决定向各地县发一个通知，要求“正确执行干部四条”。他同时给西北局回信，诚恳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3月2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回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胡耀邦同志2月14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一）对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来给予一些干部的纪律处分，应持分析态度。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一时弄不清楚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二）已经宣布停职尚未处理或撤职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先放到干部岗位上继续考察，所谓放到工作岗位上，不是说一律要恢复原职或者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人在停职或撤职后，为了便于查清他的问题和促使他反省交代问题，也可以暂时不放到工作岗位上。（三）执行以上两条，要注意和群众商量，并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可以说，陕西省委的这个《通知》已经无懈可击了，但西北局仍不同意，不松口。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自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一月份以来的工作，邀请了陕西省委书记处的全体人员及西北局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正在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参加社教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这次会议，胡耀邦见到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讲西北局第一书记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杨尚昆安慰他说，这样做大概不是西北局第一书记的意思，你可以找他谈谈。3月8日，胡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谈话，他对胡耀邦到陕西后的工作肯定了五条成绩，即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很高，是抓革命，抓生产的，你的干劲很大，也能够积极联系群众。但同时也提出了四条缺点，一是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成绩讲得不够，缺点讲得太具体。二是《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引起翻案，这是主要错误。三是陕西的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讲的集市贸易的几条好处是不妥当的。四是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胡耀邦说，确实有不少地方社教运动打击得不准，西北局有

些同志和陕西以及各县的看法不一样。这位负责人口头答应西北局有关部门要同陕西省委的同志一起谈清楚，要团结起来，但实际上并没这样做。

3月8日晚，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西北局第一书记的谈话，大多数常委认为对胡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估计这次会议可以平安度过。第二天，胡耀邦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按照西北局第一书记定的调子，起草了给西北局的汇报。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胡耀邦在会上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赵守一也作了报告，他对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说："（胡耀邦）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变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和拖拉作风，都是很有必要的。"在讲到胡耀邦所谓的错误时，赵守一巧妙地说："耀邦的缺点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已经讲了，我都同意。"胡耀邦和赵守一发言后，西北局的书记处书记和部长们相继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除了西北局经计委主任和监察组长如实肯定了胡耀邦的成绩外，其他人的发言都是按照西北局主要负责人的口径，上纲上线，全盘否定，虽然没有给胡耀邦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已是呼之欲出了。

在这次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批判胡耀邦的主要内容有这么几条，一是批判胡耀邦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这其中包括了"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的四条是"为四不清干部翻案"，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大批有问题的人；二是批判胡耀邦"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胡耀邦提出的暂停捕人、双开、面上夺权以外，还有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以及胡耀邦提出的"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三是讲胡耀邦有些言论是否定党的方针。例如他提出的"两手抓，双丰收"，以及提出的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和发展乡镇工业等政策；四是实行物质刺激。除了把给先进单位奖励的耕牛、农具、化肥指控为"物质刺激"外，还把胡耀邦提出的减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调拨化肥等措施也指控为"搞物质刺激"；五是指责胡耀邦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主要表现就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但胡耀邦的这份《电话通讯》是先与随行人员讨论后，用电话发回省委，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书记处常务书记批准发出的，而省委书记处各位书记当时也均表示同意，其中三位书记还转发了《电话通讯》，给予支持和补充，应该说是代表了省委集体领导和共同意见。怎么可以说是"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在这次会议上，西北局书记处的某位候补书记蓄意将胡耀邦的问题提高到反对刘少奇的层面上，他质问胡耀邦：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形而上学有些大老爷也在所难免"，此话的矛头对准谁？你说毛主席讲过"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现在反倒不会做群众工作"。你传达毛主席的批评，用在白区秘密工作的方式来搞群众运动，这话又是指向谁？志丹县长反对刘少奇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你却非要给他平反，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会议召开后，胡耀邦发现并非如三月初西北局第一书记与他所讲的那样文明，那样多肯定成绩少批评缺点，而是试图将胡耀邦当作反党分子来批斗。三月十三日晚，胡耀邦找了杨尚昆，提出要向中央申诉，杨尚昆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他同时劝胡耀邦不要找中央申诉，告诫胡要稳住。他说："你的问题就是那四条，看西北局最后怎么讲，我还要发言替你说话嘛。"

此时，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5日，胡耀邦已经被迫在西北局作了第三次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我到陕西才一百天，情况不熟，担子又重，本应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商量，多请示，十分谨慎地进行工作。但是这段时间，我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出了很大的毛病。我的主要问题是：（1）由于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太大，因而在这方面想得较多，特别是下去后，看到一些同志对生产很不熟悉，更加着急，所以对生产强调得很突出，对阶级斗争讲得不充分。（2）由于急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又有了片面性，在讲到前一阶段社教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时，成绩讲得

不够充分，对新生的问题估计不足。(3)由于我急于将生产搞上去，总想多出一些点子，把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分析不够，产生了片面性，这就是二月十四日从安康发回来的《电话通讯》对干部处理的四条办法。四条中用了“一律”的话，这是没有分析的说法，如大家照此办理，会产生混乱和翻案风。中央和西北局负责同志指出后，我虽然向一些地方打了招呼，但没有很好想通，直到三月一日省委开了会，我才作了自我批评和发了通知。(4)对上述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干部处理的四条，我没有提到省委会议讨论，更没有向西北局请示，这是错误的。我应当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在组织上：(1)凡属重大问题，必须提交省委研究清楚再作决定。(2)凡属省委不能定的，应向西北局和中央请示后再定。在思想修养上遇事要反复考虑，多作调查研究，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自以为是和主观片面是我的老毛病，这两个问题今后尤当痛改。此外，我还在一个批件和不少即席讲话中，也有片面性和不妥之处，例如在省委关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对干部精神上的紧张状态的提法，以及在安康的一次谈话中关于集市贸易的几条说法，都是不妥的，我要从中吸取教训，更加谨慎从事，尽量做到没弄清楚准确前，不随便说。

3月16日，西北局勒令胡耀邦到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他忍气吞声地宣布：“我二月十四日《电话通讯》中对处理干部问题的四条意见，守一同志二月十七日给书记处的信中提出要组织、人事和监察部门组织力量，对前一段处理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的意见，以及三月二日陕西省委关于执行《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经西北局指出，省委常委会议多次讨论，认为是缺乏分析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不久省委专门下发正式文件。这个口头通知，请传达到县委常委同志，并作一些酝酿。这件事主要是我和守一同志的责任，下面同志不要检讨。”胡耀邦作了公开检讨，西北局仍嫌不够，又指责胡耀邦只讲了西北局指示，而没有讲中央指示，强制省委再在大会上作出补充说明。胡耀邦觉得满腔冤愤，在受到六天的批判之后又作公开检讨，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疲惫，每晚都头痛得难以支撑，终于病倒。经专家医生两次会诊，发现他大脑神经过度紧张和超常疲劳，听力和视力也出现严重衰退，肺部还有气肿，属于突发性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否则后果十分危险。

3月18日夜，胡耀邦忧思难遣，无法入睡，他觉得在住院之前应该对此事有个了结，否则再这样折腾下去，工作上损失太大。他决定顾全大局，再给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写一封信，作一次更全面些的检讨，但不涉及西北局会议上那些无中生有的批判言辞，只是检讨自己到陕西以来，特别是围绕着“干部四条”自己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些缺点来检讨，这种检讨，也算是对自己几个月以来工作的总结。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四天，直至22日才完成。

在这封4000多字的信中，胡耀邦对指责他前一段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干部四条”会引起翻案风等等问题都承认了下来，并且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自以为是、主观片面、不够谨慎和讲话容易走板等缺点，他在信的结尾表示了自己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在西北局的监督和帮助下，我现在决心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姿态去改正错误，我相信只要抓得准，抓得紧，还是能够赶上去的。”

3月29日，陕西省委办公厅按照西北局指示发出通知，撤销了几个暂停。3月30日，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检讨，西北局主要负责人说：“胡耀邦在这一次在信中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很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条措施也就可以了。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有些无关大体，有些问题，像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的问题的一些说法，还要以后的实践去证明，可以继续研究嘛。省委可以开个会，但不是研究，而是总结经验。”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调仍是批胡，但发言人极少，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作了应付差事的检讨，他在检讨中仍然为胡耀邦说话，赞扬“耀邦同志水平高、点子多、出手快、干劲大，我紧赶慢赶都追不上。”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

他讲了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和民主集中制几个问题，言外之意是胡耀邦在这几个问题中都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较温和的发言：“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属于摇摆的性质，而不是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照胡耀邦的检讨写，不夸大，不缩小，正面讲，可以不提耀邦的名字。”

而就在同一天，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将胡耀邦第五次违心的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印发全省各市委、地委、县委，这样就将批胡运动在陕西全省公开化了。

1965年4月，胡耀邦仍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西北局一面向中央提名，由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改为正式任命第一书记，并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一面又派出以书记处书记为首的一批干部，分赴胡耀邦去过的地县，收集整理胡耀邦的讲话，企图从中找出“破坏大好形势”的事例。这些人下乡后，一反过去“报喜不报忧”的惯用手段，专门收集和编造“报忧不报喜”的材料，将情况描绘成一团漆黑，而西北局也常常将这一类材料编入《西北情况简报》，印发中央和西北各省。

5月19日，胡耀邦出院，但此时他的病症并没有完全消除，医生告诫他要继续休养一个时期。此时的陕西省委正根据西北局指示，忙着准备召开省委工作会议。5月31日，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开幕，胡耀邦一改以往作报告时尽情发挥谈笑自若的状态，一开始就声明：由于身体不好，今天除了对报告的第三部分，即当前几项主要工作安排作一些解释之外，其他都是照本宣科。他在报告的结尾特别提到“要以两千万人民的利益为重，”作完报告后，胡耀邦刻意回避，之后的十几天内再没有进过会场，也不找人谈话，以便参会人员敞开议论。会上，大多数干部认为胡耀邦来陕西工作后成绩很大，面目一新，缺点和错误只是局部的，还有一部分干部公开发言表示胡耀邦有功无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谈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认为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是要看是否将工作搞上去，他说：“耀邦到陕西工作时间不长，就将工作搞上去，说几句过火的话又有什么了不起？过去省委的工作倒是很稳，但生产和工作上不去嘛！”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动摇，耀邦的《电话通讯》，省委书记处的书记都是赞成的，我们地委书记也赞成，难道这些人都动摇了？”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不在会上发言，而利用会下时间到家中探访胡耀邦，表示支持。

这次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并没有达到某些人预想的结果，此时，省委文教书记发表《我们必须分裂》的发言，指责胡耀邦的错误是“政治上的动摇”，是“对革命动摇”，抨击胡耀邦对抗西北局的批评，讽刺胡耀邦的检讨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在发言中号召与会干部“同胡耀邦必须分裂”。他的这篇发言实际并未经过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委的集体讨论，是有违组织原则的，尤其是对省委第一书记的批评发言，过去基本上是不允许出现的。

胡耀邦在这次会议期间，一直默诵白居易的《咏李都尉古剑》名句：至宝有本性，精钢无与俦，宁为寸寸断，不做绕指柔。平时，他只念诵前四句，这位省委文教书记发言后，他气愤难抑，大声念诵这首诗的后两句：愿快直士心，当断佞臣头。胡耀邦背诵这首古诗，是希望那些执掌领导大权的人，能够像古剑一般刚正不阿尽职尽责，发挥自己的作用。

6月11日，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第116次常委会上发言，讲了包括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他在肯定已经作过的检讨的前提下，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三个暂停”等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他虽然对社教工作成绩肯定不够，但也没有夸大缺点；说明他不同意说光抓生产而忽略革命，也不同意说没有抓阶级斗争，贯彻“二十三条”就是在抓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号召干部领导生产，就是在“抓革命、促生产”；说明他不同意少征购，向中央要化肥就是“物质刺激”。他反驳了那些“上纲上线”的“批判”，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正面主张。最后，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似乎有那么一种观点，只要在工作中出了毛病，发生了某些片面性，就一定是总的指导思想上左了或者右了，就要上纲上线，这是一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表现。”“不能把局部的或者一时的容易纠正的片面性，同这种片面性滑下去以至于形成某种倾向的错误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工作中

的一般错误都提到纲上来。”“乱贴左倾或右倾的标签是有害的。”

胡耀邦发言之后，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不做结论的会议纪要，省委六月工作会议于18日结束。

在省委六月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上将、张宗逊上将到西安出席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会议，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叶帅洗尘的餐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啊。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宴后叶剑英留下胡耀邦单独谈话，了解他在陕西的处境。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胡耀邦回答：“您如果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过六次检讨，可还是过不了关。”叶帅问：“到底是什么问题？”胡耀邦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斗不过他们呐！”并给胡耀邦出主意“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

6月18日，胡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知道叶剑英要带走胡耀邦，不便阻拦，只得给胡耀邦回信，要他好好治病。胡耀邦黯然离开陕西，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人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受到长期的整肃、批斗和折磨。

至此，胡耀邦自1964年11月30日抵达西安就职，到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前后在陕西200天，其中工作100天，被批判和检讨100天，陕西的“百日维新”就这样过早结束，这不仅是胡耀邦个人的命途多舛，也是一出历史的悲剧。■

（作者为陕西省政协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严正声明

近期发现网上流传着一些《炎黄春秋》Word格式的电子版，该行为系盗用我社的名义，且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篡改并恶意传播，严重侵犯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及作者的合法权益。我社将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炎黄春秋杂志社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400-610-0896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盒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530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2461278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2461279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5100295号

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

○ 陈铁健

2001年夏，到嘉兴会友，顺便参观嘉兴南湖中共建党游船。回京途经上海，又去看“一大”纪念馆。进入陈列大厅，看到一组群体蜡像。13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其中14人坐着，一人如鹤立鸡群，居中挺立，侃侃而谈。他是会议记录员毛泽东。沉稳睿智，胸有成竹，俨然领袖风范。几乎所有人仰视的目光，都聚焦于他的身上。会议主席、素来傲慢的张国焘，局促在桌端，挟在三人之间，露出半边脸，竟是一副肃然聆听的姿态。

看后抹不掉心中的困惑：一个记录员在那里指点挥斥，中共“一大”会议的现场情境，原来竟是这样的吗？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遵循陈独秀关于先建团后建党的指示，当时，湖南尚未成立共产主义组织。

毛泽东在湖南创党活动中，始终是在陈独秀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并取得不小的成绩。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毛泽东对全国建党的其他建树。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说：“他（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注1]因此，“一大”纪念馆陈列的那一组突出毛泽东个人形象的蜡像，不具备历史价值。

创党前后思想轨迹

陈独秀早年以文人办报入世，摆脱康梁改良派思想，参加辛亥革命后，多辅助他人做事。如辅佐柏文蔚在安徽理政反袁；襄助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面对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无政府主义三股思潮，始终保持独立不附。在消沉、亡命中，不忘读书、思索、著文。1914年，他第一次以“独秀”笔名在《甲寅》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奇文，向传统忠君爱国愚念挑战。国家要为人民谋幸福，“爱国不可与忠君同义”。爱国需要以国家政府值得爱为前提，而非绝对必须去爱。袁世凯政府及其喉舌倡言“谁反对政府，谁就是不爱国”。独秀此文恰要夺其“爱国”这一武器。此文刊出，遭举世诟骂，及至“二十一条”事发，恶国家不需爱，得以完全验证，持此论者已不在少数。这时，陈独秀已有新的打算：自己独立主编杂志，扬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注2]

吴稚晖著文讥讽说，章士钊貌似诸葛亮，陈独秀不过是鲁肃，给章打下手。[注3]出乎章士钊意料之外，一年之后，当《新青年》创刊高扬科学民主大旗时，陈独秀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思想变化之快，令人惊异。五四时期，陈独秀由宗奉西方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近于用改良办法，达致合法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为两大门派：考茨基的阶级调和论，列宁的暴力革命论。陈独秀的主张，显然接近于前者。过去被众多学者认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其实与陈独秀并无不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重在“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注4]陈独秀又从日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译介日共党员写的文章以及施、周所写通俗文章中，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摒弃社会民主主义。不久，维经斯基来华，带来大量共产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又在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影响下，陈独秀立即投入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专政理论的怀抱，其标志是1920年9月公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

(即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来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注5

陈独秀告别曾经的清醒,走上了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之路。把民主一切两半,一个叫资产阶级民主,一个叫无产阶级民主,误信列宁所说后者比前者民主高“百万倍”。注6

这时,曾经主张“人道主义”,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李大钊,也转而信奉列宁主义,跟随陈独秀一起来创建列宁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了。

1920年6月,陈独秀建立上海发起组,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党活动。除李大钊在北京的建党活动与陈独秀南北呼应之外,其他地区如济南,陈独秀致函王乐平,王联系王烬美、邓恩铭;武汉,指派刘伯垂(另由李汉俊委托董必武);湖南如前述,陈亲自指导毛泽东;欧洲,函嘱张申府,联系赵世炎、周恩来;日本,指派施存统、周佛海;广东,由陈独秀在广州直接指导。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接受列宁主义的是陈独秀而非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是陈独秀,而非毛泽东。

走俄国人的路?

陈独秀与苏俄在中共建党思想上,曾有重大分歧。这要从列宁首创的世界革命理论说起。列宁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反帝国主义)民主(反封建主义)革命运动,应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苏俄革命)相互结合,以推行世界革命。这些落后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先进国家苏俄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直达苏式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真义,远说要把“苏维埃”旗帜插遍全球,近说要使布尔什维克革命跨出苏俄国界,制造近邻亲苏政权,以拱卫和巩固苏俄政权,中国便成为其实施世界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苏共中央掌控下的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始终把维护苏俄党与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的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

陈独秀

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最青睐的人物是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陈独秀。他们拿出大量金钱和武器扶植其代理人,只不过是为了掌控和利用这些代理人,以换取苏俄更大的国家利益。

对于助建共产党,苏俄只求迅速建立一个对现存中国北京政府不利的革命党,可以容纳无政府主义者,要“快快干”,不能“慢慢来”。这与列宁主义中残留民粹主义思想,不无关联。列宁崇拜的俄国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著有《革命者教义问答》,规定如下革命教条:

“革命者没有个人利益、私事、情感、恋情、财产,甚至姓名;

革命者与一切秩序、法律、道德断绝关系;

革命只懂得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

革命者要摒弃一切浪漫情怀、多愁善感及热情,要冷酷对待自己,更要冷酷对待别人;

应实施歼灭行动,不应有任何恻隐之心,包括对亲人、朋友、爱人;

革命者应把自己武装起来,无孔不入,渗透

陈独秀(左)和彭述

党》月刊,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越年,中共"一大"采用陈独秀主张,在《党纲》写进"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断绝与"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以及反对党派的一切关系。自我孤立,视一切为敌人,与苏俄布尔什维克亦步亦趋,激进得不能再激进了。

到社会各阶层;

应拟定一个暗杀、处死的名单、顺序,排名先后不是按其罪行,而是根据革命的需要;

革命者要与残忍的强盗团伙相结合,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革命组织应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的灾难与罪恶的加深,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起来暴动。"注7

比涅恰耶夫更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类似思想。如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以恶对恶,以暴易暴,革命者言行无需道德底线;劳动者处境越坏,越有利于驱动其加入革命行列,世道越乱越好,趁机夺权;用暴力流血把"愚民"引向"幸福"之途;把仇恨思维与斗争哲学强行"灌输"给民众;倡导横扫一切的虚无主义,等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不愧是革命原教旨主义大师。列宁、斯大林等人都尊崇这些前辈的教诲,吸收、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源。列宁认为革命者不应忘记涅恰耶夫,说他的表达震撼人心,让人永生难忘。而斯大林则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

对于苏俄的"快快干",陈独秀初时不以为然,认为中国革命应当"慢慢来"。然而,要建立纯正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自然就无法摆脱苏俄的窠臼。1920年11月,陈独秀创办《共产党》月刊……

陈独秀原先大言:"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注8后来建党、办刊需要经费,马林示好之后,陈独秀终于伸手要钱。卢布源源而来,陈也就不再顾忌"卢布党"的恶名了。稍晚接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不仅拿苏俄的钱,接纳苏俄军政顾问,还得到不少军事装备,从黄埔建军迅速起家。蒋深知苏俄染指中国的野心,一旦羽翼丰满,便与苏俄扶植下的中共翻脸,进而打发俄国顾问走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忠诚党员,其政治敏感性、前瞻性和预判力,远超书生革命家陈独秀。

陈独秀走俄国人的路,是耶非耶,正耶误耶?确实值得深思。陈独秀们,当时还不了解苏俄政治、政党真相,也未深知中国国情,更不知道以那样过激的手段去实现共产主义,要付出何等艰辛和巨大牺牲。

《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注9宣言出版后的四五十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指出,过去那种"街垒式斗争",那种"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时"。"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注10

当年,陈独秀创建中共时,不少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发起者是认可暴力革命专政和消灭私有制的。

然而，168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私有制加上市场经济，又经国家适度干预调节，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最早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德、荷，依然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生无忧、前景可期的国家。试问，是无产阶级陷入"绝对贫困化"，还是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反观苏俄式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标榜国有化实乃官有化，特权阶级随之产生。经济萎缩，民众贫困，文化倒退，思想僵死。苏联是不推自倒，应了黎澍生前所断定的"内溃"二字。苏俄建政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英美诸国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实践，两相对照，其优劣成败，实在不难判断。

剥夺资本家，消灭私有制，貌似公正，实则弊端甚多。一个工厂企业由三类人组成。工人以体力劳动创造财富，技术人员以科技工艺服务生产，工厂主以资本运作，规划指导生产。三者都对企业发展和生产成果，作出各自的贡献，缺一不可。在贫弱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小民族资产阶级，更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剥削有功论"与"劳动创造论"，应当并行不悖。如果执意消灭资本主义，剥夺企业家，无疑是"剥夺有过论"，大错特错。那不是右，而是"左"，是民粹主义的空想。

结束语

陈独秀一生63年，以爱国者、革命家、启蒙思想家著称于世。从卢梭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走向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这种变化，在欧洲经历一个多世纪，在陈独秀不过20几年。胡适称之为"终身反对派"，中共史书，一直冠之以"右倾机会主义者"。

陈独秀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除后，检视自己思想时坦承理论上"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注11]唐宝林说，"他没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因而坚定不移的理论基础"，"先是信仰法兰西民主主义，再是信仰列宁斯大林主义，最后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常常被牵着鼻子走"。过去都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乃至"投降主义"酿成。唐宝林就1927年春陈独秀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后，企图用工人武装冲击英租界，逼迫蒋介石反英，以挑动国际争端陷蒋介石于被动之举，指出陈独秀的乌托邦理想导致"无理智的拼命主义"，"只能说是'左'得可爱的绝望的挣扎"[注12]我赞同唐宝林的见解，陈独秀之误在"左"，而非右也。说他右了，是认为他还"左"得不够，应当更"左"。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陈独秀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终于在晚年大彻大悟，思想升华，达致真正启蒙思想家的境界，政治上低能的一介书生，却在思想上远超同时代的中国人。

本文定稿后，从"一大"纪念馆有关人士获悉，馆方已决定撤出那一组群体蜡像，重新布展。我衷心期待，一组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出现在中共建党之地。

注释：

注1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第1版。

注2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转引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注3 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先生文萃》第一册，全民书局1929年版，第316页。

注4 高瑞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注5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注6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9-643页。

注7 转引自虞友谦：《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瞿秋白研究文丛》第8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

注8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页。

注9 《共产党宣言》第2章。

注10 这个序言是标志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主义者视为修正主义，因此中文版马恩全集或选集均不收入。这里的引文，摘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转引【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45页。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227页。

注11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注12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481、530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左”倾思潮与政治标签化

○ 董宝训

“左”倾思潮是当代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持续存在的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左”倾思潮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走向，而且作为一种特定的、具有广泛支配性的叙事结构深深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当代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现象。政治标签化正是这种特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

政治标签化，即给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行为乃至不同的思想意识粘贴相应的政治标志，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政治标签化不仅与“左”倾思潮相联系，而且被“左”倾思潮推向了极端荒谬的程度。

一、当代中国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曾经以界限分明的三重身份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整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以界限分明的三重身份存在着：其一是阶级身份，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资本家、工人、手工业者等，这是烙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的第一张身份标签。其二是社会身份（主要表现为职业身份），如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知识分子等，这是烙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的第二张身份标签。其三是政治身份。政治身份的认定比上述两种身份要复杂一些，按政治面貌可以分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般群众等；按政治态度可以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等；按政治立场又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及其对立面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臭老九等等各种分类，并由此决定了社会成员在政治坐标中的定位。需要指出，按照上述标准对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认定与社会个体自身的认同与否几乎没有关系，它是按照社会预设的标准对社会成员政治身份的一种认定，是通过社会外部力量加诸于社会成员的一种政治身份，并且这种身份一经认定，就成为一种恒久不变的身份标志，成为一种可以被遗传的政治基因，具有再生产的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无法改变自己的阶级出身，但可以通过背叛，并且只能通过背叛的途径摆脱自己本来的阶级身份。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背叛自己的阶级可以成为革命阶级的一员，同样，出身革命阶级者，如果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也是对原有阶级的一种背叛。

应该说，任何社会制度的成员，因其所处的社会场景不同，都会相应地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呈现自己，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会像当代中国这样把社会成员不同社会场景下的不同身份赋予强烈的政治含义。

首先，就阶级身份而言，它是与生俱来的（这里是指家庭成分划定以后的子代、孙代成员），因此也是当事人无法选择的。在敌我友的思维定势支配下，阶级身份成为判定一个人政治上是否可靠的最原始、最基础、同时也是最方便的尺度。有西方学者指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人的实质的主要方面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广泛而具体的各个不同集团中的一员而存在的，他要受许多社会、政治关系的约束。一个人要成为人民中一员，就只能以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的身份而出现”。（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基本地位和政治的基本架构，根据这一基本的政治结构，不同的阶级身份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层级，并相应地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其

中，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村的贫下中农等劳动阶级是最可信赖的力量，在政治上处于优越地位，处在政治层级中的上层；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其他“反动阶级”则是革命的对象，处在政治层级中的最下层；处在政治层级中间层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村中的富农等，他们既是团结的对象，又是被改造的对象。随着“左”倾思潮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付诸于实践，阶级身份的符号意义更加凸现，阶级身份成为入党、提干、参军、招工、升学、提职等几乎所有社会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中考虑的首要因素。在国家的要害部门，尤其需要对出身于剥削阶级的社会成员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文革中，阶级身份的认定更发展为极端荒谬的血统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现代血统论的最通俗的注脚。这一口号在理论上曾经被质疑、抵制和批判过，但在实践上却把封建血统论推到了登峰造极、荒谬绝伦的程度，造成了现代血统论的空前泛滥，并演化成一种独特的现象。

在极左时期，阶级身份是获取政治资源的凭证，不仅在社会身份升迁过程中需要考察阶级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时时亮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出身“高贵”者可以获得政治上的一种无形的满足，产生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和安全感；出身“低贱”者则会自惭形秽，处在一种自卑、无助的状态，产生一种被歧视、被侮辱的感觉。阶级认证成为整个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随时随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阶级标签在极左年代已经演化为一种畸形的政治文化，并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演化成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暴力。

其次，就社会身份而言，由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尽管社会身份主要表现为职业身份，但它又不单纯是一个职业概念的问题，职业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架构中，当代中国的职业分殊变得异常清晰和简单，整个社会基本上分为四个边界清晰的层次：党政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即国家干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的体力劳动者，即工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在各种企事业单位中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其管理方式上归属于国家干部，但其职业性质与在党政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的党政干部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

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的职业身份也是国家有计划分配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职业身份甚至是先天注定的。如同阶级身份可以再生产一样，在当代中国，职业身份也具有非常典型的群体内部再生产特征。如党政干部的子女在入党、升学、提干中往往会优先进入选拔者的视野；军人的子女具有参军的方便条件；工人的子女享有在城市就业的特权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保障；农民的子女除非极个别的幸运者可以通过参军、升学、招工等机会改变自己的职业身份外，绝大多数只能世代务农。1958年户籍制度改革后，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二元分隔，农民被进一步固着在土地上。

职业分层上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社会身份和经济收入上，同时还体现在政治地位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标榜其国家的全民性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强调国家阶级压迫与统治的重要职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共产党追求全社会的经济平等，但它从不承认不同阶级之间在政治上具有平等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宪法的庄严规定。具体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自然地受到政治上的信任，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中处于优先地位。在利益综合中，工人阶级的诉求会得到重视和优先考虑。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实现对国家领导的依靠力量，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其政治地位远在工人、农民之下。这样一种政治安排使得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在一种政治焦虑当中，他们的目标一直是寻求政治上被信任、被认同，寻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认定是对知识分

子的最高政治礼遇，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礼遇没有维持多久，反右派斗争后，知识分子重新被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畴。1962年3月，在国民经济及各项工作进行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重申了1956年的观点。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这两个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向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然而，这一次的调整仍然未能收到多少实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思想文化领域成为平行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另外一条“反修防修”的重要战线，为文革的发动创造了重要的舆论氛围。在“左”倾思潮的政治文化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政治问题是一种“原罪”，知识分子的思想总是肮脏的，因此需要不断被改造。柯庆施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徐铸成：《“阳谋”——1957》，见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柯庆施的话本身没有任何置评的价值，但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处境。如此看来，在当代中国，职业身份也具有某种政治标签的意义，一个人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地位。比如，在“左”倾时代，学术上的成就可以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业务上的骨干可以被批为“白专道路”，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往往都是首当其冲的对象，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通常却是受人尊重的，这或许就是“左”倾政治文化的玄妙之处。

其三，就政治身份而言，它的特点是其认定的标准更加具有主观性的色彩，与阶级身份和职业身份相比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治身份的标签意义也就更直观、更突出、更具效果。如上所述，阶级身份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标签，被视为一种恒久性的、且人人都有的政治标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只适用于特定群体，具有特定意义的政治标签，大都是在历次批判运动中产生的。如在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中从上到下抓所谓大大小小的“武训”，凡是对批判运动有抵制情绪的，或者不积极的都可能被指为“武训”式的人物，在这里，“武训”就成为一种政治标签。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运动中，主张稳健发展和反冒进的领导人被指为“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是成为一种政治标签。在反右派运动中，“资产阶级右派”成为一种政治标签。1959年庐山会议发动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后，在全国上下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凡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批评的都被指为“彭德怀式的人物”，“彭德怀”变成了一张政治标签。1960年代初期，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和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升级，“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成为新的政治标签。四清运动和文革中，“走资派”、“三家村”、“邓拓帮凶”、“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臭老九”等也都成为政治标签。这些标签的政治含义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定，但在“左”倾思潮的特定语境中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与阶级身份和职业身份都与特定人群有着固定的对应关系不同，政治身份具有易变性的特点，其构成群体是不稳定的，今天是坚定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成为反动分子。与阶级身份和职业身份有着相对严格的认证标准不同，政治身份的认定标准是较为模糊的，政治标签可以任意粘贴，并且是一种进攻和自卫的必要手段。比如，文革初期，聂元梓等人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责宋硕、陆平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暗指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大学党委组织大字报进行反击，同样把聂元梓说成是“邓拓帮凶”、“党的叛徒”、“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等等。可以看出，在加贴政治标签的问题上，双方在思维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刘少奇、王光美可以根据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的逻辑和以往历次政治斗争的经验，把蒯大富等打成反革命分子，蒯大富们则可以根据阻挠文革就是反革命的逻辑，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是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高代理人，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作为政治标签任意粘贴的其他形式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除身份标签之外，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公与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也都可以作为政治标签任意粘贴。在1954年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中，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变成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学术批判演化为一场政治围攻。俞平伯被说成是“胡适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俞平伯的思想被说成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俞平伯的著作则被认为起到了使“胡适的实验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借尸还魂”的作用。在这里，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总代表，本身就是一张政治标签，谁粘上它必遭政治厄运，无怪乎曾经受到胡适赏识的吴晗要千方百计地与他的老师划清界限。按照“左”倾思潮的逻辑，“一大二公”、公共食堂等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包产到户、自由经营等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中的精神激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激励和利益原则是资本主义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任何形式的私有制都是资本主义的，因此也就有了文革时期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行为。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坚持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非阶级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歌颂工农兵是马克思主义的，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的；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让步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在“左”倾思潮肆虐的时期，可以说生活中到处都有政治，稍不小心就会触及政治的雷区。

三、政治标签化在本质上是身份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从身份到契约”是社会进步的必经历程

政治标签化在本质上是身份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随着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战略的稳步推进，过去人为地附着在每个人身上的特殊政治标签逐渐被淡化以至遗忘，政治身份不再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条件，代之而来的是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不再由政治出身决定，而是由法律决定，中国社会在不知不觉间正孕育着由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深刻变革。著名的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在其法学名著《古代法》一书中写下那句不朽的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从身份到契约”是社会进步必经的历程，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的这个转变历程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开始的，其直接动因正是源于对文革和“左”倾错误的否定。■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冯立三）

2015年出书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①**文学及小说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游记、通讯等；历史、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②**社科、人文、历史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③**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行政、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和学术专著；④**美术类书稿：**画册、书法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08-8708　　传真：010－6573503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牛萍萍、文馨、王双(编辑)
约稿详情、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zuojiaba.com
投稿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朗廷大厦A座515　编辑中心收(邮编：100024)

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

● 专业作家为您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等作品；● 只要您口述就行了，其余交给我们来做；● 作品以图书、光盘、摄影集、视频等形式发行；● 咨询热线：400-608-8708　　邮箱：bookzj@126.com

★咨询即有精美新书赠送(有限量)！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张一弓和《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　阎　纲

2016年1月9日，张一弓病逝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又一位故交走了，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多好的一位作家啊！

张一弓曾对我说："我替李铜钟辩护，你替我辩护！这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国家大事。"

不错，他写的是国家大事、历史事件，活生生的醒世恒言。

张一弓死了，李铜钟活着。

张一弓

一、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第一期《收获》发表之后，读过的人没有不说受到震动——三年困难时期因绝对权威的人治而酿成的巨大灾难如在目前，在反映前文革时期"左"祸祸国的作品以此篇最接近实情，最惨烈，极具爆炸性。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发表传递给我一个信号，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在控诉文革极"左"下红色恐怖的同时，已经将笔触探向十七年"左"祸下的啼饥号寒，不无理由地使人相信：文革极"左"，事出有因。

但是，对它的评价却大相径庭。

我当时在《文艺报》供职，特别注意发现新作新人，常常有报刊的同行向我打听有什么好作品值得向他们的读者介绍，我极力推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几周过去，没有反应，后来问及，才直言说"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不利于安定团结"云云。其他几个报刊的回绝也大致相同。我刊主编冯牧在发表于《上海文学》第六期的题为《关于近年来文学的主流及其它》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肯定该作，《文艺报》第6期在"新作短评"栏石泉的一篇千字文单独推荐了它。7月，我通宵完成一篇《"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长文，反诘"不利安定团结"论，发表在不大为人注意然而被不少人注意到的《新文学论丛》创刊号上。

1984年出版《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朱寨在《导言》的"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一章中写道：

……特别是《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作者的题材已进入长期讳莫如深的禁区和令人却步的危险地带。在疑虑和冷落中，我们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首先从法律与道义、组织服从与临时应变、动公仓与救民于悬命、英雄与罪犯等一切可以受攻击的矛盾之点上布阵迎战。论证严密，步步深入，以雄辩的逻辑论证了李铜钟不是"犯人"而是"英雄"。评论援引马克思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评论运用于李铜钟，证明李铜钟是属于马克思称颂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赋予李铜钟这一崇高形象以马克思主义的盔甲。在这样的英雄光照面前，"不但胆小怕事、明哲保身、谨言慎行显得卑微渺小，就连那些看起来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其实唯唯诺诺，也变得黯然失色。"

评论在这里也提出了暴露与歌颂的问题，指出"深刻的'暴露'使作品的歌颂显得动人之极；真切的歌颂，使作品的暴露警钟沉沉。"说明歌颂与暴露是矛盾的统一，本来就应该是文艺创作相辅相成的双翼，不应分割，更不应对立。

社会主义文学容许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悲

剧吗？在这篇文章中也作了坚定的回答："不但容许而且需要，不论是命运悲剧还是性格悲剧。悲壮的悲剧有时胜过愉悦的喜剧，对斗争的惋惜和追求，有时高于对胜利的祝贺和自得。"

李铜钟为了救民于饿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违法开仓，然后又自己报案伏法。如何评价这个悲剧的形象，与窃火给人间而被宙斯虐杀的普罗米修斯相比，问题就复杂困难得多，需要独立的思考。不经过独立的周密的理论分析，就不能得出"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结论。

二、再说犯人李铜钟

1981年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开始，主办单位是《文艺报》。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但是当时的气氛太不正常。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指名批评《文艺报》是"右派骨干掌权"，应该进行人员调整。紧接着，中宣部召开"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会上，林默涵就《文艺报》发表沙叶新的旨在针对"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扯'淡'》等错误倾向，亮明了他与周扬、陈荒煤和冯牧的四点分歧。所以，《文艺报》的领导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对于"人性"、"人道主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十分敏感，生怕被人抓住上纲上线，所以，对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评奖一事举棋不定。正是这个时候，作者张一弓所在的河南省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有的意见以加盖公章的单位证明信的方式转送到上级有关单位。反对这部中篇入选的意见主要是"暴露黑暗面"，其次是有着30年新闻记者生涯的作者本人在文革中曾经进入《河南日报》革委会，是"三种人"。但是初评小组全体中青年评论家坚持给奖不动摇。《文艺报》为此专门派人前往郑州、登封等地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一、作品暗指的"信阳事件"确有其事，事实比作品所写还要严重；二、张一弓文革中进入河南日报社领导班子是事实，但属人民内部矛盾，更不是"三种人"，可以发表作品，至于能不能给奖，其说不一。事已至此，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一等奖共设5名）。后来由于各种考虑，将谌容的《人到中年》排在一等奖的第一位，《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排列第四。

三、事实证明，"信阳事件"的真相比张一弓书里写的严重得多

据原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树藩和肖冬连等披露，河南省上世纪50年代末的浮夸风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锅。当时的口号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大好形势下的历史功绩和地方官的伟大政绩，就是省委书记吴芝圃用高征购敛聚的资金在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的别墅群。

历史作证，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当初发表于"安定团结"无碍，后来获奖于"安定团结"亦无碍，殷鉴不远，于今则大有裨益。■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专职评论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永远的顾先生

○　贺捷生

顾骧先生比我大五岁，我称他"顾先生"，是由衷的。这些年知识界推崇民国范，以我的童年在民国受到的教育，"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崇高的，不怒自威；在路上遇到，像我们这些小女生，无论在疯跑还是在谈笑，都得迅速回到学子的位置，躬身而立，向先生问好。我认为顾先生就是一个有民国范的人，他爽朗，豁达，知识渊博，出现在什么场合，都是一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样子。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因写过几部电影和电视剧本，发表过几篇稍长的报告文学，在文学和影视圈，偶尔也被邀请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评奖当个评委，开会做个嘉宾什么的。还有，每逢召开作代会和文代会，我也成了代表，经常与文学艺术界的头头脑脑和各路名流擦肩而过；或坐在观众席的某个椅子上，听他们侃侃而谈。久而久之，他们中有的成了我要好的朋友；有的见了叫得出名字，却因隔得太远，疏于来往；有的知道名字，也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个大作家，大艺术家，但与具体的人对不上号。顾骧与我，就属于最后那种人。

2002年冬天，写过《甲午风云》和《傲兰·一蕾》的著名剧作家叶楠先生病得不轻了，抗抗在他住的海军大院附近餐馆订了饭菜，她知道我与叶楠和他的孪生兄弟白桦关系不错，约我和大家一起聚会陪陪叶楠，这份心意不言自明。抗抗在电话里说，顾骧也要参加。我说，顾乡？是北影那个女孩子吗？抗抗说，不是女孩子，是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你应该认识他的。抗抗提醒说，您不仅见过顾骧，还当着许多人的面见过不止一次。但抗抗越提醒，我的脑子越是一片空白。我说近来我老忘事，具体到哪个人，就是对不上号。抗抗笑了，说，你家离海军大院近，明天我们先上你家，见面你就知道顾骧是谁了。我说好，我在家等着，但千万别告诉顾骧我不认识他。

这里有个故事。我说的顾乡，是部队老诗人顾工的女儿，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顾乡有个弟弟，叫顾城，就是写朦胧诗、后来在新西兰激流岛出事那个顾城。而顾城出国，又多少与我有点关系。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对西方邀请出国的人有所限制。顾工因儿子顾城办不下签证，找到我说，贺大姐，孩子是个木匠，写朦胧诗出名了，但朦胧诗在国内不受待见，而且他除了写诗，再不想干别的，连自己也养活不了；现在国外邀请他去访学，对他也是一条路。当年我在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工作，老伴李振军在武警当政委，都认识一些人，最后我们通过关系，帮他们办成了这件事。

顾骧与顾乡，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就这样被我搞混了。

第二天，我在木樨地24号楼家里等待抗抗和顾先生到来，门铃响过，我刚拉开一条缝，一个震动耳膜的声音传了进来："贺捷生，你不认识我？真是贵人多忘事嘛。"不用问，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就是顾骧了。他不算高，微胖，像教授那样架着一幅宽边黑框眼镜，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我来不及问他为什么没有和抗抗一起来，连忙道歉，说失敬失敬，顾先生哪能不认识？是我听差了，把你听成顾工的女儿了。她也叫顾乡，城乡的乡。到这个这时候，我完全想起来了，我确实见过他，也确实不止一次见过。接着我说，顾先生是多大的名人，让我高山仰止。他哈哈大笑，不请自便地坐在会客室里的一张硬木椅子上。我老伴走进来和他握手，他又呵呵大笑，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我不能说谎，直到顾先生坐在我家里，对我就像对学生那样直呼其名，我对他的过去仍然一无所知。后来，经抗抗他们介绍，加上读了他的

顾　骧

书，我才知道，他是江苏盐城人，出身于没落封建士大夫家族，曾祖父当过淮安府官吏。他自幼好学，5岁发蒙，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新四军苏北文工团写剧本，当时只有14岁，是个名符其实的红小鬼。解放后，因渴望接受系统教育，脱下军装，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正儿八经地啃过黑格尔的《小逻辑》。那可是世界哲学名著，艰涩难懂，没几个人读过，更别说弄懂弄通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如鱼得水，先后在人民出版社、政务院出版总署、文化部出版局、中央文化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国务院文化组、文化部教育司研究室、文化部理论组、全国文联研究室、中宣部文艺局工作。1991年从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的位置上离休。总体印象是，他当了一辈子的文化幕僚，摇了一辈子笔杆子，在很多宣传文化机构工作过，是从意识形态的惊涛骇浪中闯过来的。

认识顾先生的第二年，读到他出版后签名送我的文化回忆录《晚年周扬》，我暗吃一惊，原来他当过周扬的笔杆子。1983年，周扬在中央党校作的那个在思想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就是王若水、王元化和他三个人起草的。而引起当时在中央主抓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极力反对的，正是他执笔的第四部分"人道主义和异化"。1984年1月，胡乔木组织力量，数易其稿，选择在周扬作报告的同一地点中央党校，作了与周扬针锋相对的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否认周扬有关"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观点，导致在思想文化战线掀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晚年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周扬，最终被迫向中央作了检讨，几年后便郁郁而终。

或许我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早就感到厌倦了，当又一场思想战线的论争到来时，我避之犹恐不及，因此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战知之不多。只记得白桦因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受到猛烈批评，深陷在波涛汹涌的政治漩涡之中。二十多年后，当我从《晚年周扬》中得知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胡乔木、周扬和可怜的白桦，还有站在周扬身后的顾骧，就只能对此发出一声感叹了。因为胡乔木、周扬和白桦，或是我敬重的前辈，或是我的朋友，他们最后的政治命运，或多或少与这个事件有关；几十年来始终在思想理论战线冲锋陷阵的顾先生，他的资历那么老，影响那么大，但晚年长期心情郁闷，最后因肝气淤结而患病，是否也是为此付出的代价？

事后我发现，我与顾先生渐渐走近的过程，其实是我渐渐认识更多的文学朋友，渐渐回归文学的过程。首先让我惊异的是，我在文学界少有的几个好朋友，如金炳华、高洪波、张贤亮、张抗抗、梁晓声、叶文玲、程树榛、柳萌、杨匡满等等，也是他的好朋友。他甚至和程树榛和杨匡满住在同一栋楼里；参加什么活动，可以坐一辆车来回。我熟悉的总后老政委周克玉上将，竟然既是他的同乡、同学，又是他的新四军老战友。此后，每逢我与这些朋友见面，只要他不在场，都会想起他，谈论他。遇上有些档次的聚餐，一定请他也出席。

接触多了，我慢慢感到他有心事，情绪有些落寞、悲伤和孤单，但却从来不对朋友们诉苦，就很想帮他做点什么。比如，听人说他住的房子很小，堆满书的空间非常逼仄，有一次，我当着他的面给作协领导提意见，请求组织帮他解决困难。该领导无可奈何地笑笑，让我问他中国作协是否

顾骧著《晚年周扬》

给了他大房子，他无语而答。我猜想他有难言之隐，也就不问了。

想不到，我没有帮上他，他反倒热心地帮起我来了。

2009年11月，顾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鉴于世风愈下，道德泯失，需要文化人通过对文化的坚守，唤起社会的良知、社会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底线，为此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和他商量，拟选十位品德高超的散文界高手编一套"文化人散文随笔丛书"。请他担任主编。他推荐入选的十个作家中，有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忙问另外九个作家都有谁，他说有铁凝、肖复兴、徐小斌、邵燕祥、于是之、袁鹰、吴冠中……我马上打断他，说不行不行，你选的这些人，不仅品德高超，也不仅是散文界高手，像小说家铁凝、徐小斌，诗人邵燕祥，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画家吴冠中，都是业内大家，如雷贯耳，我写的那些小随笔、小杂感，怎么能跟他们比？他一听这话，不高兴了，又直呼其名，说贺捷生，你怎么这样没有自信？凭你的人生经历，你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还有你与众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感联系，在这套守住文化坚贞的丛书中，独一无二，谁也不能取代。你以为我推荐你，仅仅因为你是元帅的女儿吗？不是的。然后不容争辩地说，你听我的，就这么定了，加紧准备作品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不平静。我知道顾先生无论怎样鼓励我，说我写的那些小东西多么好，多么有价值，都是站在诲人不倦的角度高抬我，提携我，千万不能当真。至于编一本书，最后我想，作品质量有高有低，读者见仁见智，既然推辞不掉，那么恭敬不如从命。

那年我74岁了，虽然积累了许多资料，也动过再写点什么的念头，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未来的写作不敢抱多大的希望。当我把十几年来陆续发表在报刊上的长篇短章汇集在一起，心里竟有些莫名的激动。我从小爱好文学，爱好写作，还在湘西隐姓埋名求学的时候，就想当一个女记者或女作家，但之后几十年，一路艰辛，一路坎坷，到古稀之年回过头来检点这些文字，却是那么贫瘠，那么荒凉，让我心生愧意。不过，文学在我的心里，依然是崇高的，依然像花朵那样艳丽，流水那样清纯。人老了，我庆幸这些文字还能让我敝帚自珍，让我觉得心里有梦，有念想。正因为如此，我把我一生中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定名为《索玛开花的时节》。

索玛花在我的老家湘西，叫杜鹃花，俗称映山红。我爱这种花，是因为它们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一路盛开。

《索玛开花的时节》出版后，顾先生比我还高兴，马上提出召开作品研讨会。他说他的许多朋友给他打电话，一些读者还给他寄来热情洋溢的信，说这本书有立场，有品位，在文学界独树一帜。我知道他还是在鼓励我，坚决不答应。我说顾先生，你即使借我一个胆，我也不敢开研讨会。别说在文学界，散文界，即使在这套丛书的十个作家中，我也师出无名，甘拜下风。顾先生又一番谆谆教导，我就是不松口。最后，架不住他的反复劝说，我同意开一个小范围的答谢会，请他和长期帮助我的张抗抗、程树榛、艾克拜尔、杨匡满，还有几个部队的朋友吃一顿饭。可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时任总政主任李继耐上将也得到了消息，说要来参加。我没有退路了，只好临时借餐馆的一个能坐十几个人的会客室，在饭前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

在这个原本没有计划的座谈会上，顾先生有

傅璇琮给我的一封信

○ 刘再复

听到傅璇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北美高原上，又一次默然涕下。先生是我真正的邻居。他一家就住在我的楼上，那是北京劲松104号的拐角处，我在一层，他在二层。他的两个女儿跳绳时，我能微微感觉到。

傅先生兼任学者（专治唐代文史）与编者（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忙碌得很，但每次在楼前相遇，总要站着说几句话。他不善于言谈，甚至有点羞涩。每次见到他手提小篮子去取牛奶或买菜，我就感慨“真人无相”，满肚子学问，却一点学问的架子也没有。

然而，傅先生却有两件事让我感动不已。出国27年，我几乎年年想到这两件事。头一件事发生在1987年。那时全国正在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运动触及到我。我因发了刘宾雁文章，撤下后又被指责为‘开天窗’，最后又被撤销《文学评论》主编职务。傅先生在书局里大约也听说了。因此，便不平而鸣。有一天傍晚，我听到有人敲门，立即去开门，一开竟见到傅先生站在面前，我请他进屋坐坐，他却什么话也不说，只塞给我一封信，是中华书局的信封，中间写着‘刘再复同志’，下边署着‘傅璇琮’三个字。把信交给我之后，他就掉头往楼上走。我们虽是邻居，但很少交往，此次他特地给我写信，一定是有什么要事急事，于是，回到房里，我立即开灯坐下来读他的信。此信全文如下：

备而来，率先发言，对我这本小书进行认真又不失专业的评点。让我感动的是，他第一次不直呼其名，改称我“贺大姐”。那种姿态，就像毕业班的老师对学生发表临别赠言。五年后，他已不在人世，我找出当年朋友们帮我整理的录音稿，听见他洪亮的声音再次从记忆深处传来：“今天开这个会，我认为可以叫作祝贺会，祝贺贺大姐这本散文随笔《索玛开花的时节》出版。文艺界的朋友、军内军外的朋友看了这本书，都觉得好，我在这里先引用一个读者，也是贺大姐的一个粉丝反馈的信息，我原原本本地把它读出来：‘顾老师：贺姐姐那本《索玛开花的时节》，值得认真地阅读，我在北京至太原往返6个小时的动车上，一口气读完了它，对贺姐姐又有了新的认识，增添了新的崇拜感。她的人生不凡！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她有思想、有理想、有正义感，既有文采又显崇高。你作为主编向读者推出这本书，功德无量，在此我表示衷心感谢！’”接着他说：“我赞同李继耐主任进来时说的，贺大姐的《索玛开花的时节》，是一本历史和艺术相结合的有价值的精品。她把这本书交给我们出版，使这套文化散文随笔丛书越发显得沉甸甸的。已经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和期待读这本书的人，相信都有这个感觉。它有历史价值，思想价值，也有审美价值，而且文笔很优美。因而，在此，我要说一句冒昧的话，她这本书，在当今的军旅文学中，恐怕也是佼佼者。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贺捷生大姐不但是一名著名的军旅作家，也是当今文坛的一名受人尊敬的知名作家……”

听着这席话，我心惊肉跳，热泪盈眶。虽然我心知肚明，知道顾先生对我的称赞，仍然是先生对学生的称赞。如今，事过多年，想到我的写作能持续到今天，我才理解，他当年说的那席话，对我的写作和今后的路，还有“扶上马，送一程”的意思。

那天，我记得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我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是：顾先生，您是我永远的“先生”。■

（作者曾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部长）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再复同志：

关于《文评》最近的事，我略有所闻。对一些不公正的指责，我听到后深为反感和愤慨。不过我深信，一种思想，可以被非难，或者批判，但只要符合事物发展前进的方向，是不可能因人为而消灭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多得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范缜神灭论，遭到当时王公贵族及其周围大批文士、僧人的围攻，但没有多久，这些人的姓名湮没了，范缜却一直传了下来。曹丕有几句话讲得非常好，说："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曹丕这里讲了文学作品在历史上流传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就是文学作品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开辟道路的。真正的作家不靠历史家的舆论，不靠政治权势，靠的是自己有价值的作品。这也就是说，舆论和权势，对于作品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无能为力的。中古时期我国文学思想有这样的认识，我以为是了不起的。可惜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论著对这却未有充分的重视。曹丕的这一认识，后来被杜甫接受并发展了，因此他才针对当时人对初唐文学改革派王杨卢骆"四杰"的污蔑，明确地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就是杜甫再一次揭示的文学作品将排斥一切不实之辞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我想，古人尚有这样的认识，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武装起来的今天中国学者更会认识得深刻。

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你近年来的文章，我只读过一部分，即使这一部分，好像也在似懂非懂之间。但我很赞赏你的开拓精神。

请多保重！

傅璇琮

1987.2.10

傅先生的信，写得很工整，他竟然用了"愤慨"一词，率真之情，一下子就把我打动。信中的每一句话都在激励我。他用历史事实告诉我应当坚持真理，不要因为他人的攻击和打压而退缩。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杜甫诗，虽早已熟悉，但此刻出于傅先生的关怀与勉励，却让我激动不已。这封信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慰藉，而且反映出中国一代耿介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风骨。这种精神与风骨可能被挤压到地底，但它在地底仍然要发出正直的声音。这点不屈不灭的稀声，正是希望的曙光。我知道写信的人发出大音稀声的人就在楼上，近在咫尺，只有几步之遥，他却要用信件文字表达，个中的郑重之意我当然明白。感动之余，我很想冲上去道谢，但最终没有动作，只是默默把信收好。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个早晨，我匆匆离开北京，带着一叠珍贵的信件，其中也有傅先生这封信。质朴的、低调的傅璇琮先生，大约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与文字从此之后便与我一起浪迹天涯，并帮助我穿越那些绝望的、濒于死亡的时刻。

傅先生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感动不已。那是80年代末那个不平常的瞬间。我和妻子已离开北京到了南方，此时，我的母亲和两个女儿尚在劲松寓所里。因为突然出走，许多朋友非常牵挂孤单无助的老人与孩子，据剑梅说，我们劲松的家仍然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也许正是这一情状，让傅先生的夫人(极为善良但惊魂未定的嫂夫人)感到不安。于是她不假思索地问傅先生：下边刘再复家仍然有许多人来，要不要告诉派出所一声？这时，向来极为平和、极为温和也极为尊重夫人的傅先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连说几声"你怎能这样想？你怎可这样想？"故事是1990年夏天一位前来美国的好友(在北京三联工作)告诉我的。听了这故事，傅先生那满身的正义感再一次于我心中大放光彩。20多年过去了，傅先生平实木讷的样子，还有他那愤慨不平的信件以及因我拍案而起的情景，一直在我眼前浮现。因为有此记忆，我总是没有丢失对人的信赖。我相信，即使社会变质变得如同一团烂泥，但大地上还是有绝对善的心灵跳动着。

2016年1月25日美国科罗拉多■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前所长)

(责任编辑　冯立三)

致本刊作者

至2015年12月，《炎黄春秋》仍有一部分作者的稿费无法寄出，主要原因是作者的信息不完整，请至今还未收到稿费的作者看到此信息后速与财务肖林女士联系。

联系电话：010-68525374。

炎黄春秋杂志社

李可染与《万山红遍》

○ 李兆忠

一、智慧:以象征意义不容歪曲的《万山红遍》回应"江山如此多黑"的酷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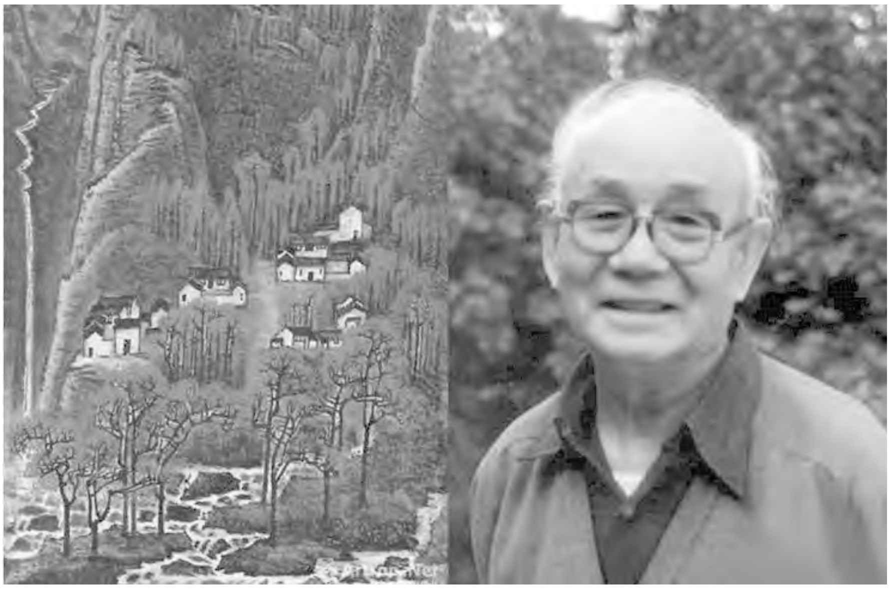
美术史家的研究表明,自1962年到1964年,画家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的意境,创作大同小异的山水画《万山红遍》七幅。这些作品在当时家喻户晓,产生了极大影响。

《万山红遍》的立意与艺术手法,正如画题显示的那样,突出在一个"红"字上。画家选朱砂为颜料。朱砂为大红色,有金刚和金属的光泽。由于朱砂的大片使用,画面笼罩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其象征的意味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当然一目了然。

然而,纵观李可染一生的创作,在此之前,没有类似的作品,李可染的水墨山水画用色一向很节制,尤其是用红色;在此之后,也没有相同的作品。一个疑问于是随之产生:李可染为什么一反常态,在那段时间里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绘制《万山红遍》?

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早在1957年1月就在《诗刊》杂志上发表,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五年后才问世,因此,不能认为它是急功近利的趋时之作。

据笔者的研究,李可染此举与此前美术界对他的批评有关。1959年"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夹着杂音,比如有人非难其"满"、"歪"、"黑",甚至讥之为"江山如此多黑"。对此,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的张仃撰文为之辩护,其中这样写道:"认为可染画得太黑了,若指笔墨而言,中国画的笔墨这一宝贵的传统,当然是画家尚须进一步追求的一个方面,若从风格上来说,则轻描淡写是一种风格,浓郁厚重也是一种风格,这决定于表现的对象与作家的气质。"(《李可染的艺术》,《美术》1959年第9期)这是行家非常到位的评论。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李可染、张仃联手革新中国画,尝试水墨写生,为追求中国画足以与西洋油画抗衡的厚重感,李可染吸取了林风眠的逆光法和黄宾虹的积墨法,画面因此而变得幽深厚实,层次丰富,突破了传统中国画固有的程式,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一句"江山如此多黑"的批评却暗藏玄机,其所指涉的内容,已远远超出笔墨和风格的范畴。在那个"泛政治化"、战争文化心理根深蒂固的时代,那种"阴谋论"式的文艺批评非常流行,犹如一柄达



李可染与他的《万山红遍》

李可染1972年作《北国风光》

千变万化，臻于神境。杜甫所谓元气淋漓幢犹湿，真宰上诉神应泣。石涛和尚题画句云：墨团团里墨团团，墨黑丛中天地宽，极言国画墨韵之美，此中堂奥门外人不易知也。”（见李可染《高崖飞瀑图》）这段跋不妨看作是李可染对自己一生中国画艺术实践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万山红遍》是反其道而行之。

摩克里斯剑，悬在了李可染的头上。

以一言九鼎的“万山红遍”，回应“江山如此多黑”的酷评，体现了李可染的政治智慧。而从艺术的角度看，李可染也取得相当的成功。李家山水特有的纪念碑式的构图，在强烈的朱砂红色与醒目的墨色相互辉映下，令人耳目一新，焕发着一种令人目眩的感染力与视觉冲击力。

有一种说法认为：《万山红遍》的问世与60年代初李可染从故宫弄到的半斤乾隆朱砂有关，然而笔者认为，这仅说中部分原因，即使没有那半斤乾隆朱砂，作者也一定会画这幅画，更何况，半斤乾隆朱砂不够画多达七幅的《万山红遍》，画家一定还掺用了其它的朱砂。

以毛泽东诗词的意境为创作题材，是当时国画界的一种风气，李可染、傅抱石、陆俨少、关山月、钱松岩、亚明等众多画家都有积极的表现，留下数量可观的作品。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画家对历史伟人毛泽东的崇敬之心，而且，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气氛下，这不失为一种高雅而最有安全感的绘画创作。即便如此，像李可染那样大量地使用朱砂，把画面绘成一片红色，在同类作品中依然少见。按照中国山水画的艺术传统，墨色本位，色彩辅之，墨彩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色彩世界，所谓“墨分五色”、“水墨胜处色无功”，此之谓也。这一点李可染本人尤为内行，而且身体力行，潜心追求。晚年他在画跋中这样题道：“吾国绘画基于用墨，历代匠师呕心沥血，墨水交融，

二、《万山红遍》只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形下偶一为之的作品，不好视为李可染的艺术标志

由此可见，相对于李可染一贯的创作路子和艺术风格，《万山红遍》只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形下偶一为之的产物，并不具有代表性，更不能将它作为李可染的艺术标志。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评价《万山红遍》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1949年之后，包括美术在内的中国文化艺术无一例外为“歌德派”所笼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有其合理性。经历了百年战乱、分裂、饥馑与列强入侵的屈辱，中国人民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历史氛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连胡风那位最具启蒙批判精神的作家，也写下《时间开始了》那样的歌颂诗篇。然而，一面倒的“歌德”无法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现实，必然导致艺术与生活的矛盾、错位甚至对立。尤其是到上世纪60年代，经过“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毛泽东发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四清”、“社教”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文革狂飙已是呼之欲出。此时，艺术与生活已是严重错位，莺歌燕舞的美好图景，与触目惊心的严酷现

实，形成强烈的反讽。绘画作为一门视觉艺术，为粉饰太平、营造革命乌托邦立下汗马功劳。当时的李可染，享受着普通中国画家不可能享受的生活待遇，冬季在广东从化温泉，夏季在北戴河海滨，从事新中国画的艺术实验。从客观效果看，连篇累牍的《万山红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且带有某种预言性：两年后，毛泽东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点燃文革的火焰，全国实现“一片红”，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扫荡一切，打、砸、抢风行，神州大地处于“红色恐怖”中。

三、被华君武戏称为“一只惊弓的老麻雀”的李可染难逃文革之噩运

公平地说，作为一个画家，李可染无疑非常杰出，作为一个人格独立、有社会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就像那个时代很多人一样，李可染有他的欠缺。分析起来，这与他胆小怯懦的性格不无关系。文革初红卫兵造反，与中央美院许多教师一起，李可染受到批斗和摧残，而性格的原因，使他受的折磨比起他人又重一倍。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中这样写道：“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略)的确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他虽未达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的程度，起码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够格的，但也逃不过这个‘劫数’。”“就是这一类中山狼(红卫兵小将)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更别谈要他说得出话。我心里向着他，我心里向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口里却不敢出声。”读来令人唏嘘。而据孙美兰的《李可染年表》记载：1974年，“四人帮”发动“批黑画，反击资产阶级黑线回潮”运动，李可染的《阳朔胜境图》被指为“黑画”，原陈列于公共场所的李可染的作品也被撤下，受此打击，李可染重病失语，只能靠书写和家人对话。甚至15年后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亦与他的胆怯有关。李可染的好朋友、前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漫画家华君武在纪念李可染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可染同志在艺术上是胆大的，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他又不免胆小，我曾和他玩笑，称他为‘一只惊弓的老麻雀’。可染的死，海外有误传，实际上是有两人因公向可染了解另一个人的情况，但同行有四人(其中有司机一人)都想去瞻仰大画家的风采，进门成了四人，可染大概就惊着了。”(《可敬可爱的李可染》，见《百年可染纪念文集》)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中国十七年的美术创作缺少特立独行的叛逆者，对此我们无法苛求任何人。但到文革后期，革命乌托邦的荒诞性、残酷性、虚无性已经暴露无遗，先觉者开始沉潜，开始反思。比如当年为李可染的“满”、“歪”、“黑”作辩护的张仃，此时隐居香山农民废弃的房子，远离滚滚红尘，开始焦墨山水的探索。悲怆焦虑的心情，使他对鲜艳的色彩感到厌倦，甚至连被面上的红色都无法容忍，结果只好翻过来使用。然而，同样是文革的受害者，从1969年到1974年，李可染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绘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故居韶山，视为革命圣地加以歌颂。作为后人，笔者无意也没有资格指责李可染画了《韶山》，而是想说，在主体精神丧失、言不由衷的情况下，画家不可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情感的真诚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如果说李可染画《万山红遍》时对毛泽东充满敬爱之心的话，那么到画《韶山》时，恐怕只剩下敬畏甚至恐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能画出平庸的政治宣传画。文革后李可染出的众多画册中，找不到一幅《韶山》，是最好的证明。

作为中国当代美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万山红遍》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提供了范本。然而就像很多“红色经典”一样，《万山红遍》精神内涵上的虚幻、夸饰、空洞，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作者在艺术形式上作了苦心探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

○　邢小利

从1966年12月至1978年6月22日去世，柳青从50岁到62岁，可以称为晚年。柳青晚年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的读史与反思。

由于常年患病和“文革”中的各种折磨，柳青身体越来越差。他自知来日无多，要把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思想”留给世人，但在当时条件下，不能形诸文字公开发表，他就以谈话的方式，告诉在身边照顾他的大女儿刘可风以及少数信得过的朋友，或以片段的笔记，记下他的所思所想。

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相关材料来自刘可风的《九年日夜》和笔者与李旭东闲谈所记。刘可风1964年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1970年3月毕业，从这一年开始，刘可风常在柳青身边照顾。李旭东比笔者年长，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他与柳青是陕北老乡，忘年交，其父辈与柳青的关系就熟而近。李旭东在和笔者同审电视剧时，就和笔者常谈柳青。若干年中，他说了不少柳青当年私下和他说的话。笔者从李旭东那里听来的一些柳青的谈话和柳青晚年的思想轨迹，在刘可风的回忆录《九年日夜》也看到了，而在刘可风回忆录中看到的柳青晚年的思想轨迹，有的则听李旭东讲过，由于是相隔数年分别听到，笔者相信，李旭东和刘可风所言的柳青谈话和柳青晚年的思想轨迹，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两者可以互证。

对世界历史的反思

1971年，刘可风借来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该书1965年由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汉译本，系内部发行，柳青看完后对刘可风说：“爸爸非常感谢你，看这本书，是我晚年的一次享受。”

刘可风回忆，她的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思考和感想，仅有的少量随笔录，关于二战中苏联、德国的历史就占了较大篇幅。比如，对德国纳粹统治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移居国外的现象，柳青记录了一些知识界、教育界、科技界人数变化的数字，然后写了这样一段话：

历史永远是按照唯物史观的规律发展，决不因为任何个人的意志而违反规律。某些强有力的个人意志，有时可以造成历史发展的暂时曲折，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每日每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而坚持真理的人，能够有多少呢？能够坚持真理而不碰碎自己，那就要善于坚持真理，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间，所有德意志民族的进步作家都出国流亡或在国内销声匿迹，这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学界道义水平高。

关于纳粹的文化政策，柳青写道：

1933年5月10日晚上火炬游行，午夜上万名学生游行到菩提树下大街一个广场，把火炬扔到堆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那晚共焚两万册书。其它城市接着也开始了，烧的都是德国和外国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书。

9月22日，在戈培尔领导下根据法律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文、音、美、剧、电、广、新七个协会，“使各方面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之下”。曾经有过那么悠久的、极高水准的文化，竟发生那么令人恶心的退化。没有一个还在人间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曾在纳粹当政时出版过。差不多所有这些作家，都在托姆斯曼带头下移居外国。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就是被迫保持缄默。

而相反的，当了德国剧协主席，一个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竟然说“凡是有人向我提到‘文化’这个字，我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

柳青对刘可风说：“一个搞文化的人，听见人

家提起‘文化’二字，就想掏出左轮手枪，你看有多么可笑！”

关于斯大林，柳青说：

希特勒1938年伪造红军将领的文件陷害红军将领这件事，不仅仅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而且达到了试探斯大林这个人的目的，看看斯大林对他的部下是否信任。

一个领导人对部下的信任包括着丰富的内容。简单一点来说，包括着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这种信任表示领导人对部下透彻地了解，即所谓“深知其人”，相信部下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并非对领导个人的忠诚（对个人的忠诚，一般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任）。

第二，这种信任表示领导人对自己的方针、政策和实际行动的正确性的十分自信。这样，他的部下只要有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就会对领导人忠诚，即所谓的“自知之明”，就是认识到自己正确和错误的地方。如果明知自己不正确，又怕部下不跟自己，这就不会产生信任，只能处于经常的怀疑状态。

斯大林正是这样的悲剧英雄。

由于他的权力来得不正当，就是说他不恰当地掌了权，个人不断地受到挑战，这从根本上影响他对干部的信任。他口头上要求人们对共同事业忠诚，实际上要求对个人的忠诚。他知道只要维护对共同事业忠诚，就不可能对他本人忠诚，因为人们都知道列宁晚年不赞成斯大林掌权，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苏联共产党人死在斯大林手中。

关于德国，柳青说：“1939年，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处书记，引者注）说过，德国革命是最成熟的。然而两年以后，同样的德国工人和农民穿着希特勒的制服，开抵莫斯科城下。希特勒统治农民、工人、工商业者、教员、学生，他们都就范了。统治思想家，没有就范的，都跑了。要统治思想就变成没有思想。”

柳青说斯大林：“渐渐给自己搞到上帝和上帝的唯一代表，皇帝所具有的特权，不允许有一点反对，因为他是唯一的、绝对正确的代表，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否则，就开始用最严厉的法律手段来处决反对者。这提醒了希特勒伪造证据陷害红军的高级将领，说他们为了推翻斯大林和纳粹勾结起来了。

“斯大林后来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不仅在苏联是唯一绝对正确的，在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里，也是这样。在外国党里，有不同意他的人，也不允许。斯大林三十年的统治，把共产主义运动导向一个奴隶制度，一切只服从一个人。”

柳青说：“没有斯大林，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许多现象，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的经验也是站不住的。我们的错误是从夸大个人的作用，忽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开始的。”

柳青读过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的英文版《致友人的二十封信》，1978年5月，北京外文书店的同志到北京朝阳医院病房看望柳青，柳青问能否找到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的《仅仅一年》英文版本（中文译本1980年9月才由外文出版局出版）。北京外文书店的同志很快给他找来，他拿起就放不下。柳青对刘可风说：“‘东欧人民总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比东欧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过得好？’我认为这一现象，关键在于‘民主制度’。东欧这几年政治和经济一定会波及苏联，威胁苏联的社会平静。我想，引起苏联国内一系列变化是可以预测的。”柳青还亲自译出书中的一段文字让女儿看。

柳青说：“阿利卢耶娃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如果党内和人民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

“资本为国家所有，用‘国家利益’任意消费国家资本，资本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地位分配，一些人得到特殊待遇——别墅、医疗、高工资、汽车、服务人员……苏联想建成顺民的共产主义，就是现在的结果。中国这样走下去也一样。怎样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必须建立民主制度，建立一个教育和改造人民、改造社会的民主制度。”

对中国历史，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

关于中国历史，柳青对刘可风说：“如果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再延续五百或一千年，中国在世界上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它将

是发达地区,到不了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就已经在许多岛上、陆地上繁殖生活起来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杀了有文化、有思想的人,釜底抽薪,想统治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希特勒也是这样。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的思想、政治禁锢在极端保守、闭关的范围内,一下子就是两千多年,使中国从发达国家逐渐成为世界上的落后地区。”

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以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读了三联书店1953年出版由黄绍湘写的《美国简明史》,一段时间,柳青几乎天天都在谈美国。他谈的最多的人物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得最多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产生,宪法的产生过程,两党制的形成,总统的任期,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

柳青比较熟悉美国的历史,他有时还用英语背诵杰斐逊执笔写的《美国独立宣言》。他说:“这是我在榆林六中学习英语时背下来的。”他谈到杰斐逊在美国宪法制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更多地谈到社会主义民主。他说:“没有民主还能称为现代国家吗?没有民主精神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柳青在很多谈话中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渴望:“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怎么能保证执政正常、有效和准确地进行?没有人民民主,连党内民主也没有,很可能出现一种现象:执政集团中这帮人上来,那帮人下去。”

柳青说:“俄罗斯有很长的中央集权、专制独裁的政治历史。中国这种历史更长。从秦始皇算起,约有两千二百多年。这个历史过程,给两国造成了各自的特征。”他说:“现在,对一般概念的民主和人道的蔑视,必然要导致残酷手段,不管目的是崇高的或者卑污的。”又说:“未来,终究有一天,人民要探讨民主和人道在我国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我看这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在人民群众中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领导,启发群众,而不再是无休止地重复一种思想条文,即使这种思想是科学的,更不用说是不科学的和矛盾百出的。”

柳青讲:“一种鼓励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和一种限制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将造成两种根本相反的历史面貌,不仅仅限于思想领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甚至同一种社会制度,由于不同的统治,形成了不同的时代,有些是相反的时代——不管国王、皇帝、总统、主席本人愿意不愿意,他所采纳的政策作为后来判定他的历史功罪的唯一依据,不管陛下和阁下如何自吹。请看看19世纪的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的。19世纪的美国主要的是国家扩张和个人发财,许多人从各大洲移民到美国去,不是为了追求自由思想,而是为了发财。除了黑人,移民去的大部分人都过好了。

读书与反思,促使柳青《创业史》的创作思路发生改变。柳青不能最终完成原来设想的《创业史》,却为后人留下一个真实、深刻、完美的作家柳青晚年形象

柳青说:“民主与法制,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在世时奠定它的基础,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对没有民主和法制的体会最深。它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几代人的奋斗。”

《创业史》本来是要描写整个合作化运动并歌颂这个“新事物的诞生”的,到了文革后期,柳青考虑的则是这部作品的最后一部“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认识深化了,变了,创作思想明显地也变了。

柳青在晚年,与在孤独中陪伴他的大女儿以及与友人在长夜中的谈话,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时日里自觉的遗言式的留言,留下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这是一份丰富的需要慢慢整理更需要认真研究的文学的与思想的遗产。这份遗产,将使柳青的形象以更为丰满更为立体也更为复杂的姿态出现。复杂未必是贬义,复杂的往往是深刻的。柳青并不是一个内涵单一的柳青。■

本文提到的刘可风的《九年日夜》,后改为《柳青与女儿的谈话》,作为《柳青传》的附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作者为陕西省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

(责任编辑　冯立三)

秦城内外的陈伯达

○ 袁 凌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前三十年”，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中关押了大量与高层政治斗争有关的人物，除了党政要员本身，他们的秘书也随之进入秦城，成为一类特别的住户，仅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就包括李锐、师哲、陈伯达、阎长贵等人。

陈伯达无疑是其中最特别和复杂的一位。他是货真价实的“秘书族”，为人也“灰溜溜的”，自称“小老百姓”，却又位列政治局常委，属于政治斗争的主角；他的政治面目一直游移不定，是老干部中的造反派，文革中期因为反张春桥入狱，却在文革结束后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政治定性比曾经的极左红人“王关戚”更重；他和毛泽东另外两位秘书田家英、李锐关系不睦，曾被李锐称作“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人”，却对毛忠心耿耿，在秦城高墙下的8年岁月里，乃致成为政治木乃伊的晚年，仍旧追念毛泽东早年的恩遇。

陈伯达秦城内外的人生沉浮，实为一份耐人寻味的历史和人性标本。

一

陈伯达是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坠亡的当晚押入秦城监狱的。文革前期，陈伯达曾是中央专案组王光美、陆定一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却沦为接受专案审查的囚徒。

在秦城监狱管教干部、曾任监管处长的何殿奎的记忆中，陈伯达是一个灰溜溜的人物，不像其他文革大人物那样头角峥嵘。从大人物成为阶下囚，陈伯达的畏葸心态在秦城囚室里体现得特别突出。[注1]

初到秦城，绝望的陈伯达把住囚室门口不肯进去，呼喊了一句“我救过毛主席！”根据陈伯达晚年的回忆，这件事指的是1948年春天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期间，因为特务告密，国民党飞机轰炸毛住地。住在毛附近、提前听见飞机声的陈伯达一路奔跑呼喊着到达毛的院子，说飞机就在头顶上。毛这才决意离开，绕过一堵墙炸弹已经夷平了院子。

这件事在文革后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中有不同说法，聂荣臻称当时是他跑到毛住所架起毛躲避炮弹的。四人帮倒台后，毛泽东当时两位警卫员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到陈伯达，但同时也没有提到聂荣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认为，这是出于文革后的形势抹煞了陈伯达的事迹。陈伯达自己对此显然很看重。直到晚年的口述中，他还不无委屈地申辩道：“如果是反革命，有这样忠心掩护毛主席的反革命么？”1988年，公安部向陈伯达宣布刑满释放，来日无多的陈伯达在朝阳医院的病床上再次表白了这一往事。[注2]

文革后期，陈伯达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同住看管。在牢房里，陈伯达曾经多次“寻死”。他晚年回忆，刚进秦城时，睡在一间条件恶劣的监室，铺的是草垫子。晚上他在被子底下偷偷用牙齿咬破手腕，却因为流血很快止住而未能成功。以后他换到了比较好的监室，这种私下自杀就此中止，“自杀情结”却未消失，演变成为在看守面前寻死，作势欲拿头撞墙，每次都需要两位战士左右挟持。

何殿奎被调来专门监管陈伯达。何殿奎住在陈的牢房旁边，时间一长，看出陈自杀是假意，故意命令战士放开手，任陈伯达去撞墙，陈伯达颓然而止。

冲突后三四天，陈伯达请求见何殿奎，当面打自己的嘴巴。何殿奎正色告诉他，“今后你的一切由我监管，胡闹不行。”

何殿奎说，陈伯达在秦城中的另一表现是爱

幻想。认为自己“临门表功”改善了监狱处境是一例。另一例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陈伯达在狱中变得很不安分，总认为江青办完了毛的丧事，会来接他出去。即使当年在中央文革被江青欺压，他仍旧抱着这样的幻想，却不料江青不久也前来秦城“做客”。

陈伯达受审照

陈伯达“不安分”的表现是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以后陈伯达开始拄拐行走，逐渐恢复正常。

这段经历，陈伯达回忆录的记载是：他在澡堂淋浴到一半，突然变成了冷水，年届七旬的他脊椎受寒，第二天就起不了床，只好住进了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起初他走不了路，只能在地上爬。“后来我扶着椅子，锻炼着站起来，慢慢地才能一点一点蹭着走。”

陈伯达入狱后生活有一定优待，主要是在伙食上，文革后期享受过每月60元的标准，“比家里吃得还好”。但总体仍旧不乏艰苦。8年间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又难于拆洗，自己形容“直如原始人一般”。其子陈晓农第一次探监见到父亲时，陈伯达的军服棉袄和棉裤都已磨破，边沿露着棉花。

在准备组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期间，陈伯达的优待被中止，搬入一排平房单身囚室居住，条件比以前差得多。[注8]陈伯达回忆录则称，当时报纸上登了一篇周培源的文章，批判陈伯达的反相对论。陈对看守发脾气，称自己并未反对过相对论，周是胡说。陈认为是自己的“不识相”导致了取消优待。

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判18年徒刑。当年8月15日，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是“十主犯”中最早离开监狱的，并且留在北京。

在陈伯达的晚年经历中，胡耀邦和周扬起到特殊的作用。根据陈伯达回忆录记载，陈保外就医初期有和中央书记处的联系渠道，直到1984年才中断。胡耀邦曾指示“陈伯达不要老是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意义的东西。”周扬则曾经和陈伯达会面。

陈、周两位中共高层不同领域的理论权威，在文革前的年代并无交集，周扬在文革之初被打倒时，陈伯达亦批判过周扬。文革中各自关押于秦城，周扬在狱中听到了广播不再出现陈的名字，知道陈倒台了，“感到很难过”。文革后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周扬和几位老干部一起帮陈伯达说了话，主张对陈伯达予以区别对待。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周扬曾邀请陈伯达去家中长谈，成为唯一一位与陈伯达有直接接触的高干。陈伯达表示刑满释放有机会愿意到周扬领导下的文联做点事。此后周扬还帮陈伯达发表了两篇在秦城狱中写的学术文章。不久，周扬因“人道主义”挨批，陈伯达亦被再次点名批判，二人各自处于困境，并不约而同进入医院，只能相互托人问候。

周扬于1989年7月底去世之时，病榻上的陈伯达写下挽联“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强调了周扬的早年功绩。一个多月后，陈伯达亦离世。

二

陈伯达和毛的另外几位秘书田家英、李锐、胡乔木等普遍关系不好。

文革初起，李锐被用专机送到北京，于1967年底被投入秦城，原因可能是在交代材料中不合时宜地揭发陈伯达。1967年7、8月份，李锐身在

安徽磨子潭水库，北京来人持中办和公安部落款和公章的介绍信，自称是周恩来领导的专案组人员，要求他交代与田家英、胡乔木、吴冷西的关系，当时田家英已自杀，胡乔木和吴冷西都被打倒审查。李锐答复说现在毛主席身边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是陈伯达，并给周恩来写了信。当年11月，专案组来人退回了信，称不能转交。[注4]

李锐对陈伯达的看法，可能含有延安整风的记忆。李在抢救中是挨整的，陈伯达却是成功跟风者。据单世联《革命人》一书记载，1940年，陈伯达曾与王实味就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陈伯达得知毛泽东提着马灯读了他反对王实味的小字报，兴奋得大呼“赶上了，赶上了”，从此陈伯达果然平步青云。在两年后对王实味的集体批判中，陈伯达说早就嗅出了王的托派气味，将王比喻为蚂蝗。

在十多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见风使舵，又增添了李锐对他的反感。庐山会议早期，陈伯达发表了对其福建家乡农村的调查，对大跃进有所指摘，与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看法基本一致，四人还曾散步闲谈吟诗。23日毛发表批彭讲话后，陈在小组会上成为受批评对象，“称病不出”，此后在8月14日的黄克诚检讨会上“赤膊上阵”（李锐语）批判彭德怀，将彭指控为高饶集团的主要头头，想要推翻毛和中央的领导。客观地看，陈的调子并不比当时的罗瑞卿、刘亚楼等人更高，但足以引发李锐和田家英的恶感。当年10月陈伯达发表长篇论文《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清算彭德怀在延安时期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账以及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庐山会议转向后，其他人亦多有批彭的“奉命作文”，但陈伯达此文被公开发表。

田家英对李锐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田家英早在陈伯达手下工作，据陈伯达说，他推荐田成为毛泽东秘书。但由于个性不同，二人却渐生嫌隙。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透露了田家英对陈伯达产生恶感的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在1956年，陈伯达负责起草中共八大决议，自作主张“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句论述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一句教科书式的表述，被认为是八大主要的理论成果，当时却引发了毛泽东的恶感，当场对身边人说：“这句话不好”。虽经表决通过，不久毛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议实际上被推翻。经沈志华考证，这段论述的基本意思毛本人已经在八大之前谈过，陈伯达在毛批示“付印”的定稿之外加上去的这两句话毛可能也看过，只是匆促之下未作修改。[注5]

由于毛泽东事后宣称陈伯达这句话没有经他看过，属于“越权”，自然引起了同为毛泽东秘书的田、胡的反感。另外，胡乔木在该文中还说，“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

田家英告诉李锐，陈伯达自诩闲云野鹤，却对无权势满腹牢骚。他在中南海的房子已经很舒适，但还想方设法装修，却遭到中央办公厅的拒绝。田家英最反感的是，陈伯达经常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跟风”正是“谏臣”田家英以及李锐无法容忍的。直到晚年，李锐仍旧在谈话中鞭笞陈伯达的这一作风。

奇怪的是，“跟风”的陈伯达却往往出轨翻船，前文的八大决议“私货”之外，1958年的郑州会议，陈伯达跟风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理论，遭到毛严厉驳斥，事后痛苦至极，李、田却毫不同情。[注6]

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已经进入秦城监狱的李锐和师哲都被要求揭发陈伯达。李锐曾对媒体称，当时他的态度很爽快，这是他久已等待的结果。师哲也“很愿意写陈伯达的材料”，但保卫干部出身的他很慎重，因先前他曾被传达过，陈伯达属于被保护的“钢铁圈”中人物。一直到专案组人员不得已拿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才答应写材料。陈伯达与师哲早年同有留苏经历，让师哲检举陈伯达，正可达成其“托派”“苏修特务”罪名，以后的中央专案组文件中即称“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

对此次检举，师哲晚年颇有悔意，称：“给我加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又说：“陈伯达不过是个过渡目标，批判陈伯达却要师哲开头，用心何其良苦！”[注7]

对于陈伯达与其他毛泽东“秘书族”的矛盾，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称，“撇开陈伯达与田家英

的个人恩怨不谈，他们之间的矛盾——大体仍属于文人相轻类型的矛盾，性格冲突居多，政治是非少。”而毛对秘书们的态度，正如耄耋之年的李锐曾告诉笔者的：并无恩义，只是使用，因他对于知识分子从骨子里不信任。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关怀警卫、司机这些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这些人也更容易崇拜毛。[注8]

晚年提及毛泽东文革中亲手打倒自己，陈伯达对其子陈晓农称：“他（毛泽东）老了，思想不正常了，才会这样。他过去不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记恨他。他以前待人是很宽厚的。”可见即使经过秦城炼狱，陈伯达对于毛泽东依旧一生愚忠，并无李锐和田家英的反思。

三

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秘书和中央文革组长，“大人物”陈伯达的政治角色和他的整个人生形象一样，暧昧不清，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色彩。

陈伯达上世纪初生于破落秀才之家，曾为小学教员，1927年加入中共，以后留苏，回国后曾在大学任教。延安时期，陈因其年龄偏大而被浦安修戏称“老夫子”，绰号大为流行。实则不单指其年龄，更在于陈暮气沉沉的书卷气，这或许与陈早年的私塾经历有关。当时陈在马列研究院工作，理论水平获得毛赏识，1939年调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秘书，此后开始了31年的政治秘书生涯。陈伯达笔头来得快，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书，成为中共“理论家”之一。1940年与王实味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笔战，则使他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

1949年陈成为中央委员。1949年前后，陈虽多有兼职，但一直没脱离毛政治秘书角色。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所谓“五大秘书”，排名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1958年的“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之初，陈伯达更进一步成为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文革组长。

虽然“位极人臣”，陈伯达始终没有脱离小心翼翼的秘书角色和“老夫子”的灰色气质。根据多位当事人回忆，陈伯达穿着土气，喜欢戴一顶老气的帽子，有一些看似不符合大领导身份的习性。在下基层调研以及与下属接触中，陈伯达比较平易近人，不讲究吃喝和摆排场，1961年在天津农村调查人民公社期间，曾经亲自拾粪，拒绝当地的保安措施，又死活不吃鱼肉宴席，给当时的中央政研室干部王广宇留下很好的印象。

曾在中央文革工作的金敬迈对“组长”陈伯达的印象也不错。与别人认为陈伯达“虚伪”不同，他觉得陈还是相对真诚的。在狱中，他曾拒绝按专案组要求揭发陈伯达，“觉得陈伯达比他们那帮人都好”。他称陈伯达不愿抛头露面，照相时都往后缩，当中央文革组长是被迫，在江青面前相当于“儿皇帝”，干什么都是错。至于陈伯达后来投靠林彪参与倒张春桥，“也没错啊”。[注9]

陈伯达喜欢自称“小小老百姓”，阎长贵回忆，他不论见到高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是双手一抱拳，如此开场。这句自况被江青斥为逃避责任，后来又被毛加上了后半句“大大野心家”。但陈伯达虽贵为政治局常委，在理论上多有建树，又领导《红旗》和马列研究院，却仍旧不过是毛的忠仆而已，不能和别的常委相提并论，他的“小小老百姓”多少是自知之明。

早在1960年，陈伯达的长子陈小达因和毛泽东长女李敏恋爱失败自杀，即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蒙上了阴影，其中难以排除有毛本人的施加影响。毛泽东对于陈伯达这位理论合作者的态度一直很复杂，其中难免有忌才心理，下面一例即可为证：

1949年底访苏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陈伯达也在座做记录。谈话中提到蒋介石，斯大林忽然面对陈伯达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不错。并端起酒杯向陈敬酒。陈伯达脸涨得通红，受宠若惊，且与斯大林交谈起来。回到住地，毛泽东对秘书叶子龙说：“像什么话嘛！你去告诉陈伯达，今后他不要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谈了。”[注10]

文革之初，陈伯达属于被划圈保护的人物，然而“九大”召开之前，陈伯达代拟的报告草稿反常地被毛原封退回，显示两人数十年的政治理论合作出现裂痕，毛此时已觅得比陈更为得心应手的理论仆从张春桥和姚文元。1970年庐山会议的一时错辨风向，即被毛称为“船没沉，老鼠先跑了”，举手之间

彻底打倒，欲求“面圣悔过”而不可得。

在中央文革，陈伯达实际是挂名组长，真正的掌权者是“第一副组长”江青以及“顾问”康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王力和文革办事组成员王广宇、阎长贵回忆，陈伯达在江青面前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穆欣和王力回忆，陈伯达自称为“刘盆子”，当其在会上意见与江青不一致，就会被拉到一边“做通思想工作”，其做通的方式，往往是像对小孩那样训斥，如直呼为“熊样”。江青之外，在文革小组中，陈伯达的权势甚至不如戚本禹，戚本禹经常公开奚落陈，并曾攻讦其“接受陶铸礼物”的“过失”。

陈伯达在文革极左派中的角色，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的邓小平的看法自然更具说服力。1972年，趁陈伯达和林彪先后倒台，邓小平从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给毛写信寻求谅解，表达复出愿望。在对陈伯达事件的表态上，邓小平说：“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在这样一封关键信件中的表态，可以代表邓小平及一般党内老干部对陈伯达的态度。注11

陈伯达的困境在于，他是一个缺乏承担的人，但恰恰推脱不了加在他身上的名义和责任。作为毛泽东用来驱动文革和打击对手的一根棍子，陈伯达并不是像江青、康生、戚本禹那样天生的棍子，而更像是一根橡皮棍。甚至在文革初期，他对于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背景并不知情，下令《红旗》始终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但他毕竟是棍子。仅是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整理发动文革的“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文化革命”名称的提出，就足以让他难以脱卸对文革的责任。何况他还与导致近3000人死亡的“冀东党”冤案难脱干系。陈伯达在晚年回忆中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提出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有是“随便接见一些人，偏听偏信，乱说瞎说，使一些同志受了难”。

在江青、林彪两大集团之间的危险平衡术，使陈伯达终究过早落水，却又在文革结束后成为他脱不去的干系。“两案”判决书中，让陈伯达在判刑中的次序引人注目地处在两个集团成员之间的“灰色地带”，承担了来自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责，却又面目不清。

文革结束后上书中央为陈伯达辩护的前同事王力，在书中称“文革头一年，我与他（陈伯达）朝夕相处，才知他品德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注12问题在于，陈伯达左右逢源的本领似乎并不高明。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文革之初回护刘少奇，王关戚挨整后疏远江青接近林彪集团，从个人得失上说都是败笔，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毛的对立面。

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其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评论陈伯达说：“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就陈的命运看来，说其性格懦弱易变比称其善于权谋更符合事实，这也是其子陈晓农的看法。

陈被打倒后，曾经集六顶帽子于一身，其中最重要的是叛徒、特务、托派，以及高饶反党集团分子。陈伯达曾于1930年代初在天津被捕，转押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判刑两年半，在狱中得了淋巴腺结核病（俗称“老鼠疮”），后经人营救保释出狱，出狱时曾签署悔过启事，此事在文革陈倒台后成为陈的“叛徒”罪状。陈本人辩称他出狱签署的只是一般的悔过启事，并非类似薄一波等人签署的“反共启事”。但毛泽东在对黄永胜检讨书上的批示，钦定了自己前任大秘的“叛徒”性质：

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

叛徒罪名后面紧跟着“特务”帽子，由于是“御赐”，直到文革后仍难以取消，却找不着上下级组织，成为一个“特务单干户”，类似于饶漱石的“单干反党分子”。

另外一顶帽子“托派”，则是源于陈伯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中山大学大批同学曾由于反王明、米夫被打成托派，陈因此扯上托派嫌疑。此外，解放初陈伯达陪同毛泽东访苏后回国，途径东北曾短暂停留，帮高岗修改文章。陈伯达倒台后，“高饶反党集团分子”这顶帽子也就顺便落在了头上。

1973年8月，中央通过决议，将陈伯达、林彪、叶群和隔离审查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李雪峰等人一起开除了党籍，但并未通知秦城中的诸人。文革结束后的中央特别刑

事法庭上，陈伯达进一步成为刑事罪犯。

对于自己的文革经历，被告席上的陈伯达似乎不堪回首，却无意中揭示出某种历史真实。他在审判员询问为何要违反法制指使将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时，答称：“当时呢，我是处在发疯的时刻，其实人是有发疯的时候，我是可能发疯了。”

在审讯他和谢富治罗织所谓“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冤案（中央文革试图利用一个天津卖煤球工人到外交部街道邮筒里投传单引发的案件，将刘、邓、陶、彭、罗、陆、杨、谭、安、薄等人全都牵连进去）时，陈伯达再次长叹：“这个发疯的人啊！发疯的人是会有的。我不能担保当时参加专案的人，没有发疯的人。”[注13]

实际上，作为“文革红人”或“疯子”的一面，掩盖了陈伯达的另一面。文革中反对“出身论”遇难的遇罗克，其思想资源即部分来自于陈伯达的讲话，陈曾两次与“联动”红卫兵辩论和在讲话中表示不同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为此险些被红卫兵揪斗。[注14]反对“老红卫兵”的出身论，体现了文革初期的复杂局面，以及陈伯达作为“文革左派”本身的复杂性。

另外则是前文所述的在八大决议中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被批判为塞进私货。文革中为“九大”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题阐述发展生产力，稿子被毛弃而不用，后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1963年，陈伯达提出，应当以电子技术为核心，发动中国新的工业革命。1968年1月29日，陈伯达再次给毛泽东等写信，提出应当大力发展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为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的半导体热做了铺垫。

甚至，陈伯达还可能推迟了文革的发生。王力回忆，1964年底，陈伯达得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23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有严厉批评刘少奇的内容，找到王力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两人商量后约请了彭真和陶铸分别去找毛当面检讨。虽然这最终没能挽回毛与刘的决裂，但实际上推迟了毛的摊牌时间。[注15]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在提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没有点陈伯达的名。身在秦城监狱的王力注意到这一细节，向中央写信指出“陈伯达的另一面”，共有八点，包括前述的诸情节，以及陈伯达在文革初期设法保护刘少奇等，建议假释陈伯达。但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政治气氛变化，陈伯达逐渐再次与“四人帮”捆绑在一起。

从一个富有旧文人色彩的知识分子，到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秘书；从文革之初“老干部出身的造反派”到秦城囚徒，以致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陈伯达的政治命运和评价殊堪回味。

注释：

注1　2012年8月30日采访何殿奎于北京寓所。另见《何殿奎：我在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载于《世纪》2009年5期。

注2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79页，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PDF。

注4　参见李锐《请吴冷西老友给个说法》原载《读书》1995年第1期。

注5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322-331页，PDF，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国史》第三卷，2008。

注6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第359-360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注7　师哲《我的一生》第499-50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8　2012年8月4日于木樨地采访李锐。

注9　2014年6月8日，采访于广州军区文化大厦。另参见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第7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注10　叶子龙《我给毛主席做秘书》，来自公安部网站“公安史话”栏目。

注11　此信流传于网络，收入港版《文革中的检讨书》，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版。毛泽东对邓小平此信有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注12　注15　《王力反思录》第173-174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PDF。

注13　王文正沈国凡著《共和国大审判》第24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版。

注14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第351页，红旗出版社，2010年3月第2版。■

（作者为作家、历史研究者，现任《凤凰周刊》主笔）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吴晗一家的命运

○ 吴 翠

一、吴晗夫妇一女一儿，皆为抱养，疼爱有加，吴晗为爱子小双正式起名为吴彰，以纪念他死于北伐的生死之交吴彰

舅父吴晗年轻时，毅然与身体状况不佳的袁震结为夫妻。以后两人相濡以沫地生活。舅妈不能生育，膝下无子，缺少家庭欢乐。1956年，康克清主动帮助他们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女孩，就是我的表妹小彦。小彦给家庭带来无比的欢乐，使小院充满生机。

小彦4岁时的一天，吴晗的秘书郭新华抱来一个几个月的男婴，舅妈不知所措。舅父满面笑容地注视着小家伙，对郭新华说：既然抱来了，那就留下吧。从此，小彦有了弟弟“小双”（小双是上幼儿园前的名子）。

添丁进口使舅父家热闹起来。舅父请了一位保姆康大娘。我那时住在西厢房的小间屋里，目睹了舅父哄孩子时的愉悦笑脸。舅父给孩子起名吴彰。听母亲讲，舅父就读之江大学预科时，有一位好友叫吴彰，他们都来自浙江义乌。两人一起读书习文，评论家乡和国家大事，结为生死之交。后吴彰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壮烈牺牲，舅父异常悲痛。为这个男孩取名吴彰，包含着对好友的无尽思念。

舅妈身体不好，常呆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写字画画，背诵古诗。舅父工作很忙，但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带两个孩子出去玩。我看到过小彦把爸爸当成马儿骑在他的背上，小双在前面牵“马”摔倒在地的欢乐场面。

几年后，中国也从大饥荒中熬了过来，人们看见了一线阳光。但是好景不长，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席卷全国，首当其冲的就是舅父吴晗。

1955年吴晗夫妇和爱女小彦

二、文革开始，吴晗是最早被揪出来的“三反分子”，夫人和孩子是最早的“反动分子”，举家蒙难

1965年11月，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运动很快由思想批判演变为肉体折磨。舅父经常被抓走游斗，回来时遍体鳞伤。在1966年5月一天，老师布置学生写批判吴晗的稿子，特别点名一定要小双写。他那幼小稚嫩的心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怎么会是坏蛋呢？小彦那时就读小学五年级，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委屈得不停地流泪。吴晗就把孩子搂到怀里轻轻地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姐弟两人从学校领回这样的特殊作业，常常由吴晗夫妇代为起草，再

由他们俩抄好后上交。他们还常常被孩子用石子砖块追着打，吓得他们两人躲在家里不敢上学。小双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今天依然心有余悸。

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前，吴晗经常被揪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红卫兵也闯入家中，在院子里批斗。有一次是夏天，在烈日下吴晗被绑在树上，一些人从脖子处往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有人则又揪头发又拧耳朵，想尽各种办法侮辱他。躲在角落里的姐弟两人早已吓得瑟瑟发抖。家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大标语。吴晗多年积攒收藏的珍本古籍被全部抄走，书稿和抄录的卡片也被视为黑材料，也一页不剩地抄走了。其中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同吴晗往来的书信。家里的东西被当作四旧砸烂，一些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以及电视机和吴晗珍藏的小彦从三岁起画的图画，也都付之一炬。一家日夜不得安宁，午夜后也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经常有人破门而入，把吴晗从床上拉起来批斗。小彦吓得蜷缩在床角处，小双躲到妈妈的怀里寻求庇护。

吴晗和一双儿女

三、小彦奋勇护卫父亲，其勇敢无畏震慑暴徒

小彦认定爸爸绝不是坏蛋。有一次在院子里，一群人让吴晗跪在地上，他们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殴打，小彦当时躲在海棠树上，忍无可忍，不顾一切从树上跳了下来，朝着正在踢吴晗的一个人猛踢了一脚，大喊："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着实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小彦突然爆发的行为，把这个人一下子惊呆了，便不再继续殴打吴晗。还有一次深更半夜，一阵咚咚的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人砸开大门，冲进院子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爸爸凄惨的叫声，从被窝里跳起，光着一双小脚丫就往屋外跑，到院子里一头扑到吴晗身上，用双手紧紧地搂着爸爸，不顾一切用身体卫护他。小彦的无畏震慑了对方。这一次吴晗被带去批斗了几天，没有再挨打。放回来时，吴晗虽然一身疲惫，但一进门就说："彦，爸这回没挨打，亏了有我女儿呀，爸没有白疼你。"

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勒令迁往北京永定门外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吴晗抓了几副碗筷，匆匆叠好仅有的几床被褥。舅妈重病在身，无可奈何。小彦急中生智，借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姐弟两人吃力地把东西搬上平板车，姐姐用力地拉，弟弟在后面推，在寒风中往返了几趟。当时姐弟俩一个12岁，一个8岁。

吴家搬到南郊成了永定门外居民区的新闻。围观的人群络绎不绝，舅父被迫站在阳台的凳子上，一天数次"请罪"。搬到城南的这座公寓里的还有万里家、张友渔家等，他们处境相似，互为邻居，也还能有个照应。到1967年秋天，吴晗等人被集中到市委党校，参加劳改队的劳动，筛炉渣，扫垃圾。每星期只许回家一次。吴晗到劳改队不久就被打受伤，旧创未好新伤又起，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打得口吐鲜血。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吴晗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小彦一见到伤痕累累的爸爸，一头扑到怀里。吴晗坐下后，小彦开始给爸爸敷药，还问：疼不疼。吴晗强装笑颜，摸着小彦的头安慰说："彦，没关系，爸一想起你，身上就不疼了。"也有正直善良的人默默地关怀着吴晗。一天下午吴晗一个人手握着锄头，吃力地在党校校园锄草。吴晗的学生肖松也是被"专

政”的对象，他悄悄走近，对吴晗说：“注意身体。”

四、母亲也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关进劳改队，两个孩子撑起苦难的家

舅妈袁震的抚慰也给了吴晗坚持下去的勇气。但没过多久袁震也被关进了劳改队。家中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个孩子。吴晗周六回家，才能让他们得到一点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这样的日子也没能过多久。小双记得，“1968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爸爸又该回家了，姐姐和我盼着爸爸回来，就趴在窗台上两眼紧盯着公共汽车站，一直等啊等，可是天黑了饭也凉了，仍不见爸爸的身影，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能见爸爸一面。”原来吴晗被关进了监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的苦难历程。小双还记得星期一爸爸临走时还嘱咐：“你们两人要好好照顾妈妈，等爸爸回来给你们一人讲一个故事”。但爸爸一去再也没有回来。送别成了永别。

吴晗入狱后，袁震把小彦和小双叫到跟前，对姐弟俩说出了一番锥心刺骨的话。小双回忆:“妈妈说，现在外面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你们俩人是国家的孩子，你们自小失去了亲生父母，我们是在替国家抚养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离开我们，去找一个安全些的地方……离开了我们，你们还能少挨一些打，少受一些罪……”姐弟俩心如刀绞，妈妈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讲出这样的话，她已经觉察到最危险的时刻就要来临。此时，姐弟俩已经泣不成声。

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实在气不过就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就因为说了这几句话，她也被送进了“劳改队”。住在一个破旧的浴池里，舅妈袁震本来长期有病，体质极为虚弱，即使在热天还要穿着棉袍。她在劳改队里艰难地熬过了一个酷暑和一个严冬，双腿瘫痪了，得不到最起码的救治。14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30多里去护理妈妈。“劳改队”见舅妈病得太严重了，留在那里已经成为负担，才允许她回家。

吴家没有了正常的经济收入，小彦挑起了生活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家人的衣食。饥寒交迫使得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成了一对流浪儿。一天，小双路过一家饺子店，锅贴诱人的香气吸引住了他的脚步，他忍不住排到了买饺子锅贴的队伍里。小双用手摸摸口袋，只有几枚硬币，这哪里够买水饺啊！他灵机一动，对排在前面买到锅贴的中年人说：“叔叔，我能买你三个锅贴吗?”那人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句话也没说随即分了几个给他。孩子顽强的求生本领，就是在这样血和泪中锻炼出来的！

五、母亲被释放回家，同楼居住的万里同志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

袁震被“劳改队”释放回家是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小双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里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让他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的最后晚餐。当天夜里，袁震昏迷，被姐弟俩抬进了医院。18日清晨，袁震苏醒过来。小彦关切地问：“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吃力地微微动了动嘴唇说道：“彦，我想喝口稀饭。”小双去向医生哀求，但被医生拒绝了。小双到处去找稀粥也没有找到，当他失望地走回病房时，医生通知说，妈妈已经死了。小彦带着弟弟到太平间去给妈妈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枯干的面颊上还挂着几滴未干的泪珠。姐弟俩趴在妈妈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小彦的脑子开始不断出现幻觉。

住在同一栋居民楼里的旧市委领导，看到姐弟俩孤苦伶仃，就向市委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专案部门把康大娘找了回来。虽然只有短短数月时间，康大娘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却给姐弟俩带来了人间的温暖。时隔不久，随着运动深入，康大娘又被打发回了农村。

六、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小彦鼓起勇气问，“爸爸给我们留了话或留下什么东西吗？专案人员回身拿出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的几支香烟，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

爸爸成了苦命的孩子唯一的亲人了。1969

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敲吴家的门，说要接两个孩子去看爸爸。两人在心中燃起了希望，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他俩看到来接人的汽车是医院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姐弟二人被领进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嚎啕大哭起来。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专案组人员喝斥道："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拿到手里的仅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下的几支香烟，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两个孤儿一路哭着回到家。姐弟俩只能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们把爸爸的遗物供奉在妈妈的遗像下面，默默地追思已经失去的两位亲人，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放着姐弟俩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后来又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约了两个同学，一同把袁震的遗骨埋在西山八大处。此后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西山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

七、小彦为父母之死讨要说法，反被诬为"无理取闹""扰乱社会治安"，被拘留，被侮辱，终被逼疯。在弟弟小双年满18周岁那天服毒自尽

1973年6月，小彦的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审查结论、遗骨和被抄走的书籍，她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她还曾只身闯入市革委会某领导人家，想要对父母亲的死讨个说法，被指责为无理取闹，放肆。小彦实在忍无可忍，奋力反击。很快，小彦就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关进公安分局拘留所。拘留中，她被侮辱，拳打脚踢，她最终经受不住惨无人道的凌辱和折磨，被逼疯了，送进了精神病院。

1975年秋，小彦因为和好友议论过"四人帮"，被抓进了公安局。被抓走的那一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开的住院通知书。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沉重的脚镣，她的阑尾炎时时疼痛难忍，狱警就给片止痛药吃；疼痛折磨得她不断地哭泣，管理人员不耐烦就给她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大间牢房里，经常对她严刑拷打。她的两颗门牙被打掉，额头上被打开深见骨头的大口子，姣好的面容完全破了相。小彦悲愤至极，痛不欲生。她被又一次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监禁她的人仍然不放过她，甚至非法追到医院继续审讯她。在医院一再要求下，小彦被暂时释放回家养病，但是她终因被折磨得身心俱残，彻底地绝望了。一天，小彦似乎显得神智十分清醒。她把小双叫到跟前，对弟弟说：我替爸妈把你拉扯长大，今天你18岁，你终于成年，我可以去见爸妈了。小双听了满头雾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姐姐又在说疯话。不料，这回却是真的，小彦就在弟弟满18岁那一天，饮下毒药自杀身亡。

小双万万想不到，姐姐会抛下自己匆匆地走了。最后那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也坍塌了。他孤独凄怆，只身流落在人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结束了在农场的劳动回到北京，前去探望舅父吴晗的家时，家早已经空空荡荡，四口之家只剩下小双一人，空守着三个骨灰盒，过着凄凉的生活。小双为了谋生，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当过泥瓦工。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北风凛冽的严冬，他一面做工，一面复习准备高考。厂里的工人师傅还比较照顾小双，朴实的工人师傅常常问寒问暖，送吃送喝。这给小双带来温暖。

终于，他熬到文革终结。他不追求享受养父被平反之后的"光环"，决定到美国留学，开创自己新生活的一片天地。

他从一无所有开始打拼，变得独立，务实。他打过工，洗过碗，边勤工俭学，边完成了理工科硕士学位，让天堂的父母为小双的成功感到自豪。■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我与许家屯二三事

○ 董 健

许家屯

按说我与许家屯先生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恐怕我的名字他也早就忘记了。那时他是江苏的“土皇帝”，而我不过是他治下的一介书生，而且又是草民之中的第九等——属于所谓“臭老九”阶层。然而我确实有几件事与他有些瓜葛，今天看来，还是蛮有讽喻意味的呢。

说他是“土皇帝”，第一因为江苏有几位共产党的老领导如刘顺元、惠裕宇等曾进京向中央告他在江苏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颇有些“土皇帝”的做派，而且敝人还与此案有些关系。第二，他被几位老革命拉下马以后去香港主持新华分社，曾有人说他“土”，一不通英语，二不懂粤语，怕他打不开局面。第三，他的名字土，你听：“许家屯”，叫人想起一个小小的村庄。我的家乡就有不少叫××屯的小村子，大都很土。记得上大学时，大抵是1950年代末吧，毛主席视察江苏，夸许家屯在省委书记中“是最年轻的”，叫他“娃娃书记”，也曾笑着说：“许家屯，像个村庄的名字。”

不过，许家屯毕竟是有文化的人，而且也早已反“土”为“洋”了。看他在香港几年的政绩以及1989年之后在国外颇为开放的言论，与当年的江苏“土皇帝”真是判若两人。我与他的二三事中他的一些做法，我想他自己现在也会不以为然的。但中国人健忘，还会有另一些人至今仍然以我们早已不以为然的事为然。钱理群大声呼吁“拒绝遗忘”，我想他是对的。所以我要把一些“陈谷子烂芝麻”拿到阳光下晒一晒。诚然，数落一位失势的老人是很无聊的，但我只想写出“当时环境”下的某种况味，读者自会从中得出教训，与今天的许家屯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首先要说的是我曾受过许家屯的赏识。沙叶新批评没有出息的文化人“以被赏识为荣”，我就有这种毛病。那是文革后期，评论《水浒》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那时许家屯早已从文革初被“打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了领导的“宝座”上。他叫省委的刊物《群众》紧跟“评水”运动，于是编辑约我写稿。我是个“跟跟派”，是一个被建国后的教育尤其是文革政治弄得奴性十足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受宠若惊。对“评水”的政治阴谋一无所知，文章只能是跟着“上边”的调子唱。但文章发表后，编辑告诉我：“你这篇文章是由许家屯同志亲自审定的，他很赞赏。”我当时确实曾有一种“受赏识”的愉快，眼睛都亮了起来——一个奴在心的文化人，再也没有什么比受赏识尤其是受大官的赏识更让他动心的了。十多年后，当我对自己的奴性开始有些反省时，重读这篇“评水”之文，真是汗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我的论文集《文学与历史》时，我曾将此文与另外几篇吹捧“样板戏”的文章作为附录编在书中，但编辑给删除了。

文革结束，许多在文革中“红”过的人都倒了霉，但许家屯的官做得更稳了。他在文革初是被当作“走资派”受过冲击的，现在轮到他来冲击那些冲击过他的人了。江苏文艺界能与“四人帮”

挂得上钩的事，当首推小说、戏剧、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因为这部作品确确实实紧密配合了“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影响颇大。但这部作品是许家屯亲自抓出来的，一批就会弄到自己头上，成了他“批邓”的罪证。于是他来了一个金蝉脱壳计，拿一位青年作者开刀了。这位青年作者写过一部描写“与走资派斗争”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正是许家屯治下的宣传部门鼓励作者写了这部小说，出版后曾热情肯定，赞赏有加，作为自己的“政绩”很是宣传过一阵子，但如今一翻脸就狠揭猛批起来。我曾亲临文艺界的揭批大会，那气氛与文革无异。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我，被这做法惊得目瞪口呆，我幼稚的心灵在颤抖。一个共产党的官，怎么这样不诚实呢？原来满口“实事求是”的人恰是最不实事求是的，这叫作“缺什么吆喝什么”。我一气之下，带着对党的信任之感，写成一篇短文，为那位素不相识的做了替死鬼的作者鸣冤叫屈，题目叫：《不能这样对待青年作者》。《钟山》的编辑汤淑敏女士凭着一股子正义感，当即编发此文，决定以显要位置叫它与读者见面。但她的顶头上司不放心，觉得这样的文章不叫许家屯过目是不行的。于是送审，文章被“毙”了，但稿酬照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一篇未发表文章的稿酬。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先枪毙再发抚恤费”的待遇呢？听说与许家屯有关。他看了我的文章后有一个批示，大意是说：此文写得很好，但考虑到目前江苏工作的困难，一切应以稳定为重，建议此文暂缓发表。你看这批示写得多么圆熟，砍一刀都不留疤痕。当我拿到这笔稿酬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似是受辱，又似是受贿，心中还有些莫名的恐惧感。为了权势者的“稳定”，可以颠倒黑白，可以制造谎言，可以伪造历史，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然而此事发生不久，又一件事使我幼稚的灵魂战抖得更加剧烈，简直可以说是流血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夕，南京的学生、工人就先闹起来了。他们贴出大标语，讨伐“四人帮”，实际上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表示强烈的怨怒。那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带着冲天的豪情和正气，带着一路的歌声、口号声，从南京大学一直游到雨花台。队伍前头走着一位青年——南京大学团委书记李西宁。北京大镇压，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江苏的许家屯当然也奉命镇压，李西宁被许家屯下令逮捕，投入狱中。李西宁是一名共产党员，品学兼优，在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因为喜欢文学，与我有些交往。不久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李西宁被放了出来。马上要在五台山体育馆召开大会，欢迎与表彰他们这些敢于面对专制捍卫真理的英雄们。一天，李西宁到我家，面带忧郁感伤之气，说许家屯派人找他谈话，要他在五台山大会上多讲省委的“好话”。如在狱中如何受到“保护”“关心”等等。他很沉痛地说：“董老师，在狱中他们打我，饿我，生了病都不给看，比在电影里看到的国民党的监狱还可怕，叫我怎么说他们的‘好话’啊？”李西宁是条汉子，别看他白净的脸上流露着书生稚气，但他的脊梁骨是硬的。他硬是不听那一套妄图遮人耳目、控制舆论的“政治交代”，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痛斥“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只字未提那莫须有的什么“保护”“关心”。不用说，气坏了许皇帝。“抓你是我，放你是我，总是我对，应感激我”——这就是权势者的逻辑。不信这个逻辑，就给你颜色看。当时许家屯就叫媒体对李西宁的宣传大大“降格”，照片不准见报等等。正直、纯洁而又有着很高的政治热情的李西宁，从此再也焕发不起政治热情来了。许家屯身上那种政治虚伪性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出国进修，钻研自然科学，学成后再也没有回来。我也从此觉得党派政治中陷阱太多、谎言太多。近读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对其中对政治斗争之阴暗面的批判颇有同感。他说，政治斗争有时会把人身上的坏东西如说谎、诽谤、虚伪、残忍等“唤起”来。美国学者奥威尔（George Orwell）也说过类似的话：某些人的政治“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如果李西宁照许家屯的意旨在五台山大会上撒谎，在不了解真情的人听来不是很像真话吗？许家屯对那位青年作者的“谋杀”以及建国以来我们对诸如胡风、储安平、遇罗克等思想者的“谋杀”，曾经是多么冠冕堂皇，像是“正派行径”啊！

李西宁事件之后两三年，我的老师陈中凡先生去世，追悼会规格很高，有省里的领导出面。

开始之前，许家屯来到贵宾接待室。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同志介绍我和许家屯握手时说：“许书记对你起草的悼词亲自过目，很满意。”这是我第一次与许握手，在他恐怕也是第一次把“董健”这个名字与“其人”联系起来，所以他很是看了我一眼。但我再也没有7年前“评水”那一次受他“赏识”的愉快了。这不仅因为此时我已经知道了那次“评水”的政治欺骗性，而且还因为我想起了那个做了政治斗争牺牲品的青年作者，想起了我那篇没有发表而拿了稿费的文章，想起了李西宁那张对政治失望的忧郁感伤的脸。

就在我与许家屯第一次握手的1982年，他关于“封杀”江苏“四条汉子”的命令便秘密下达了。事情还得从许家屯下令“围剿”作家顾尔镡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文艺界很活跃。顾尔镡一马当先，指斥文坛弊端，思想解放，敢闯禁区。他的言论被人“汇报”上去，总书记胡耀邦作了一个关于顾尔镡言论有政治错误的批示，于是引发了江苏对顾的“围剿”。我是被命令参与此次“围剿”的，亲眼目睹了许多“好戏”——各种人的表演。那些对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心怀不满或对顾尔镡个人抱有成见的人，都大打出手。没想到正当他们“战犹酣”的时候，一瓢冷水泼了下来。胡耀邦在听了一些同志反映的真实情况后，尊重事实，顺乎民心，收回成命，极“左”派认为的“铁定”之案被平反了。听了这新精神，我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记得高晓声拉着我立即跑到顾尔镡家去报告好消息。许多被迫参加“围剿”而又一直无话可说、硬找话说、左右闪烁、言不及义的人，这时感到十分畅快。少数几个批顾“英雄”大放厥词，攻击总书记“出尔反尔”；我们则说这样实事求是的总书记真是难得。这时就冒出了江苏“四条汉子”的问题。这不过是个比喻，指的是南京大学教授包忠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甘竞存、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还有一位就是敝人。我们四人经常在一些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或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抨击极“左”思潮的言论，尤其是在此次“围剿”顾尔镡的斗争中又有抵触情绪，偶尔还冒出几句犯上不恭之论。有人把我们的言论向许家屯打了“小报告”，许家屯便内部下达了一个所谓“四人三不准”的指示，就是我们四个人一不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不准在文艺界的各种聚会上露面，三不准在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中出现，一句话，在媒体上全面“封杀”。好在许皇帝只能治江苏，我们的文章还能在外省或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著名剧作家、文坛老将陈白尘听了这事之后说：“许家屯是有名的‘许三版’——常常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整整三版的大文章。当年不让在江苏排演我的《大风歌》，就是这位‘许三版一版定’的，如今又‘版定’你们四人‘三不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怕。”

直到许家屯被调香港，“四人三不准”的禁令才被取消。江苏的老领导刘顺元、惠裕宇等进京告许家屯，材料中曾提到他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意剥夺“江苏四位批评家”的发言权。许家屯在江苏待不下去了，却得了一个主持香港新华分社的美差。“土皇帝”的一套在香港当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很快就反“土”为“洋”了。看他在海外发表的言论，他是拥护改革开放、拥护邓小平的，这当然很好。我自然也不计前嫌，暗起敬意。1992年春，我赴美访学，路过洛杉矶，有人告诉我：“许家屯就住在星云大师的庙里，你如去访他，说不定他会请你吃一顿素餐呢。”我真想去看看我当年的“许书记”，说几句心里话。我一向认为，脱了乌纱帽的官就有心里话可说。如果就着素餐，远离政治利害，冷冷静静地说说那发生在1975年至1983年间的他与我的二三事，那将是很有意思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副校长）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购买。

淘　宝　网：http://yhcqwd.taobao.com/

支付宝账号：13611159388

微　信　号：yhcqwx

邮政汇款：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政编码：102488

联系人：崔秀岭　　电话：010—60342528

手　机：13611159388

“书生作史”：文坛“掌门人”的反思

○ 刘 伟

1989年7月，周扬逝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周扬的评论一片沉寂。以至1996年3月2日张光年给荒煤写信，提及“周兄走后，我辈都未写文”。面对张光年“我辈无文章”的喟叹，荒煤在3月10日的回信中写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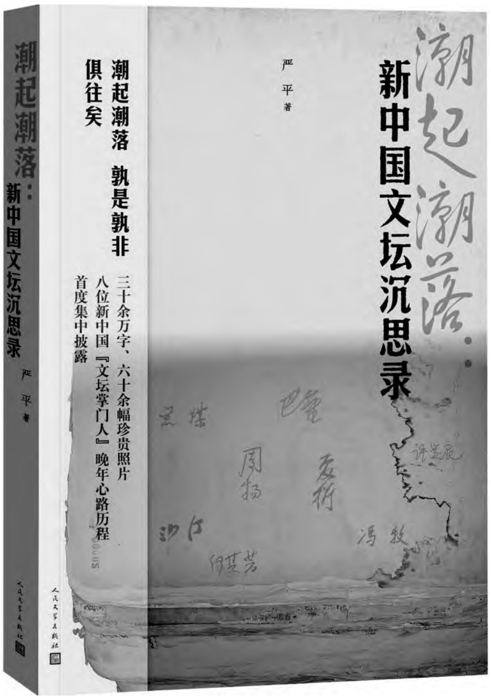
谈周扬，也有好几位同志劝我谈。我觉很难谈。因他对我，真正叫做“领导”。只谈工作，从不谈心。

恐怕连荒煤都想不到的是，20年后他的秘书兼助手严平不仅著书《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谈”了周扬，更是连同荒煤在内写了他们那一代文坛“掌门人”的尘封往事。书中真切描写了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这八位新中国文坛“掌门人”的人生沉浮，以及背后所隐藏着的新中国文坛前30余年的波谲云诡、气象万千，写出了他们在喧嚣的历史长河中的痛苦与孤独。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紧紧抓取第四次“文代会”这一重要历史节点，结合自身亲历与多方考证真实呈现了他们晚年的忏悔与反思，堪称一部现代知识分子灵魂裂变、升华的心灵史。

一、“身边人”的“温度”书写

1978年春，严平从武汉军区转业来到社科院文学所。最初分配在文学所图书馆工作。几个月后，沙汀、荒煤来到文学所担任正副所长。机缘巧合，初来乍到的严平成为了副所长荒煤的秘书。后来，荒煤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严平继续留在文学所，直至退休。身在文学所严平仍继续担任荒煤的学术助手，直至他离世。

因此，严平与周扬等这些昔日文坛“掌门人”都有过交往，因此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真实史料，书中鲜为人知的史实随处可见，很多更是首度披露。比如周扬对自己“十七年”中所犯错误



的概括、夏衍等人围坐一团关于“三十年代”的率真聊天、荒煤在长安街发出的那声长叹、晚年巴金与女儿李小林的沉重对谈等等。这些点滴细节，极大改变了我们对原有历史的模糊认知。

这本书更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记忆与现有史料里面，而是花费很大气力循着记忆的线索多方求索，寻找佐证，力图真实客观还原他们的人生轨迹，尝试走入他们的内心。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个曾经亲历历史的人对昨天的探寻和研究。”因此，最终呈现的这八位人物是与既有的“定论”不一样的。尤其是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诸篇，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这八人当中，何其芳其人尤其引人深思，何其芳的人生近乎诗一样：1938年秋天到延安，很快融入到那火热的生活中，并最终成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典型”。从此，写《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的

诗人何其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忠诚于领袖的党的文艺理论家。文革中被下放劳改，养猪也是兢兢业业、极其认真。文革结束不久他就去世了，这让他的一生更加充满了问号。

八位文坛“掌门人”，何其芳是作者唯一没有见过的一位。因此，在写这一人物时，作者丧失了“身边人”的优势。作者通过与社科院文学所的老人的一次次的聊天与访谈，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是仍存在诸多的不解与疑惑。于是，作者从“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入手写这个谜一样的人物。书中写出了何其芳的“柳树的性格”，写出了他对领袖的终其一生的崇拜与追随，更通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呈现了何其芳的深藏于内的柔软心绪与诗人性情。

那是在何其芳去世后，荒煤写了怀念何其芳的纪念文章。有一天，作为秘书的严平收拆寄给荒煤的来信，无意间读到了一位与何其芳有较长时间交往的女性写给荒煤的几封信。她因读了荒煤的文章，泪流满面，信中提及她与何其芳在1949年后长达十几年的交往。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故事中的何其芳的形象是久违的，是与人们印象中的何其芳反差巨大的。作者小心翼翼地写出了这段“青春的故事”，因为这段往事是何其芳不愿让人提及的，但这段故事中的何其芳却恰恰才是真实的自己。“他们一起谈诗，谈论写作；一起划船，一起散步，一起坐在公园参天的古树旁看蓝天上静静飘着的云朵……她说，何其芳为她写作的第一首诗是《有一只燕子遇到了风雨》，还有《听歌》——那两首诗几乎是何其芳五六十年代唯一的不为时事写作的抒情之作。”《有一只燕子遇到了风雨》中有我们不常看到的“忧伤”的何其芳：

有一个人是这样忧伤
好像谁带走了他的希望
是什么歌声这样快乐
好像从天空降落到他的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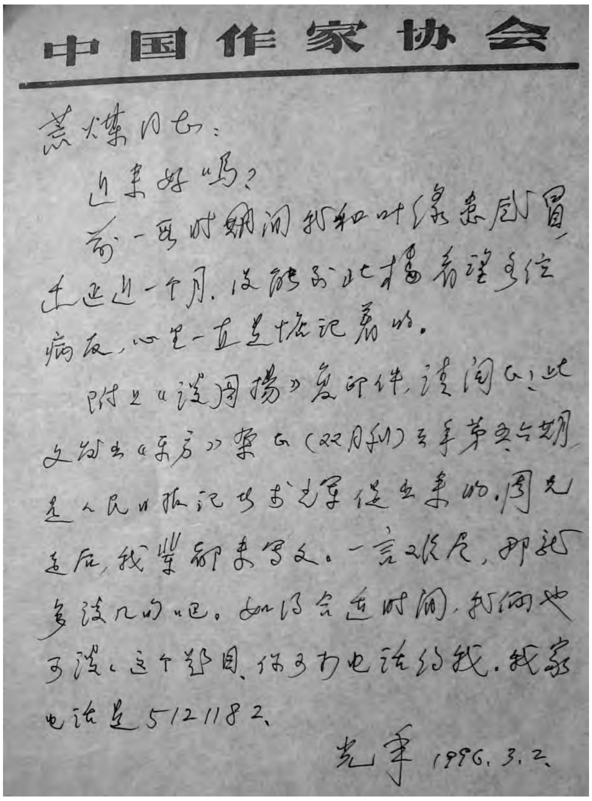
《听歌》则写出了“青春”热烈的何其芳：“呵，它是这样迷人/这不是音乐，这是生命！/这该不是梦中所见/而是青春的血液在奔腾！”这样的何其芳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

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人物的侧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让我们最大可能地逼近书中的这些人物。正如历史是立体的，身处历史中的人也是多面的。他们并非非黑即白，他们身上有着太多谜题，有太多的不可理解，这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魅力所在。因此书中的人物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满温度的普通人。

二、生命的悖论：“书生作吏”

书中写到的这八个人物，在上世纪30年代都是不折不扣的书生，他们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等，大多曾名噪一时。巴金的《家》、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至今仍是传世的经典作品。后来他们参加革命，有的人还去过延安（1937年9月，周扬奔赴延安。一年后，荒煤、沙汀、何其芳等人也陆续到达延安），经历了延安“抢救运动”的洗礼，逐渐开始褪去青春的色彩，变得成熟老练，身上多了更多的色调。

作为左翼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领导岗位，在文化部、作协、社科院文学所等成为了“当权者”。被时代所裹挟，不论他们


中国作家协会

荒煤同志：
近来好吗？
前一段时期间我和叶绿患感冒
住院近一个月，没能到北楼看望多位
病友，心里一直是惦记着的。
附上《谈周扬》复印件，请阅。此
文刊出《东方》杂志（双月刊）今年第六期
是人民日报记者据电话记录出来的。周逝
世后，我本想来写文。一言难尽，那就
多谈几句吧。如得合适时间，我们也
可谈谈这个题目，你可打电话约我。我家
电话是5121182。
光年 1996.3.2

张光年致陈荒煤信的影印件

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走上了一条近乎相同的道路，承受了共同的荣辱沉浮。但这并非他们的初衷，因为他们原本性格不一，更多时候是出于对党的忠诚与服从，才毅然决然地承担了历史的重担。在漫长的“作吏”生涯中，他们一方面努力履行着自身的职责，另一方面却为无法继续创作而苦恼不已。有一次周总理问起荒煤的年龄，荒煤脱口而出：年过半百一事无成。

“书生作吏从朱墨，官事纷纷何日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的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他们来到了生命的末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真诚反思过去。巴金写出了《随想录》，夏衍创作了《懒寻旧梦录》，周扬真诚地向过去道歉忏悔，并与夏衍、荒煤、冯牧等人极力保护电影《太阳和人》，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荒煤写《阿诗玛，你在哪里？》为演员杨丽坤平反作出了努力。沙汀、许觉民、冯牧等人也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为新时期文坛发展保驾护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正遗产。

然而，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却也是悲剧的一代。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下长大的一代人，都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满怀着热情奔向革命，孰料却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被侵蚀得遍体鳞伤，最后留给他们的是衰弱的病躯与痛苦的灵魂，甚至还有后人的误解与苛责。

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写出了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文人的生命悖论。透过重重历史迷雾向我们再度诠释了“书生作吏”这一历久弥新的主题，写出了这八位“掌门人”内心的痛苦与纠结，更呈现了历史一步步走来的艰辛与曲折。

三、拒绝遗忘

书中的八人，命运近乎相同，但是在针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上的态度却有这样那样细微的差异，尤其是关于文革和“三十年代”问题。

何其芳因文革结束不久就离世，因此我们无法看到他对文革的反思。周扬、夏衍、荒煤、冯牧等人对他们文革中的个人经历很少提及，讳莫如深。

1978年，美籍华人赵浩生采访周扬，当问及文革受迫害的心情时，周扬说：“一个人不管有怎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他就预料到在革命进程中会遭受挫折，他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他就不配谈革命。我在文化革命中所受的种种迫害，我经常这样想，比起一些对革命的贡献更大的同志来，我所受的迫害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这是真话。有些同志对革命贡献很大，他也受了迫害。这样一想，我就很平静。”

这是一种解读。相比那些在十年浩劫中惨死的人，他们的确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有时，甚至还怀着一份感激。1975年，毛泽东亲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于是，周扬结束了长达九年的牢狱之灾。出来后，周扬对他的儿子说：多亏了毛主席。但被反问：是谁把你关起来的？周扬却沉默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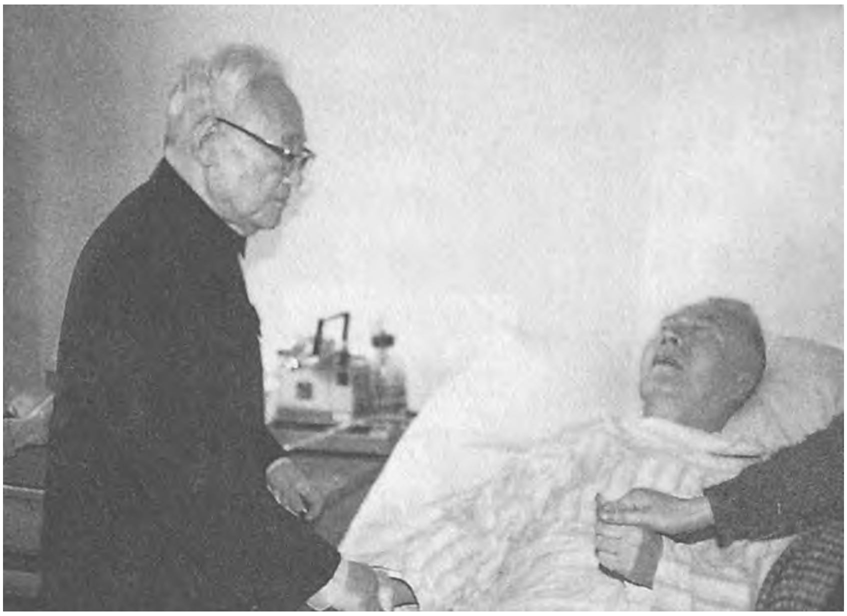
张光年在《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中有过一段精辟的文字，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解释：“‘文革’初期那几年，我们这些由老干部、老教师、老文化人（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组成的‘黑帮们’，日日夜夜过的是什么日子？身受者不堪回忆。年轻人略有所闻。我此刻不愿提起。但愿给少不更事的‘红卫兵’留点脸面，给‘革命群众’留点脸面，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吧。”

对此，巴金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他不仅写出了《随想录》，还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被后人赞誉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良心”。

和巴金一样的还有许觉民，他在晚年也写了大量的文章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沙汀，更多的考虑是抓住最后的时光写出更多的作品，正如三四十年代他离开延安困顿在雎水关一样。

同样的不一致，还表现在如何处理“三十年代”这一问题。

夏衍和沙汀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沙汀认为这一事情“关系重大”（沙汀致荒煤信），夏衍更是写出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表达对冯雪峰1966年所写材料的不满，而且针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中的诸多问题写下了自己的亲历文字。尽管事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他的初衷是美好的，那便是谁也不能抹煞他们（周扬、夏衍、沙汀等人）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中做出的


1985年，巴金看望病重的周扬，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工作。历史需要原原本本地呈现，左翼文艺除却鲁迅、冯雪峰一派，还有周扬、夏衍、沙汀等一干人的努力与奉献。

相反的，周扬在这一问题再一次表现了他一贯的成熟与复杂，他同意自己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文章和茅盾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起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却不愿夏衍的回应文章发表，为的是文艺界的团结。与周扬不同的，荒煤起初不愿发表茅盾的文章及冯雪峰的材料，担心引起争议。后来的事实果真证实了他的担心，但在夏衍文章是否发表一事上他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决绝，他没有听从周扬的事先招呼，一力促使夏衍的文章在《文学评论》上刊发。原因很简单，在这一问题上他是有心结的，他就是因为三十年代写过豆腐块大的文章被定性为“对抗鲁迅”，成为他文革中被批判打倒的三大罪状之一。

拒绝遗忘，呈现历史的多棱与立体，这是本书的一大写作原则。在很多历史事件上，本书作者不是要给出我们答案，而是尽可能多地提供历史的细节，供后人探寻，以期最大可能地逼近历史的本相。

四、不虚美，不隐恶

书中的八位人物，因其举足轻重的文坛地位，他们都与新中国文坛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因此，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有很多的谜团待解，也颇有争议，其中尤以周扬为甚。书中花费了很大的笔墨写周扬这一人物，因为他是左翼文坛的“领导者”，他是新中国文坛的“文艺沙皇”，他是伤害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罪人”，他是文革后真诚忏悔的“觉醒者”。他是新中国文坛前30余年风起云涌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是若干重大运动的领导者。作者写周扬，有出于“同情之理解”，也有淋漓尽致的揭露，秉笔直书，尽可能挖掘周扬坚硬外表下的柔弱内核。

书中写周扬，重点写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十年代、延安时期、1964年文化部“整风”、文革后。每个阶段用力不一，着墨不同，对周扬的是非功过不粉饰、不避讳。三十年代的周扬是鲜明真实的，夏衍记忆中的周扬是这样的：“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这是周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潇洒”时光。后来的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让人捉摸不透，就连他身边的人也很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正像荒煤所言他“只谈工作，从不谈心”。

身处延安时期和文化部整风运动中的周扬，俨然变成了政治的化身。书中写到延安抢救运动，周扬在大会上宣布：一定要把抢救运动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个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鲁艺全是特务，就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我也能战胜你们！

1964年文化部整风，周扬为了紧跟领袖的意志，完全不顾他和夏衍、荒煤等人的情谊，甚至一直瞒着他们，以致被蒙在鼓里的夏衍气得破口大骂周扬。身处历史漩涡中的周扬，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在大的历史风潮中他能做的却也微乎其微。书中写到一个细节:1965年初，荒煤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调往重庆做副市长。周扬在自己家里与荒煤面对面谈话，谈话临近结束两人要分别时周扬突然起身握着荒煤的手，说道：“你这一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给当时情绪低落的荒煤留下了很深

茨威格、罗曼·罗兰和纪德的莫斯科行

○ 雷 颐

茨威格、罗曼·罗兰和纪德分别在1928、1935和1936年到苏联访问，回来后写了或简或详的访问记，有的当时未公开发表，有的当时就公开发表。今天边读他们当年的闻见观感，一边回想这半个多世纪的潮起潮落、风雨苍黄，使人不胜今昔之慨；他们的态度、意见和观点，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一

1928年夏，茨威格收到一封邀请信，要他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列夫·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生性谨慎的他这次却没有丝毫犹疑，立即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早已想去但又一直感到不便去的俄罗斯。

之所以感到不便，是因为茨威格对政治一向厌恶，而到经过十月革命的苏俄访问，本身就会被政治所“利用”。“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魅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赞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2年中译本第362页）因此，十月革命后许多欧洲作家都曾抱此心态访俄，想一窥虚实，但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丧，使人真伪难辨。茨威格当然也想前往考察，亲睹这个“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对其作出自己的结论。而且，他的不少作品早已被译为俄文，有许多俄国读者，所以更想访俄。不过，之所以一直犹疑不决、久未成行，是因为“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他是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决不想轻易作

的印象，或许这是周扬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跟他“谈心”。

文革后，晚年的周扬逐渐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开始为过去的荒唐行径忏悔。严平亲眼看到了周扬真诚的泪水。

在一次大会上，周扬讲话时又向被整错了的人表示道歉。这时，突然有人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大声质问，会场上很静，接着就有人应和，又一个人走过去声嘶力竭地责问……那时，我恰好就坐在前面，虽然童年的“文革”时代早已见识过种种大场面，也堪称经风雨见世面，但此时还是为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大场合中，有人站起来大声喊叫而感到吃惊。我紧张地望向周扬，清楚地看到他流泪了，他那一向从容而带些严厉的目光，在那时透露出很深的痛苦和自责，他又说了些话，意思大概是同志们所受到的委屈和伤害，我的道歉说多少都无济于事，但我必须道歉，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时期文坛出现纷争时，周扬更是多次在自己家中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努力地团结各方力量；面对可能出现的政治批判，他更是自觉出面保护影片《太阳和人》，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可谓是用心良苦。至于后来周扬在批判中倒下，以致一病不起最终离世，则是为他的充满争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苍凉的句号。

往事并非如烟，书中的人物早已成为了历史，最终留在了过去的时空。但是，他们不会被后人忘记。真诚地面对他们，面对他们背后的那段潮起潮落的历史，反思并从中汲取力量，正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最大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政治性表态，“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第363页）但这次是为纪念信仰非暴力哲学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却可使他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

在俄国，他度过了一个活动紧接一个活动，非常紧张的14天。每天都是参观、集会、演讲、访问、会见、交谈、饮宴……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是热火朝天、改天换地，不能不使人激动的场景。所接触的各种人物也是豪情满怀、朝气蓬勃，相信自己正在成为“新人”，对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正在进行的新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氛围，使茨威格深受感染。但多看之后，他又不免心生疑虑：“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怠惰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第368页）他承认，许多来访作家由于受到几乎是空前的欢迎，感到自己真正被这里的广大群众所爱戴，会不由自主地对这个新政权大唱赞歌，“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第372页）

但是，“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第373页）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参加大学生的庆祝会后，他被那些热情洋溢、容光焕发的大学生们团团围住，通过翻译热烈交谈，其中一些人还一直兴致勃勃地陪他走回旅馆，继续谈话。当这些学生走后，房内只有茨威格一人独处，在脱衣时他突然发现上衣口袋中有一封匿名信，一定是有人在与他拥抱或趁人拥挤的时候悄悄塞进了这封信。信中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话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接着，信中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和细节。最后，要求他一定将此信烧掉：“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第373页）读完此信，茨威格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开始深省，并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感到事实真相的复杂性超出想像，难以判断，所以回国后他只写了几篇简单的见闻，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访俄归来很快就出书对苏俄作出或是热情赞美或是激烈否定的判断。他感到，自己“这样的保留态度很好，因为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第374页）

《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1940年，这时斯大林残酷的“大清洗”及这一体制的种种严重弊端已广为外界所知。但我们看到，与不少人相比，他的赞扬虽有相当保留，不过从来嫉恶如仇、正义感极强、极富同情心、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茨威格在谈到苏联时仍非常谨慎，欲言又止，更未对各种罪恶进行激烈的谴责或作态度鲜明的评判。这种态度本身，适足引人深思。

二

罗曼·罗兰于1935年6－7月对莫斯科作了为时一月的访问，他的《莫斯科日记》对这次访问的经过和观感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在日记中，他对苏联作了热烈的赞扬，同时又对一些现像表示了深深的疑虑。值得玩味的是，他对自己产生这些疑虑似乎又有种负疚感，总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释一番，以消除疑虑。

如他虽然称颂斯大林，但对那种过分的个人崇拜又反感之至。在参加了6月30日的盛大游行后，他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以及像罗马皇帝一样花了6个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浮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第33页）然而稍后他又认为这是人们“高

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证明这一点的是类似6月30日盛大庆祝游行那样的、显示人民强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游行……倒不如假定，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第110页）但斯大林对这种个人崇拜不仅不制止而且还非常高兴的态度，对罗曼·罗兰来说又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他猜测可能是这个"现实主义者–格鲁吉亚人心想：'让他们夸吧，只要他们做我希望做的事！'"（第128页）

当他得知有些青年仅仅因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就被剥夺了上大学或进工厂的权利时极为气愤，并向高尔基提出意见，盼其能做些工作改变这种政策。然而这不仅使高尔基感到为难和窘迫，反而竭力为这种政策辩护，使罗曼·罗兰大为不满。对农民在"集体化"中的悲惨遭遇他深深同情，对滥杀无辜和种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他更感难以接受……但后来，他居然全都想通了，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在国内还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国外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所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然存在。"（第114页）"这是常备不懈的警惕性的原因所在，这种警惕性有时使日常生活败兴，有时粗暴地匆匆把嫌疑者当作已经定罪的罪犯。还有其他许多不公正的表现，包括把不信任转移到儿童身上，而这种不信任或许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根据出身所属的阶级所应得的……因此，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但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虽然连布哈林都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仍坚持这种说法，以便证明我们的苏联共产党人朋友们的无辜，也因为这是有些人咬定不承认的实情。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第115页）这些"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一类的文字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栗。很难想像，这些文字是出自《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灵魂》、《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这些满怀博爱精神之作作者的笔下。

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的继子谢尔盖是位苏联大学生。一次，谢尔盖向他抱怨说在大学中必须花大量的时间接受死板生硬的政治灌输，而且，这些僵化的政治教条"答案的掌握是通过依样画葫芦。不容许任何讨论。"这种抱怨他当然理解，因为他本人在法国对官方在学校强迫进行政治教育就反感之极。但他现在认为"问题不在于共产主义。一切制度都会犯同一种错误。"同时，他更多地找谢尔盖不满的个人因素，而不认为这是体制的原因。他写道，谢尔盖从小就在身为公爵夫人的祖母家和亲戚圈子中受教育。这位祖母虽然开明，"但仍有反革命的情绪，他的亲戚则属于虽说贫困、但仍是贵族的阶级。尽管在理智上（虽说在遵循真理的同时仍感到遗憾），他应该承认共产主义的总的路线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他的天性所固有的某些本能和偏见仍使他与共产主义青年疏远……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他准备的是这样一种人的徒劳无益的角色，这种人退出了总的潮流，怀着将变成不满的遗憾观看潮流如何从身旁流过，或者大发牢骚，但又被这种潮流所吸引。"（第97–98页）

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看到苏联的领导人拥有极大的、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在生活中享有超出人们想像的特权，事实上正在形成一个"新贵"阶层。对此，他深表忧虑，屡屡谈及，认为今后很可能会产生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他急迫真诚地希望苏共和斯大林能正视、解决这一问题。但随即他又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每一次革命（而且，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否则人类就会停止前进），每一次革命——这都是在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个阶段。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

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无论今后将发生什么,将始终需要管理人类巨大躯体的中枢。”(第119页)

《莫斯科日记》中类似的思想矛盾与“想方设法”的自我解释还有许多许多,无庸再举。

三

罗曼·罗兰访苏一年后,法国左翼作家、对苏向有好感的纪德也应邀访问苏联。没想到,他的访问引发了世界左翼阵营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了全世界知识分子的激烈争论。

安德烈·纪德1869年生于巴黎,以小说《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蜚声文坛。他多次到法国的殖民地北非游历,其中一次还是由法国政府殖民部组织。显然,政府殖民部想利用他的名声,让他为政府的殖民政策辩护。没想到,深具人道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纪德看到的却是政府在殖民地的罪恶,1927年和1928年分别出版了《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对自己国家在非洲进行殖民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批判。他不仅怒斥了政府的罪恶,还严厉谴责了一些法国商人利用特权的巧取豪夺、欺压当地人民。这两本书,在法国引起激烈争论,有人指责他不爱国,有人赞扬他坚守公平正义。但影响之大,政府不得不派团去调查。由于亲眼看到殖民主义的罪恶,他转而同情、支持共产主义,开始赞颂苏联,成为令人瞩目的左翼作家。1934年1月,纪德曾去柏林见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要求释放季米特洛夫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同年,纪德进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员会。

1936年6月17日,纪德应苏联作协邀请参加高尔基葬礼,然后在苏访问两个月。6月20日,在高尔基的葬礼上,他在莫斯科红场发表演讲。他直接、明确、坚定地反驳西方认为十月革命毁灭了文化、使文化面临危机、危险的观点,热情洋溢地称赞苏联文化:“不错,文化遭遇危险了,但这危险并非从革命的和解放的势力方面而来,反是从那企图压服并击破这个势力而把精神蒙蔽起来的党派方面而来。危害文化的,乃是法西斯主义,乃是狭义的、人为的民族主义,这个主义与真实的爱国主义,与那对自己国土的深切的爱,是没有任何相同之点的。”因此他高声宣布:“拥护、保卫并重新荣耀文化之使命和责任,现在落到国际革命伟大势力肩上了。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他特别震惊的是,苏联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作家”使命的看法。他从来认为,从古到今,凡是有价值的作品,都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作家的使命就是批判、反抗,有意识无意识都是革命者、战士。但是苏联一定有了十分惊人的新事业,因为:“现在,在苏联,却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一个革命作家再不是一个反抗的人了。恰好相反,他适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全民众的愿望,尤其可赞许的就是适合民众领导者的愿望。”几天后,他在对莫斯科学生演讲时无情地批判了西方、批判了自己所属的资产阶级,盛赞苏联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不是由外而来的;未来是在你们里面。而且不仅是苏联的未来如此;因为其余世界的命运将依赖于苏联的未来。未来——就是你们这些制造未来的人。”由此,他还歌颂了苏联老一辈革命家“慷慨牺牲他们的血汗而获得胜利”,提醒青年说“你们可不要休息在这个胜利上面”。苏联的老一辈革命家排开了天上的一堆乌云,但其他国家仍是乌云密布,所以苏联青年现在不能袖手旁观,“你们负有重大责任”,不要忘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西方国家许多人都把希望的眼光“紧紧盯住在你们身上”。(〔法〕纪德:《访苏归来》,东方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第62、63、67页)

作家是敏感的,时间略久,他就发现了苏联并非他理想中的天堂,也有问题,有的还非常严重。

最明显的是大小商店都货架空空,莫斯科等大城市物资匮乏。为了买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须品,人们都要排队,经常是一排几小时。纪德不是经济学家、说不出所以然,但了解到长期如此,感到必有体制性问题。然而,使纪得意外的是,苏联工人却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欧美工人都在水深火热中生活。这种幸福感,源于他们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俄国的穷人之多、贫富差别之大、等级之森严、对穷人的歧视鄙视冷漠,也使原以为苏联人人平等的他大感意外。(《访苏归来》,第

29、39页）

无处不在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使他更为震惊。到处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斯大林肖像，哪怕是最贫苦最简陋的小饭馆，也挂着他的画像。纪德不禁感叹这无疑是从前挂神像的位置，不知道是出于崇拜、热爱或恐惧。但无论何时何都见到他的画像。到斯大林家乡访问时，他想到应给斯大林发封电报，对苏方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没想到，他说“向您致敬”时，翻译和邮局人员都说只用“您”不合适，应加一些诸如“劳动者领袖”、“人民导师”之类。纪德抗议说完全没有必要，但翻译与邮局人员坚持要加上这些话，他们嘀嘀咕咕，最后还是加上了一些颂词。他明白，“说斯大林永远正确，就等于说斯大林什么都正确。”（《访苏归来》，第42、43、46页）

纪德敏感异常、深刻异常地将“个人崇拜”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起来：“‘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当初对我们的许诺，而如今却相去甚远。专政，对，显而易见；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一致的无产者、苏维埃的专政。万勿自欺欺人，必须明明白白地承认：这绝非人心所愿。再进一步，我们甚至要说：这恰恰是人心所不愿。”由此，他想到了自由与文化的关系：“在一个国家消除反对派，甚至只是阻止反对派表达见解、形成力量，也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这要走向恐怖主义。一个国家全体公民思想一致，当权者执政当然更加方便。然而，面对这种思想贫穷化，谁还敢谈论‘文化’？没了平衡的力量，思想怎能不完全倒向一边呢？”“危害文化的，莫过于这种精神状态了。”（《访苏归来》，第46、30页）

他发现：“在苏联，所有事务，不管什么问题，只能有一种观点，这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永远也不能改变。况且，人的思想已经塑造成型，对他们而言，随大溜变得很容易，很自然，不知不觉就做到了。”“每天上午，真理报都教导他们应该了解什么，想什么，相信什么。绝不能出格！因此，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好像同所有人交谈了似的。倒不是每个人丝毫不差地服从一句口号，而是一切都定了格，谁也不能别出心裁。想想吧，这种思想塑造，从幼儿就开始了。”由于人的头脑经过了“深加工”，更悲哀的是在这种状态下连思想不自由的感觉都没有：“如果是必须响应某种号令，那么思想至少还能感到不自由。然而这样事先就加工定型了，不待号令就先行响应，思想就连受奴役的意识也丧失了。如果有人来对苏联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我认为他们许多人会感到惊讶，会予以反驳。”“危害文化的，莫过于这种精神状态了。”他顺便提醒他的法国同胞：“最好办法，莫过于去苏联（或者去德国，自不待言）逗留一段时间，这有助于我们珍视在法国还享有的、有时也被我们滥用的无比宝贵的思想自由”（《访苏归来》，第28、53、30、54页）

到苏不久，他学会了一个新的政治词汇：“路线”。他的演讲稿，有些地方翻译提出要修改，因为不符合“路线”。时间稍久，他发现苏联的文化、艺术如果有“批评”的话，就是指一部作品违背、不符合党的“路线”，要受到严厉批判。“在苏联，一部作品再怎么优美，只要背离路线，就要遭到鄙弃。美，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种价值观。”“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合时宜，合了时宜，其余的一切就会随之而来。”他准备好的一次演讲，因为路线不正确被取消，因为他提到惠特曼歌颂林肯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由于强制歌颂，可能苏联本有些像波德莱尔、济慈、兰波那样的天才作家因不愿歌颂而被埋没。（《访苏归来》，第52、56页）

有次在旅店大堂，他对一位陪同画家直率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但这位画家高声反驳他说：“我国的一位艺术家，首先必须路线正确。否则的话，多高天赋的作品，也要看成‘形式主义’……我们要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无愧于我们这样伟大人民的艺术。艺术，今天必须是大众的，否则就称不上艺术。”纪德针锋相对地说：这是迫使艺术家随大溜儿，最优秀的艺术家不会同意这样玷污他们的艺术，宁愿沉默也不会屈从。结果是“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为文化服务，要发扬光大和捍卫文化，将来肯定要成为文化的耻辱”。这位画家也不示弱，再次反驳说他这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既然在许多领域结出累累硕果，也会创造出新的艺术。这位画家的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像是讲课或背课文。纪德考虑是在大堂，便不再回答，立即离开回房。但过了一会儿，这位画家来到他的客房，低声对他说“咳！我当然清楚了……可是刚才，有人听我们谈……而我

的画展很快就要开幕了。”(《访苏归来》,第51页)

这一切,使他得出一个尖锐、大胆的结论:“我不免怀疑,今天,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思想还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加低三下四,更加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加俯首帖耳!”(《访苏归来》,第40页)

在离开苏联前,他对是否公开写出自己的见闻犹豫不决,踌躇再三,因为他热爱苏联,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更重要的是,他仍热爱这里正在进行的事业,担心自己的直言会有损神圣的事业,但最终,他决定公开发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何解释在苏联,我(在精神上)时而感到特别温暖,时而又特别寒冷呢?在重申我热爱的同时,我应当隐藏起保留意见,向世人谎称赞赏一切吗?不行。我十分明显地感到,这样做势必损害苏联,也损害她在我们心目中所代表的事业。不过,将苏联和这项事业联系得过紧,也许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会让人以为,我们在苏联所感到的种种遗憾,可能要由这项事业承担责任了。”“苏联并未到此为止,还在给我们教育,令我们惊喜。”(《访苏归来》,第58页)

为避免引起苏联和热爱苏联的人们的误解,纪德在“前言”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在我的心目中,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然而,我的思想则不同:对于自己希望能始终如一的拥护的人,我要求极为严格。仅限于颂扬,这样表达热爱实在糟糕,我认为毫无顾忌,直言不讳,就是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帮助了她所代表的事业。我要提出批评,正是由于我钦佩苏联,钦佩她已实现的奇迹,也由于我们还对她有所期待,尤其她还会让我们产生希望。”“谁能说得明白,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只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渴求。”“我坚信苏联最终能战胜我指出的特定错误,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即:一个国家的特定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的、全人类事业的真理。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以治病。”(《访苏归来》,第5、6、8页)

然而,纪德的表白毫无用处,白费一片苦心。《访苏归来》甫一发表,立即激起苏联和全世界热爱苏联的人们的强烈谴责、谩骂。

为了回答这些责难,纪德知道仅靠自己的旅途见闻并不能完全说服人,于是找了更多的资料对苏联作了一番研究,写了九篇文章作答,总名为“答客难”。如果说两个月的旅途见闻,只是根据一些直观印象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番“答客难”则是在更多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彻底否定了苏联模式:“苏联并不是我们当初希望它的那样,并不是它当初保证要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它还竭力装出的样子:它背叛了我们的所有希望。如果不让我们的希望陨落,那我们就必须另找寄托。”“如果说当初,你首先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唉!你却让我们目睹一场革命会陷入怎样的泥潭。”(《访苏归来》,第139页)

四

茨威格与罗曼·罗兰都可说是杰出的思想家,更是公认的敏感深刻、胸怀博大、充满爱心的作家,对人类的痛苦与罪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悯和愤怒。所以,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情狂热中才能不约而同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反战,呼吁人们应该认清“祖国/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与罪恶,公开主张“让祖国战败”,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视为“叛徒”、“卖国贼”,完全孤立,备受打击迫害。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他们更是不惜冒生命危险,公开揭露其罪恶,要人们认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弊病甚至罪恶时,茨威格却欲言又止,总认为任何表态都有失慎重;罗曼·罗兰更是不顾事实地对其公开颂扬,只在日记中吐露自己的疑虑、写下所见的某些真实情况,但随即又千方百计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亦即“可以原谅”的理由。尽管只是略有微辞(而且是非常可以理解、原谅的),罗曼·罗兰仍生怕引起50年后的读者对苏联、对他的态度和观点的“误解”,所以不仅要求“日记”在去

世50年后再公布，而且在“日记”的最后再次强调：“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它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们，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把刻画他们的个性特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况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第137页）今日读此文字，使人不禁哑然失笑，同时更感历史的嘲讽实在过于残酷。当然，我们不必也无权嘲笑、苛责先贤，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进行一种历史的追问：这是为什么？否则，这段历史就是一片空白。

很明显，并不是对一种外在力量的惧怕使他们“不敢”对斯大林的苏联作出批评，而是一种道德性的内在约束使他们噤若寒蝉。他们确可说是欧洲，不，是人类的良知，但在实际是以各种宏伟说辞为精美包装的罪恶面前，他们的良知却完全“瘫痪”，所以他们虽然看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但又为自己的这种“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愿意将其说出，生怕造成各种“不良影响”，甚至进一步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使任何罪恶都可以得到解释。罪恶一旦被开脱，罪犯便更加肆无忌惮。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们的这种回避或自我欺骗，使更多的人被欺骗，使悲剧更为深重。事实说明，他们缺乏的并不是承认、说出真理的勇气，而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伟说辞”轻易捕获。无论真假，谁占有了那套“宏伟说辞”谁就真的占有了一种巨大的“道德优势”，而对这种说辞下的罪恶的揭发者反居“道德劣势”，反成为“反对进步”的“不道德”者。

纪德的遭遇证明此点。《访苏归来》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他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发自内心地为苏联好，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但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一时间群情汹汹，被指为落后、反动、背叛。爱伦堡是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个时代。他的作品《解冻》是苏共二十大后批判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代表作，以至成为批判、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符号。他曾接待过访苏的纪德，几十年后他写回忆录时历史已经证明了纪德的正确，他本人此时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批判也比当年的纪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令人咄咄称奇的是，他不仅不承认纪德的先见之明和道德勇气、不承认自己当年的蒙昧和怯懦，反而依旧对纪德作了最恶毒的漫骂。在“纪德——他不过是一只螟蛾”这整整一章的篇幅中，仍然严批、甚至谩骂纪德，连纪德表露对妻子的深深爱恋都成为他嘲笑的内容，甚至咒骂纪德有“精神上的阴部露出症”！（《人·岁月·生活》〈中〉，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显然，正是对“过去”的矛盾态度和心理，导致了爱伦堡这种使人深感可悲的理智混乱，也可见纪德当年受围攻之激烈。

这三个人的访苏态度说明，像纪德那样揭露被各种宏伟说辞精美包装的真相，实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和更强的理性。

罗曼·罗兰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这些日记半个多世纪后，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竟会轰然坍塌，彻底解体。原因当然很多，很多，但像茨威格、罗曼·罗兰这种有“人类良知”之称的人们明明看到了它的严重弊病，却出于自以为是“道德”的原因为其“讳疾忌医”，终于沉疴不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像纪德那样坦率指出弊病却受到激烈攻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但愿茨威格、罗曼·罗兰这种事与愿违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愿纪德这种直陈病情，结果“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周扬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 袁　鹰

今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有《“异化”问题的讲座和周扬的遭遇》一文，追叙了周扬同志晚年的一些遭遇，读了令人感慨万千。文中插了一张照片，文字说明是“1983年4月8日周扬与人民日报同志交谈”。我初看时有点诧异。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报社文艺部工作，除十年动乱时期外，同周扬同志常有接触。多次听到他在大会小会上的报告和讲话，报纸文艺宣传计划和重要的文艺评论请他审阅，在他晚年也有不少接触。但几十年中，他从未来过报社，我也未曾陪总编辑秦川同志到他家中谈工作。而且同他一起合影。那么这张照片从何而来？再仔细回想，又看清照片中另外一位是当年报社外联室的申明河同志（两年前不幸病逝），这才想起一件往事。

1983年4月初，法国共产党党报《人道报》代表团访问中国。按规定：凡各国共产党党报代表团或个别记者，都由《人民日报》接待。报社设有外联室这个机构，专门接待各国党报来访的代表团和一些常驻记者，帮助他们安排采访事务。这次《人道报》代表团身份较高，团长是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人道报》社长罗兰·勒罗瓦女士。到京后，胡耀邦总书记曾接见他们，晤谈甚欢。代表团提出想去拜访周扬同志，外联室同志找我去联系。那时正是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那篇重要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后不久，处境有点困难，我在去电话时心中有点忐忑不安。暗想如果他不愿见，我可以找个理由（如不在北京或因病住院之类）回答外宾的要求，不料他欣然同意会见。这样，4月8日上午，我就陪秦川同志先去他家，简单介绍一下外宾的情况。

外宾来到前，周扬同我们闲谈。他说除了苏联《真理报》之外，他不清楚别的国家党报的名称。我们就向他介绍：朝鲜党报叫《劳动新闻》（因朝鲜的党名劳动党），越南党报名同我们一样，叫《人民日报》，日共党报名《赤旗报》，英共党报名《工人日报》，法共的党报就叫《人道报》……周扬说：“《人道报》这个名字好。”正说着，外联室的同志陪外宾进门。

《人道报》的同志对他表示由衷的敬意，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周扬最近发表的那篇长文，但是看得出不是一般的礼貌，尊称他为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有一位外宾说：据他所知，当代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不多了，周扬是突出的一位。周扬笑着摆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些探索。”坐定下来，他就着这个话题，又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他感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我们中国共产党，过去很长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注得多，实践也多，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斗争实践的需要。但是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道主义。他说：“好长一个时期，我们将人道主义、人性、人权都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将它们都奉送给资产阶级，而且是无条件的……”听到此处，几位外宾都笑起来，室内洋溢一片轻松祥和的气氛。

谈了一阵，已到中午。外联室同志轻声对周扬说：“午饭就在附近的四川饭店，已经准备好了。”周扬说：如果不远，我们就步行过去吧。外宾也都赞成，于是，一群人就从他家安儿胡同出门，穿过一个小小的菜市场，引起市场里许多人的注意，他们大约也很少遇到这样的路人（其中还有外国女士）。很快，走到西绒线胡同四川饭店。那是一个庭院式的饭馆，与一般饭馆不同，引起外宾的兴趣。我说，听说这里原是300多年前满清王朝初期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外宾更

日本负罪感一议

○　张树亭

读罢《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何方先生的《我看日本与中日关系》，感慨颇多。

我很认同该文对日本对外侵略是“民族犯罪”的观点。众所周知，早在中国明末，日本统治集团就开始向国民灌输“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必须开拓生存空间”的观念。至清末甲午战争之际，这种观念已成为日本国民的主流意识。1931年占领我国东三省后，中国国土占领之容易与中国矿产资源掠夺之轻易，使“尽快征服全中国”的理念成了全日本国民的决心，并冠以“大东亚共荣”和“大东亚圣战”之美称。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腹地时，日本全体国民侵略扩张的情绪上升至空前狂热的程度：父母送子妻送夫去当兵、财团捐资购买军需、知识阶层奋力鼓噪“圣战伟业”、青年女子包括一些在校读书的学生看到男子能上战场“为国立功”，而深为己是女身不能为“圣战”尽绵薄而惭愧、遗憾，于是主动申请作随军“军妓”。正是在这种全民高涨的热情支持、鼓舞、激励下，战场上的日本兵作战更加“勇敢”“顽强”。于是，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失守、南京沦陷、武汉告急……一份份战场“捷报”或如实、或放大反馈回日本，又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民多生产、多贡献，全力支援前线“圣战”的积极性：东京等日本大城市几乎家家户户是生产军需用品的工厂、作坊。1944年美国轰炸东京，主要目的就是摧毁那些大大小小的兵工厂以削弱日军的后方兵器补给，但收效甚微：白天炸完，各家各户夜间又开工。后来，美国才决定使用原子弹。由此可见，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不是一场全国动员、全民参与、万众一心的、不折不扣的“民族犯罪”是什么？既然如此，战后半个多世纪来，日本为何未能如德国那样有着深深的民族负罪感呢？原因固然很多，比如远东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罪行未能像纽伦堡特别军事法庭对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罪行清算得那样彻底，美国出于对抗“共产主义阵营”欲让日本做马前卒的战略考量，而对日本有意袒护等，但犯罪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不同，也是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犯罪主体的认定。欧美人将“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与支持德国对外侵略的德国人民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罪。故二战结束后，德国周边国家对德国是一片“民族犯罪”的指责声（其实，在德国对外侵略战争的中、后期，德国国内有不少反战团体多次组织刺杀希特勒，比如著名的冯·施道芬堡），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愤怒地说：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都不可原谅。而日本周边国家——不去说朝鲜、韩国与东南亚等国，只说对日本影响最大、受日本侵害最深的我们中国，却把“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与支持日本对外侵略的日本人民作泾渭分明的切割、剥离：1972年中日着手邦交正常化时，就有“作恶的只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的说法。

二是对战争赔款的认识。欧美人认为：战争赔款，天经地义。因而他们对德国的战争赔款一分不饶，即使后来与德国建交而成为友好国之后。而中国却截然相反：还是在1972年中日着手邦交正常

是惊诧，不忙入座就餐，先在饭馆前前后后参观了一遍。

事后，外联室同事对我说，今天的活动，是他们多年接待外宾工作中绝无仅有的经历。他很担心那一段路上会出什么意外，而且还有外宾。我笑着说：周扬同志自己都不担心，你怕什么呢？■

化时，中国政府基于“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逻辑，说“如果我们坚持日本赔偿战争损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于是郑重宣布：彻底放弃、一分不要。

几乎是常识：对于罪犯，只有让其知罪，才能让其认罪。只有让罪犯得到其所应得的惩罚，使其在所得惩罚的精神、心灵乃至肉体的各种痛苦中，其才会反省自己的罪行，才会扪心思罪、低头谢罪。俗语“千夫所指，不病也死”，可见舆论对人之心灵的压力之大。正因此，德国整个民族在外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加之在巨额战争赔款的阵痛中，不断加深对侵略战争罪行的认识，从而不断向被害国赔礼道歉，直至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国民族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而日本，由于主要受害国中国的怜悯慈悲、宽容大度，就没了那个条件：耳边没有强音谴责；（其他亚洲国家未像中国，无疑，中国若发声，最强）身上没有割肉剧痛。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给被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由于中国在所有受害国中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程度最深而被裁定获得的赔偿份额最多，尽管如此，也没有真正反映出中国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们也就如“没事一样”，脖子越挺越硬、头越昂越高：一任又一任总理、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次又一次在联合国里跟随美国对中国人权横加指责。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日本民族负罪感的缺失，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观念保留了丰腴的土壤。多年来，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亚洲各国不断施加压力，但还是有那么多的后来者前往拜鬼。不少人奇怪：那些政要怎么对军国主义战犯那么有感情呢？数年前，日本原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访华时，中央电视台做“高端访谈”节目，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对方回答：中国人民应了解、理解日本的政治生态。在日本，谁对靖国神社表示敬意，谁就能得民意、得选票。记得好像还流露出相当比例的日本人认为那些战犯是“为国捐躯的英雄”的意思。从政客的政治实用心态——一切为着“票箱”推断，对方的话至少相当部分是真实的。在日本的这种政治生态下，他们能对战犯产生正确的认识吗？

由此可见，何方先生看得很准：以“村山谈话”为标志，日本统治集团和广大国民的主流意识已经画上了句号。2016年的“安倍谈话”表明，要让日本再往前进已无可能。

由此还可看出：村山、河野两位总理能对侵华战争认识到那般程度，能对中国人民低头道歉——尽管极其有限，却根本无法与德国总理勃兰特相比。要取得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信任，不仅需要正义、良知，更需要胆识、勇气！■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关于AB团的一点资料

〇 杨 甦

读李锐同志《百年回首》获悉：萧克提出AB团问题是个大冤案，应该重新审查；李锐同志相信后人一定会把AB团这些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先辈们对人民对党对历史如此关切和担当，着实感人！使我回忆起有关AB团一点信息。那是1970年代，我作为原天水军分区副司令员胡云卿的随员，跟他在兰州出差，一天他委托我探望原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我得知朱司令刚任甘肃省军区顾问组长，住甘肃省军区家属院，去他家探望。出乎意料的是，他躺在家庭病床上，只是自言自语反复说：“谁不知道我朱娃子啊！打成AB团捆起来推到坑里等活埋，等着等着贺龙路过，看见我就说：‘这不是朱娃子嘛！’才把我救了出来。”

此外，我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大冤案。虽然我们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的利器，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然而为什么巴金老人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遗愿”至今难以实现？竟公然有人“主张淡忘文革”，这岂不是对历史的亵渎吗？因此建议贵刊在文化革命五十周年来临之际，能组织专家学者座谈，对文化革命的历史作一番评估，宗旨还是肃文革流毒，鞭其尸灭其魂，让文革不会再来。■

（作者为甘肃读者）

代购代邮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胡耀邦(1915—1989)全三卷	张黎群、张定、严如平等主编	198.00	20.00
陈独秀自述	丁晓平	57.00	7.00
陈独秀印象	丁晓平	48.00	6.00
从延安一路走来　何方自述	何　方	49.80	7.00
抄家	南　翔	35.00	6.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	46.00	7.00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秦　晖	58.00	7.00
儿子:你要活下去	[法]品雅特海	36.00	6.00
革命寻思录	林贤治	42.00	7.00
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	徐庆全	48.00	7.00
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	雪　珥	45.00	6.00
顾准追思录	罗银胜编	68.00	9.00
墙上春秋　大字报的兴衰	罗平汉	29.00	7.00
我的八十五年　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8.00	7.00
平生六记	曾彦修	35.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张聿温	68.00	9.00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光　李晓江译	88.00	10.00
一本书的历史　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金冲及	38.00	7.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9.00
潜规则	吴　思	28.00	7.00
我们忏悔	王克明　宋小明	48.00	8.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	36.00	7.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38.00	7.00
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	张　化	39.00	7.00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	38.00	7.00
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	58.00	8.00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68.00	8.00
“四人帮”兴亡(全四卷)	叶永烈	198.00	20.00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38.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苏采青	98.00	10.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珥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十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314.00	43.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独裁者手册》:报纸每天充斥着新的谎言,被粉饰的官绩政绩、腐败的人数和贪污的数额令我们震惊……我们禁不住要问:我们的文化、宗教、教育乃至历史境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出现这祸国殃民的行为!莎士比亚在《裘力斯.恺撒》中借凯歇斯之口说:“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或者尤其在于那些领导我们的人。我们太习惯于接受历史学家、记者、专家和学者们的解释,他们通过不断的讲故事来解释政治,他们探究为何这个或者那个领导人能够获得权力,那个领导人更具有个人的魅力,甚至未曾透过表面挖掘那些既不指向命运,也不指向我们自己的深层真相。政治的世界是受规则支配的,任何不按这些规则进行的统治的统治者都可以说是愚蠢到家。这是一本重要的,令人深思的书,对于任何想理解政治的真正运作方式的人来说是必读的一本书。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曾经的东德,有一种将生活打上专制烙印的日常经历:读者们经常以相当冒险的方式尝试接近那些在东德难以见到,出于文化政治原因被隔离或禁止的书刊。退休的游客和书贩过海关时紧绷的神经,图书馆里的毒草柜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让人们领略了真相和对立的世界那珍贵的文字带来的魅力。造成秘密阅读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审查。作为图书的审查枢纽,它扮演着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下国家行政机关的角色。它们批准各项出版计划,并向出版社下发文件。出版社每出一本书事先都要通过所谓的发行许可审查。出于维护政权统治的需要,审查是对现实的粉饰,对揭露历史真相和现实批判的作品经审查后不被通过,这种“闭关自锁”的文化政策,在西方现代思潮面前彻底的自我封闭。书中那些时代见证者们的发言,叙述和分享了他们自己曾经缄口不言的许多内容,这或许是一份对民主德国社会史的贡献。

《古拉格:一部历史》:“古拉格”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同时代表着苏联的镇压体系本身。它有一整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从1929年到1953年的斯大林时代,古拉格死亡的囚犯达2749163人,这个数据仍然没有反映斯大林时代司法制度的全部受害者的情况……

这是一部古拉格的历史,是一部苏联集中营的历史。也是一部斯大林统治期间的镇压和清洗的历史。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人人出版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天禾佳诚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可以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网上书店等）发行销售。

新推出 **国家级文联出版社**出书24800元起套餐活动

本套餐含书号、排版、编审、封面设计、1000册书印刷费用，可上全国新华书店、网上书店发行。（另有升级版软精装套餐可供选择）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无书号 出书价格：

1. 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000元，300页印刷100本4000元(仅印刷费）。
2. 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000元，300页印刷100本6000元（仅印刷费）。

征　集　令

典藏记忆　　铭记时代
品读历史　　传承文化

人人阅读馆正式建馆了，现常年征集个人的正式出版物或非正式出版物，由阅读馆统一编目、收藏，并进行专架展示。

征集要求以图书为主，作品内容不限，出版时间不限。除作者本人外，亲友、同事也可代为捐赠。同时，希望作者或捐赠者在出版物上留下签名或铭章。捐赠图书一经收藏，即授予捐赠证书。

来访路线：地铁5号线或者13号（立水桥）站下车B口出往南300米即到

出版热线：010-58426176　57273434　57223540　57273435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邮　编:102218
登录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2层201室（仅限快递）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3#1509（仅限平信 挂号信）

热烈祝贺
人人阅读馆成立

回忆自传　家史家谱

一、平民自传：

自传是人的生命史也是心灵史。写自传难吗？“翻检书信与日记，整理图片和影集，编写生平大事记，苦难辉煌重点写……”，家世亲友、故乡童年，拜师问学、事业家庭，成败得失、世道人心，排列组合、连缀成篇就是一部自传了。

二、百年家史：

家史是家族繁衍变迁的档案、兴衰起落的见证，当今社会碎片化移民，社会大分化、家族大迁徙，寻根祭祖、教育子孙急待编写“百年家史”。

我们倡导编写百年家史，百年五代、血脉至亲，脉络清晰、资料易寻。家族渊源、世系家庭，迁移分布、发展繁衍，人物故事、得失教训，艺文图表、文化传承，亲戚关系图、百年大事记，整合而成就是百年家史。

三、小型家谱：

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迁徙传承，其目的是明世系、序长幼、辨亲疏。

鉴于城市家庭代数不多、资料有限，我们倡导编修实用型的“小型家谱”，主要记载百年五代左右的家族世系、迁徙分布、人物传记、族规家训、艺文资料、文化传承等。

四、编写资料：

（一）赠阅资料：1、“中华姓氏树”寻根彩页；2、个人、家族定制出书流程；3、写自传、编家史、修家谱内容提示；4、《家谱传记报》。

（二）邮购教材：1、《怎样写自传》；2、《怎样编家史》；3、《怎样修家谱》；4、百家姓寻根手册；5、百家姓家用填谱手册。

010-68920114　62525116

让老人都有回忆录！让家庭都有家族史！

参观咨询：北京海淀图书城（中关村创业大街）25号家谱传记楼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 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 www.jzwhw.net

良知　真相　反思　鉴诫

邮发代号：82-507

欢迎订阅 **炎黄春秋** 杂志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

《炎黄春秋》终于有了自己的手机客户端APP，现提供下载地址和安装使用说明。（温馨提示：目前该版本是安卓系统的预览版APP，适应Android系统的安卓正式版本和IOS系统的苹果正式版本不久将上线！）

1、请您通过手机里的浏览器下载并安装客户端后即可正常阅读浏览，下载地址：http://dnld.runbytech.com/yanhuang_v0.1.apk

2、或者通过QQ浏览器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直接下载安装《炎黄春秋》安卓系统客户端。

3. 有关APP的最新资讯请留意官方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通知！

《炎黄春秋》杂志合订本

2012年	120元	免邮费
2013年	120元	免邮费
2014年	140元	免邮费
2015年	140元	免邮费
《亲历记》走向1949	29元	邮费6元
《亲历记》1978年纪事	29元	邮费6元
精品书系	175元	邮费14元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82—507

直接向本社汇款邮购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　　话：（010）68532048
传　　真：（010）68522852

淘宝网在线订阅：https://yhcqwd.taobao.com/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6年第6期

1965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

“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

贺捷生：永远的顾先生

对错误进行反思是政党履行自己的义务

吴晗一家的命运

我与许家屯二三事

ISSN 1003-1170
06>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